



官方微信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智库微信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客观、科学的观点。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20 年  
4-6 月

- ▶ 我院与全球劳动组织（GLO）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 国务院《国是咨询》杂志报道我院智库工作及成果
- ▶ 我院教师关于我国抗“疫”成功经验的合作研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并受到广泛关注
- ▶ 我院助理教授苏应俊的合作论文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接受发表
- ▶ 我院副教授史炜的合作论文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接受发表
- ▶ 我院首批本科毕业生 75% 被名校录取
- ▶ 我院首届硕士毕业生 50% 选择继续深造

#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是暨南大学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 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 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 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 (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2 月, 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 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 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 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 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 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 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邓永恒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劳动经济学中心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2019 年, James Heckman 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 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 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 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 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 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 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 目录 CONTENTS

<b>01 学院要闻</b>	
我院教师关于我国抗“疫”成功经验的合作研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并受到广泛关注	02
国务院《国是咨询》杂志报道我院智库工作及成果	03
我院与全球劳动组织 (GLO) 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4
我院首批本科毕业生 75% 被名校录取	05
我院首届硕士生 50% 选择继续深造	08
<b>02 科研动态</b>	
论文发表	13
<b>03 学术活动</b>	
学术会议	16
<b>04 思想聚焦</b>	
人力资本专题	21
促进就业专题	29
2019 千村报告专题	34
对话	50
好文回顾	54
暨济一堂	79
<b>05 数据调查</b>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87
<b>06 人物专访</b>	
IESR 人物	93
<b>07 学生天地</b>	
学子风采	102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116

# 学院要闻

我院教师关于我国抗“疫”成功经验的合作研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并受到广泛关注

国务院《求是》杂志报道我院智库工作及成果

我院与全球劳动组织（GLO）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我院首批本科毕业生75%被名校录取

我院首届硕士生50%选择继续深造

## 我院教师关于我国抗“疫”成功经验的合作研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并受到广泛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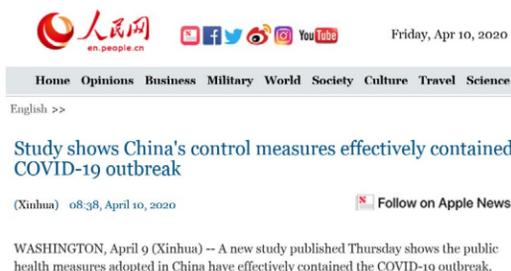
### Revealing the Sources of the Chinese Success Story in the Anti-Corona Fight, January-February 2020. Paper forthcoming in th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April 9, 2020 Article, News, Post, Post-20

A recent GLO Discussion 国际劳动组织网站报道 (March) had documented

2020年4月，我院副教授史炜、助理教授邱筠与耶鲁大学公共卫生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的合作论文“Impa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China”被人口经济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接受发表。该文研究了我国的防控政策如何遏制了由人口流动产生的疫情扩散，对其他国家应对当前疫情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国际劳动组织（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上对该文章的主要发现进行了报道。

《环球时报》、环球网、新华网、人民网等权威媒体报道了论文研究成果。通过建模分析，论文发现，截至2020年2月29日，在中国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有效避免了140万以上的新增感染者和超过5.6万人的死亡。论文提到，此次全球各国应对新冠疫情可主要分为两种基本策略，一种策略致力于减轻但不一定阻止病毒传播，另一种策略则依靠更严格的措施来抑制和扭转病毒感染的增长轨迹。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后一种策略。



论文对2020年1月19日至2月29日，中国国内新冠病毒的本地和跨城市传播进行建模，研究了各种社会、经济中介因素对病毒传播的作用，包括各地鼓励保持社交距离的公共卫生措施。论文发现，自1月下旬以来实施的病人有效隔离、封城、小区封闭管理、限制家庭户外活动等措施大大降低了病毒传播率，使得新冠病毒的传播在2月中旬就得到遏制。论文还通过反事实分析量化了各种公共卫生措施在减少感染数量方面的效果。截至2月29日，在中国实施的国家和省级公共卫生措施有效避免了超过140万人感染和最少5.6万人的死亡。此外，从反映病毒传播力的基本再生指数(R0)来看，有效且强有力的公共卫生举措使这一指数从1月底的2.992迅速减弱为2月底的1.243，并在湖北以外降低为0.614。换言之，1月下旬，一个新冠肺炎病人平均可以传染近3人，而2月底时一个人只能传给1.2人，

且湖北以外地区2月底时一个人只能传给0.6人，这证明此时中国已经有力地遏制住新冠病毒的传播。

论文认为，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最初实施的是“减轻但不一定阻止病毒传播”策略，但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正转向中韩等国更严格的遏制策略。论文写道，随着新冠肺炎演变成全球性大流行，西方的策略面临不断增大的压力，必须更有力地压低传染曲线，减轻对医疗体系的巨大负荷。中国采取的措施不仅加深了全球对疫情防控的理解，也为今后针对类似传染病的预防工作提供了借鉴。（文章研究介绍来源于环球网报道）

## 国务院《国是咨询》杂志报道我院智库工作及成果

由国务院参事室主办的《国是咨询》杂志，在2020年第2-3期中刊发两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报道。其中，“智库之声”栏目刊发文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与民生问题》，介绍 IESR 的智库研究队伍、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成果；“聚焦新刚需”栏目刊发专题报道《流动儿童与教育》，介绍了冯帅章教授、韩昱洁助理教授关于流动儿童与教育的最新研究：《公办还是民办？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新时代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新挑战》。

《国是咨询》是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的高水平内参读物，主要刊发国务院及全国各地政府参事及文史馆员中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各类调研、建议、咨询类文章，具有很高的决策咨询和参考价值。



国是咨询杂志

## 我院与全球劳动组织（GLO） 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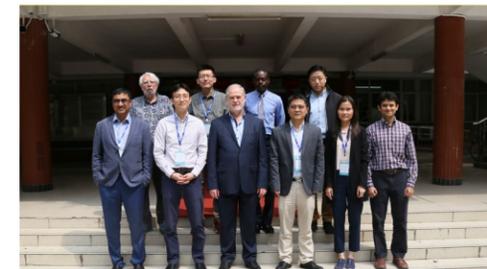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将与全球劳动组织（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合作关系。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将担任 GLO 中国负责人。作为 GLO 在中国的联系机构，IESR 将为 GLO 提供更多支持并组织 GLO 在中国举办的学术活动。

劳动力市场、人口及人力资源等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各国在这些话题上的决策都面临着挑战。GLO 的建立正是为了将以上问题的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以及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普罗大众连接起来，为他们提供一个国际性的网络的平台，在科学研究与基于实证经验的政策制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自2017年3月，IESR 加入 GLO，成为 GLO 支持机构以来，双方在全球人口、劳动力市场和政策影响的研究及全球化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

### 【IESR 与 GLO 合作回顾】

2020.6.5-6.7 第三届 IESR-GLO 联合会议（线上）

2019.3.21-3.22 第二届 IESR-GLO 联合会议：“一带一路”劳动力市场研讨会



2018.3.11-3.20 GLO 主席 Klaus F. Zimmermann 首次来访 IESR。举办第一届 IESR-GLO 联合会议；Klaus Zimmermann 教授还为 IESR 的青年教师们带来了一场职业生涯分享讲座；举办政策论坛：欧洲移民问题的挑战。



### IESR & GLO intensify strategic partnership

May 18, 2020 News, Post, Post-20

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at Jinan University and 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 intensify their collaborations, as IESR Director Shuaizhang Feng and GLO President Klaus F. Zimmermann have declared.

IESR Director Shuaizhang Feng has been appointed GLO Country Lead China. IESR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s a GLO-related institution and serves as a local host for GLO activities.

### GLO官网报道



2020.6.5-6.7 第三届 IESR-GLO 联合会议（线上）

## 我院首批本科毕业生 75% 被名校录取

姓名	Offer	转入前原专业
韩亚婕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	汉语国际教育
鄢瑜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项目	翻译
武乘羽	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以及乔治城大学硕士项目	会展经济与管理
张艺滢	芝加哥大学、剑桥大学、杜克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乔治城大学及塔夫茨大学硕士项目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创新班）
黄稚雯	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圣母大学及维克森林大学硕士项目	旅游管理（高尔夫）
龙绪坤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爱丁堡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大学硕士项目	环境工程
吴乃嘉	芝加哥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硕士项目	广播电视学
张浩然	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及中国人民大学硕士项目	金融学
李蔚	澳洲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及悉尼大学硕士项目	公共事业管理（应急管理方向）
王宇璇	华威大学、蒙纳士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及伦敦国王学院硕士项目	视频科学与工程
宋姝阳	曼彻斯特大学硕士项目	生态学
曾晓婷	巴斯大学硕士项目	旅游管理
肖雄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项目	经济统计学
黎思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硕士项目	公共事业管理（应急管理方向）
陈思棋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硕士项目	化学工程与工艺
李欣桐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项目	历史
张子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项目	材料物理
邹淑源	中央财经大学硕士项目	历史

“始有暨南，便有商科”，有着百年历史的暨南大学，其经济类学科一直都是暨南大学的一块金字招牌。2015年12月，暨南大学成立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这是暨南大学在建设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上的一次全新的探索与尝试。

作为暨南大学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试验田”，四年前，研究院首次招收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专业（以

下简称创新班）的学生。经过四年的国际化培养，这个班级的首届毕业生们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 世界一流大学竞相伸出“橄榄枝” 毕业生出国深造率高达70%

近日，研究院首届本科毕业生海内外名校录取捷报频传。根据初步统计，20人的创新班目前已有18位同学拿到了海内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其中两人将直接攻读世界名校的博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发来录取通知书的学校包括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国内外一流名校。

### 打造经济学教育的“黄埔军校” 把国际化培养模式贯彻到底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从教1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经济学本科培养有所突破。2015年，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到2020年，中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这样的愿景给了冯帅章鼓励和动力。“何为一流？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师资肯定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他屡次强调，“将一流的师资最大限度地运用在培养一流的学生上去。”

身处广州，冯帅章总会想起当年的黄埔军校，并为黄埔军校广聘天下贤士，接纳全国一流军事、政治俊杰到校工作的远见卓识感到敬佩，他希望创新班也能这样。因此，研究院成立了本科生创新班，用一流的师资培养一流的学生。

创新班以“北美一流经济系培养模式”、“全英文授课”、“超高师生比”、“一流项目实践机会”、“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等为特色，吸引了众多学子的加入。国际化创新班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创新班已有大一到大四四个本科年级，共有本科生114人。

### 用一流的师资培养一流的学生

作为“暨南大学首个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单位，研究院人才发展释放出强劲活力。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为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研究院在院长冯帅章的带领下连续五年奔赴美国参加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ASSA），通过高端人才市场招贤纳士。研究院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至今已延揽42名全职教师，他们全部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



我院2020ASSA年会招待会现场

在师资培养方面，研究院通过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制来激励青年教师。这些拥有优秀学术背景的青年学者，不仅在论文发表上表现亮眼，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数量也突飞猛进。近年来，学院教师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被正式接收论文90余篇，其中有多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上。研究院目前在研或立项的科研项目逾60项，仅去年一年就有1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批立项。

除了研究院本身的全职师资外，研究院还经常邀请芝加哥大学 Steven Durlauf 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 Sumit Agarwal 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杜克大学徐熠教授等多位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为学生开设短期课程。

### 育人新思路 鱼与熊掌都兼得

在学生培养方面，研究院不仅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帮助学生毕业后进入国内外一流高校继续深造或进入相关行业就职，更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向社会输送一批具有“诚实、奉献、创新、感恩”品格，具有国际视野，立足本土现实国情，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时代人才。

### 经济学国际化培养模式的领跑者

基于本科创新班的人才培养目标，研究院建立了一套国际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教学方面，创新班采用国外一流高校经济学科通用的英文原版教材，坚持全英文教学。其次，研究院还设置了和国外大学相似的 office hour 制度，将北美大学经济学科教学模式贯彻到底。如此前沿的教学模式不仅增加了学生的知识储备，更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语言环境，让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助力学生在未来适应国际化的竞争与挑战。据统计，首届毕业班学生的英语水平十分突出，英语四六级通过率为100%，同时，大多数同学已通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学生个性化培养方面，研究院还为每一位本科生配备导师，通过导师引导学生合理规划学业和未来发展。年轻的学院老师们还发起了珠江经济学俱乐部，定期开展诸如数据处理、成果展示、研究入门等方面的实用课程。

### 走出象牙塔 把握社会脉搏 开展调查研究展开学术思考

夯实基础之后，走出象牙塔解决现实问题则是国际化创新班的另一个目标。“要给学生机会，创造条件让学生尽早接触调查项目，也鼓励学生跟随导师开展前沿学术研究，这样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积累研究经验。”冯帅章如是说道。

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为同学们提供了大量的项目实践机会。调查中心长期组织开展多项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如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通过深入一线，不少学生表示，实地调查让他们感受到数据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来自身边，更重要的是这些调研经历让他们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除此之外，研究院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学术竞赛与科研项目，带领学生了解和走进“学术圈”。在首届创新班的毕业生当中，鄢瑜、龙绪坤和邹淑源组成的团队在第十六届“挑战杯”竞赛中荣获全国二等奖佳绩。此外首届毕业班中有多名同学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攀登计划）项目、广东省“挑战杯”竞赛、暨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暨南大学“挑战杯”竞赛等学术竞赛与研究活动中取得佳绩。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科研经验，最终帮助毕业生们拿到了世界名校的“入门券”。



我院学子鄢瑜与龙绪坤在“挑战杯”决赛现场

### 邂逅世界顶级经济学家 赴一流海外名校交换学习

这届毕业生们不仅有扎实的学习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还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研究院卓越的学术环境为学生提供了零距离接触专业前沿的机会。自成立至今，研究院开设了多个系列的学术讲座，不定期邀请世界顶级经济学家进行交流访问。目前已邀请过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 教授、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Christopher Pissarides 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Joshua Angrist 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Robert Moffitt 教授、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Alan Krueger 教授等学术泰斗来访。除此之外，许多国内外著名教授的身影也频频出现在研究院。哈佛大学 Elie Tamer 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Russell Cooper 教授、美国杨百翰大学 Lars J. Lefgren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 Andrew Chesher 教授、美国范德堡大学李彤教授等国际顶尖学者均莅临研究院为学生进行短期授课。



James Heckman教授（左五）与我院学子亲切交流

“这20多位同学就是我们的宝贝，无论怎样，我们都会努力给他们提供海外一流的交换项目。”冯帅章认为，在培养阶段给予学生丰富的海外交流机会是必须的。目前，研究院已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并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A&M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知名院校联合开展合作项目，给予学生更多交流、学习的可能。在过去的2019年，毕业班中就有多名同学分别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英国伯明翰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等院校交换学习。

### 接轨国际、全英教学， 这四年他们收获了什么？

谈到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北美一流经济系培养模式、频繁的 seminar、诺奖得主多次来访、社会调查中心的多项大型调查、一流的海外名校交流机会……而作为首批体验者的毕业生们，四年的学习到底收获了什么呢？他们与研究院又有怎么样的故事？让我们一同听听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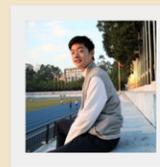
去年有幸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换学习，开始上课后不久，我就体会到学院全英教学培养模式对我的帮助。由于在国内的课程与那里十分接轨，绝大部分经济学领域的英文名词对我来说都不陌生，有了在国内进行的知识积累，尤其是计量经济学和中级微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学习内容也并不吃力。

——武乘羽



首先，来 IESR 之前，同学们有问题都是私下解决。来到 IESR 之后，每周都有答疑时间，我也慢慢地开始提问，能提出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着知识在不断被消化吸收，知识体系在不断构建！其次，全英教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四年下来，语言能力有了比较大的进步，我可以不用再通过翻译者这个“中间人”，直接阅读全英教材，更高效地理解和掌握书本的知识点，直接去跟作者对话、理解作者的思想。

——陈思棋



四年前，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走过同样的路，怀着同样的惴惴不安，来到了这个刚成立不久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四年间，正是在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学习让我能有勇气、有能力踏出国门，去大洋彼岸迎接全新的学习时光。

四年下来的学习体验：首先，学院坚持的英文授课让我有信心可以适应国外的课堂。毋庸置疑的是，全英授课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我们的英语能力。语言的进步是需要长期浸泡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的，在学院的这四年中，从课堂听讲到课后作业，甚至是期末考试，都是需要用到英文。长此以往，不能说进步神速，但是至少可以克服对于满纸英文的恐惧感。

其次，与国外经济学相似的课程设计让我出国求学衔接更加顺畅。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是，学院设置的任课老师和助教的 office hour 制度和国外大学相似。最后，让我们眼界大开的是学院丰富的讲座和 seminar 资源，让我们有机会和学术巨擘“亲密接触”。我曾对 UCL 的 Andrew Chesher 先生做了一个简要的采访，采访当中，教授对于青年学者“要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而非短平快出结果的速食研究”的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张浩然



首先，关于全英教学，在 IESR 的全英培养下我硬着头皮把英文读下去，久而久之不再觉得语言是很大的障碍，这也使我们得以更自由地接触经济学最前沿的成果、了解更多资讯，对未来发展帮助很大！其次，我也从众多优秀的老师的研究中领悟到：做研究、写文章，有时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儿，好的经济研究，是与社会脉搏紧紧相连的。

——李蔚



关于导师：能够选择朱宏佳老师作导师很幸运，遇见朱老师之前，我不太了解学术，遇到朱老师之后，我觉得做学术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和老师交流多了，视野更加开阔，意识到还有很多要学！

关于学术活动：有幸作为六个幸运儿之一，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ames Heckman 教授交流，学习和了解诺奖大师的治学之道。在与这些国际知名经济学大咖交流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在学习交流中开始慢慢塑造正确的学术研究观。

——韩亚婕

## 我院首届硕士毕业生 50% 选择继续深造

2016年6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举办了首届全国优秀大学生经济学夏令营，选拔出8位对经济学感兴趣、有意深耕的优秀学子进入IESR首届硕士项目。今夏，他们即将告别校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 学生录取情况展示

姓名	单位	项目
陈宇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经济学博士项目（全奖）
吕佳玮	匹兹堡大学	经济学博士项目（全奖）
王慷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经济学博士项目
王逸飞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经济学硕士项目
周彦	香港浸会大学	全职研究助理
何帅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广东分中心	（拟录取）
梁俊杰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市场研究岗

### “顶尖的学术资源和交流平台”

谈及当初为何选择到 IESR 读书，毕业生们不约而同地回答：“这里是培养学术型人才的好平台。”好在哪里？不只体现在课程教学设置上，更体现在丰富的学术资源与交流机会上。

自 2015 年 12 月成立至今，IESR 已举办“大师暨南行”、“暨南论道”、“IESR+”、“问政暨南”、Seminar 等多个系列的学术讲座逾 260 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等学术会议逾 40 场。学术活动主题几乎涵盖经济学学科的全部研究方向。来访嘉宾中不仅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更有不少业界精英。毕业生梁俊杰表示，业界精英的分享为他提供了大量了解业界信息的机会，给了他更广阔的学识视野。这让他在职场面试时游刃有余，成为他成功拿到名企 offer 的“制胜法宝”。

IESR 的学术活动除了“数量惊人”，“含金量高”更是亮点。多位顶尖学者曾前来交流访问，学生

们有机会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 教授、Christopher Pissarides 教授等学术泰斗面对面交流。“在 IESR 我能真正看到研究领域的前沿在哪里”，这是学生的真切体验。此外，学生还有机会担任学术会议的志愿者，加入到会务工作中，与经济学大咖“亲密接触”。曾担任 2019 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主讲嘉宾、耶鲁大学 Samuel Kortum 教授学生助理的毕业生王慷楷表示，与教授的交谈及相处激发了他的研究灵感，更让他有了很多精神层面的收获。



James J. Heckman教授来访

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术活动之外，IESR 还鼓励学生利用学院的国际化平台开展交流学习。目前 IESR 已邀请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J. Heckman 教授为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与多所海外高校、研究机构建立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作为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的首位访问学生，毕业生吕佳玮曾在芝加哥大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交流访问。



吕佳玮于芝加哥大学

对初入“学术圈”的研究生而言，学术汇报能力尤为重要。IESR 定期举办硕士研讨会，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研究进展，师生共同展开讨论。毕业生王慷楷表示：“通过参加研讨会，我既提高了做研究所需要的逻辑分析、学术汇报等能力，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看到了优秀前辈的‘闪光点’，这些都是激励我不断进步的动力。”更有同学打趣道：“研讨会的‘提问风暴’增加了我的应对经验，作汇报时再也不怕被提问打断了。”



硕士研讨会

## “师资力量很强大”

除了有“开不完的学术 Seminar”、“邂逅顶尖经济学家”的独特学术体验外，毕业生们还表示，“超高师生比”、“海归教师占比高”的强大师资配置也是他们选择 IESR 的重要原因。

目前 IESR 已有 42 名全职教师，他们从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

“时不时就在经济学 top 期刊发表文章。”毕业生吕佳玮如此评价 IESR 的老师。近年来，IESR 教师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被正式接收论文 90 余篇，其中有多篇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发表在了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上。他们不仅在论文发表上表现亮眼，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数也相当可观。IESR 目前在研或立项的科研项目超 60 项，仅去年就有 1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批立项。



IESR 近期多项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

IESR 的老师们在学生个性化培养方面也方法颇多。毕业生梁俊杰称，老师们很尊重学生的想法，不会强制学生必须往某个研究方向发展，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个性化培养，全程为学生提供大量实质性的建议和指导；毕业生王慷楷亦认为，在与导师的日常相处中，自己的学术研究、思维方式以及知识体系都得到了巨大提升；毕业生吕佳玮表示，每周或每两周定期举办的师门组会上，学生们交流工作进展并互相提出改进意见，这对各自的研究都有很大助益。

对待工作严肃认真的老师们，在生活中也有活泼可爱的一面。老师们常与学生分享生活趣事，畅谈读博士时的校园生活。在学生情绪低落时，老师们还充当起“知心大哥哥”“知心大姐姐”的角色，帮助学生分析问题、解开疑虑、重拾信心。毕业生王慷楷感慨道：“身边的老师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博士，无论是学术上遇到难题还是生活中感到迷茫，他们都帮助我答疑解惑。”

## “对国情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感知”

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认为，学术人生需要引导，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尽早接触一流的项目，跟随导师开展前沿学术研究。

IESR 下设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等职能中心。以社会调查中心为例，本着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的目标，中心开展了多项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包括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RUMiC）、四川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中国家庭就业调查（CHES）、广东千村计划、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等。

这些一流的调查项目并非“只可远观”，学生均能参与其中。他们在参与社会调查过程中，更好地感知了国情脉络，逐渐成为具备问题意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研究者。毕业生吕佳玮表示，调查中心提供的机会对她帮助很大。她深入了解了微观数据的形成过程，包括问卷设计、实地调查、质量控制等，从而能更好地运用微观数据、更好地将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毕业生王慷楷表示，在参与中国乡城流动人口（RUMiC）调查的一个月里，他获得了与流动人口的交流机会，这些经历激发了他在研究上的一系列想法。不少同学还表示，调查中心的数据支持对推进他们的研究起到了重要帮助作用。



王慷楷（右）访问流动人口

自成立以来，IESR 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结合自身国际化优势，对培养理念和培养模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在硕士培养教学方面，IESR 硕士项目由海外知名大学海归博士教师进行小班授课，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与国际一流硕士培养项目接轨。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IESR 不仅注重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训练、强调实证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熟练运用，还举办数百场高质量的学术活动，为学生提供一流的交流访学机会，开阔学生的视野。相信无论是奔赴世界名校继续深造，或是进入政府机构、企业开启职业生涯，IESR 的首届硕士生都将运用在这里获得的国际化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的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科研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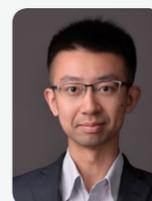
论文发表

## 论文发表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我院助理教授苏应俊的合作论文“Ownership and Productivity in Vertically-Integrated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teel Industry”（合作者：Loren Brandt, Feitao Jiang, Yao Luo）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接受发表。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我院副教授史伟的合作论文“A Dynamic Discrete Choice Model of Reverse Mortgage Borrower Behavior”（合作者：Jason R. Blevins, Donald R. Haurin, Stephanie Moulton）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接受发表。



###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我院副教授唐立鑫的独立作者论文“Entrepreneur Income Inequality, Aggregate Saving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接受发表。



###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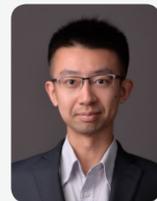
我院助理教授严子中的合作论文“Empowering Mothers and Enhancing Early Childhood Investment: Effect on Adults Outcomes and Children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合作者：Victor Lavy, Giulia Lotti）被应用微观经济学顶级期刊之一的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接受发表。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

我院助理教授崔潇濛的两篇独立作者论文被国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及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 接受发表，论文题目分别为“Climate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Agriculture: Evidence from US Cropping Patterns”和“Beyond Yield Response: Weather Shocks and Crop Abandon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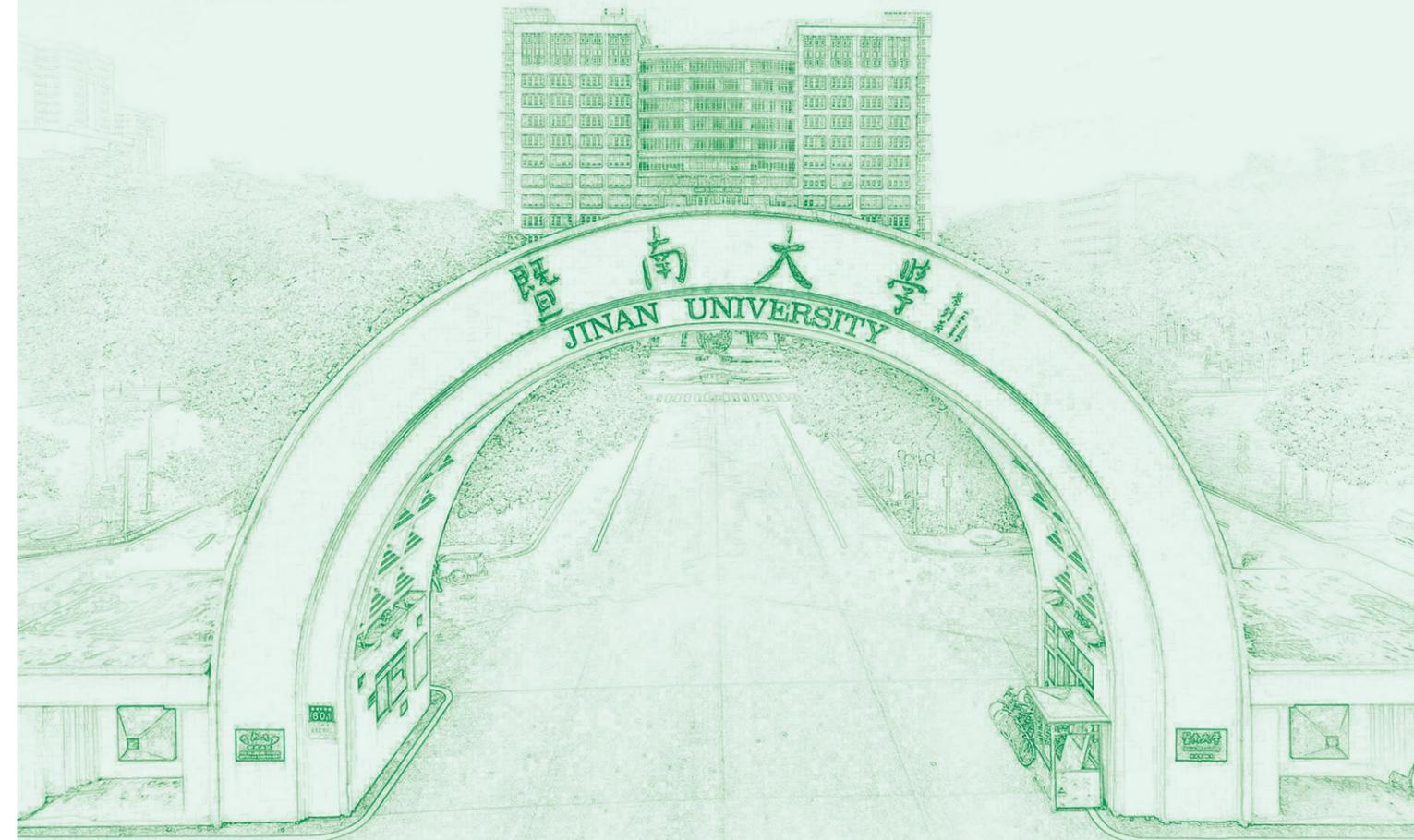
###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我院助理教授邱筠及副教授史伟的合作论文“Impa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China”（合作者：Xi Chen）被国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接受发表。

# 学术活动

第三届IESR-GLO联合会议

第四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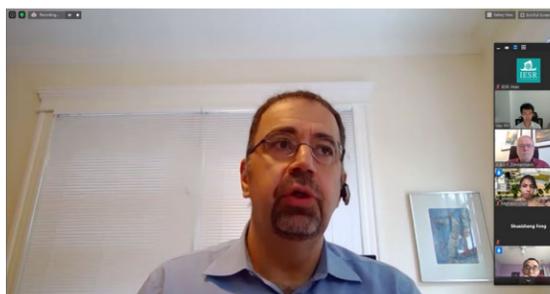


# 学术会议

## 第三届 IESR-GLO 联合会议

2020年6月5日-7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与全球劳动组织（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通过线上平台共同组织了第三届 IESR-GLO 联合会议。近40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西北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欧盟联合研究中心、意大利银行、意大利公共政策研究所、莫纳什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受邀相聚云端，围绕新形势下的国内外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 Daron Acemoglu 教授与西北大学的 Charles F. Manski 教授受邀担任本次会议的主讲嘉宾，分别进行题为“A Multi-risk SIR Model with Optimally Targeted Lockdown”、“Coping with COVID Uncertainties”的主题演讲。“大咖”云集、高含金量的学术会议吸引了近200人慕名参会，参会者围绕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汇报。



Daron Acemoglu教授进行主题演讲



Charles F. Manski教授进行主题演讲

会上，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GLO 主席 Klaus F. Zimmermann 教授及 IESR 微观计量中心海外中心主任胡颖尧教授分别进行致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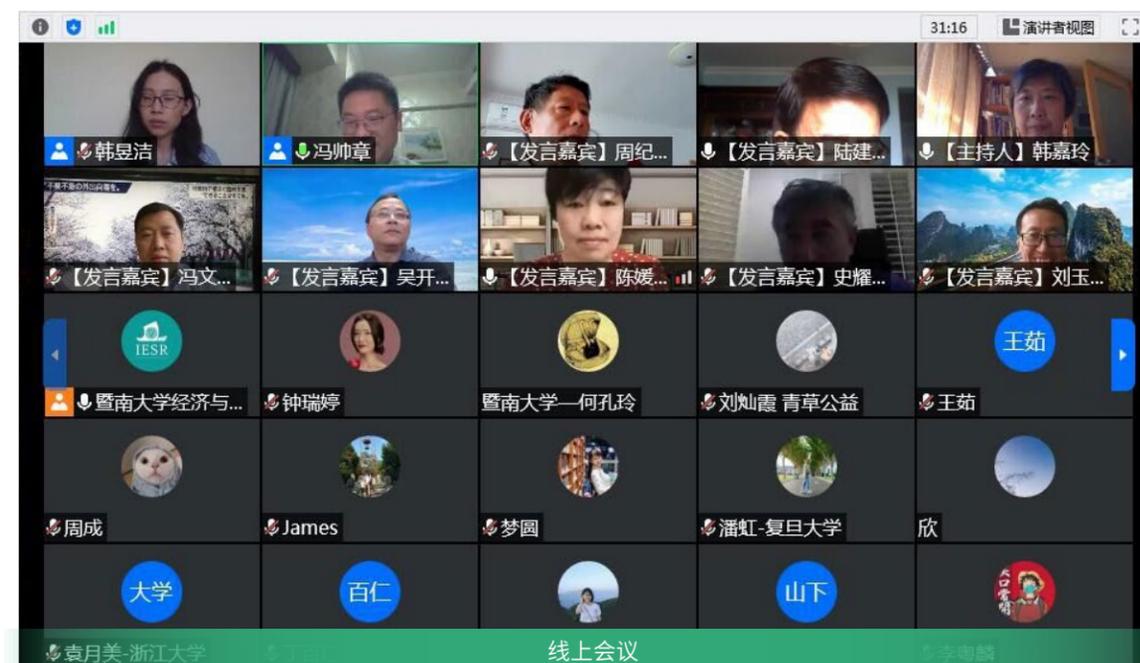
冯帅章教授首先向参会的嘉宾和观众表示欢迎，随后从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简单介绍了学院概况，并详细介绍了与 GLO 合作的发展历程。最后，他对两位主题演讲嘉宾及积极向本次会议供稿的各位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Klaus F. Zimmermann 教授向参会嘉宾及观众介绍 GLO，并传达了本次会议举办的初衷。他表示，当下新冠疫情是个全球化的问题，它涉及到全球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本次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希望能够从各位学者的研究及报告中了解到这一个全球面临的新挑战以及经济学家可以做出怎样的贡献。

胡颖尧教授则简单介绍了暨南大学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CEMP），中心将于2020年8月举行计量经济学夏令营，他热诚欢迎各位学者及学生参加。

为期三天的学术盛宴因高质量的论文分享及深入充分的讨论广受好评。自 IESR 加入 GLO 成为其支持机构以来，双方不断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人口及人力资源等研究问题上，双方已顺利组织开展了三届联合会议，为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对该领域感兴趣的普罗大众提供了一个国际化交流平台。未来，IESR 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 GLO 提供更多支持并组织 GLO 在中国举办的学术活动，广邀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全球经济发展对策。

## 第四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2020年6月13-14日，由我院主办的第四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在线上顺利举行。来自哈佛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北德克萨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青草公益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相聚“云端”，围绕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发展问题展开为期两天的政策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200余位关注该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在线参会，共同探讨新冠疫情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

会议伊始，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致开幕词。他首先向参会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表示在新冠疫情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和

挑战，流动人口收入下降、就业压力大以及子女教育不平等等问题亟待解决。他希望参会的专家学者能够通过本次会议共同探讨应对之策，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冯帅章院长致开幕词

开幕致辞后，大会进入到了政策论坛阶段，论坛会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韩嘉玲主持。

会上，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教育一线工作者以及长期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专家学者围绕“新冠疫情冲击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展开政策讨论。其中，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围绕疫情背景下我国贫困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参会嘉宾展开讨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针对近期关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一些焦点问题进行解读；广州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开俊以疫情冲击为背景，与参会嘉宾探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提出强化学校健康教育，提升流动人口子女应对疫情能力的观点；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分析了疫情对上海流动儿童入学与升学的影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玉照针对长三角流动儿童教育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实践的考察结果，解读跨界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组织参与的多重困境及其超越的问题；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分析疫情下的上海随迁子女学校近况；上海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陆建非以上海和杭州两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为例，分析抗疫期间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面临的困顿与磨炼；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分析线上教育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影响；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发展部总监黄励分享打工妈妈互助积分入学探索；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讲师，青草公益联合发起人、理事长向芯解读疫情冲击下的流动儿童中考困境。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政策讨论中，参会嘉宾畅所欲言，围绕主题对近期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热点政策及新冠疫情背景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解读，从政策和研究等视角分享各自的观点。

6月14日上午，本次会议学术报告专场在线上顺利举行，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Jun Hyung Kim 主持。来自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领域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向参会人员展示各自在留守儿童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助理教授董永庆分享了题为“The Cumulativ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的论文；北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Xi Yang 分享了题为“Parental Migration, Investment in Children, and Children’s Non-cognitiv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的论文；罗切斯特大学经济系博士生 Zibin Huang 分享了题为“Peer Effects, Parental Migration and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A Spa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in China”的论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杨哲分享了题为“Externalities of Parental Absence on Classroom Peers’ Personality Traits”的论文。几位嘉宾研究成果的精彩分享，为参会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该领域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全新的研究视角。



学术报告分享

自2016年，我院已连续4年举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会议充实深入、贴合时政、交流热烈、互动频繁，深受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同时，会议的举办也为展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领域整体水平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未来，我院将继续积极打造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交流平台，为更好地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当下所面临的各种难题与挑战贡献一份力量。

# 思想 聚焦

【人力资本投资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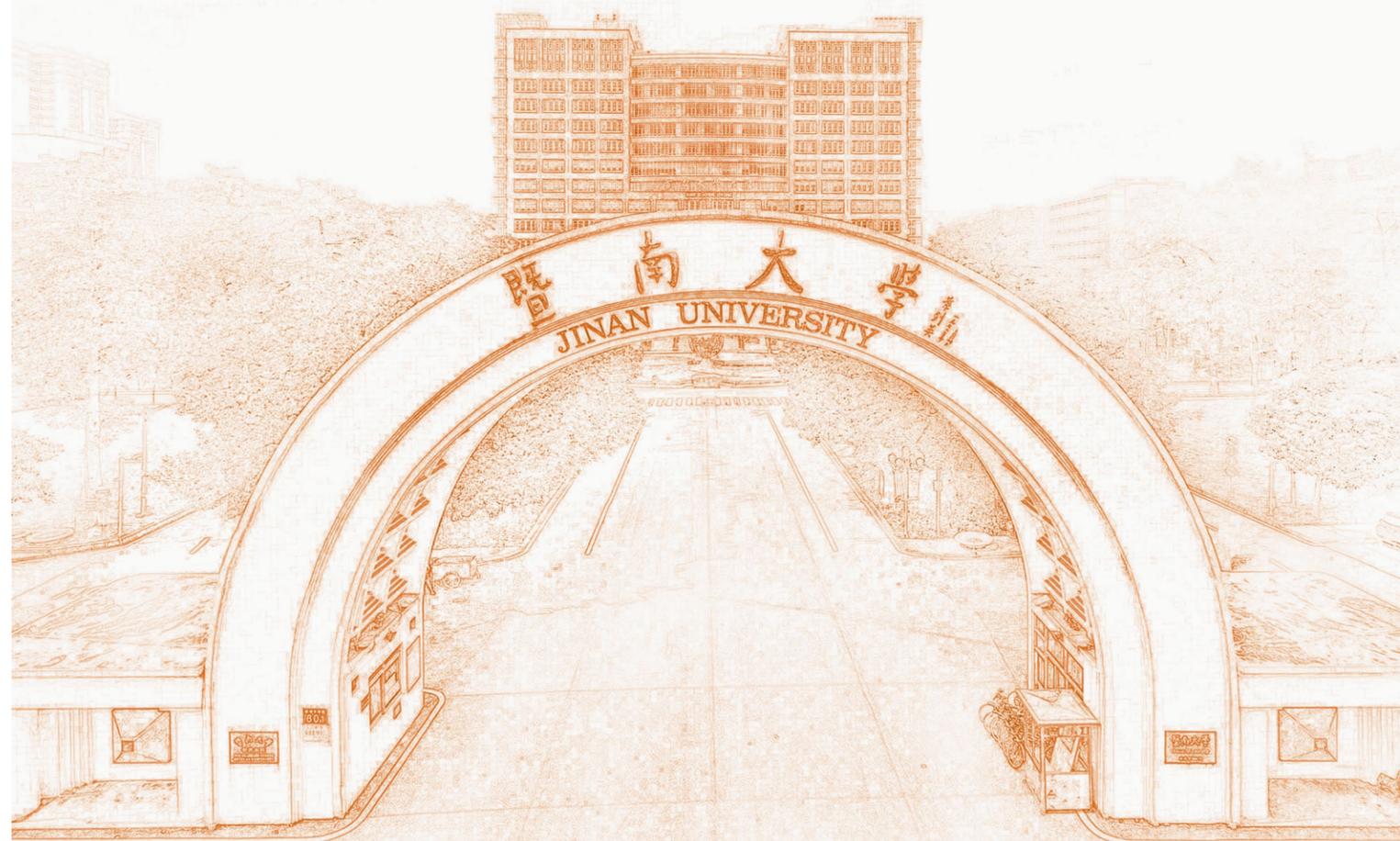
【促进就业专题】

【2019千村报告专题】

【对话】

【好文回顾】

【暨济一堂】



## 人力资本投资专题

# 【澎湃】冯帅章：以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来应对经济困境

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近日，“新基建”成为我国经济领域重要的高频词，各地也陆续公布了与“新基建”相关的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计划投资体量已超40万亿。“新基建”主要是指包括5G基建、特高压等七大板块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铁公鸡”的老基建，新基建有其优越性和必要性，但还是属于物质资本的范畴。为了充分应对疫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产生的长期不利影响，需要同时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面对本轮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提出加快推动“新基建”建设可以提振信心，对于壮大新兴产业，激发经济增长潜能，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而言有重要意义。

然而仅仅投资于“新基建”为代表的物质资本，可能很难避免当年“四万亿”所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物”与“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既投资于物，也投资于“人”。

### 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正当其时

从短期来看，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可以达到与其他刺激计划类似的效果，提振信心，从需求侧稳定经济形势。更进一步，相较于其他刺激计划，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具有以下几点独特优势。

首先，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收益时间长。根据目前的文献，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平均在10%左右，这还不包括人才聚集产生的正外部性。大规模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不会产生物质资本投资常见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相反，人才的聚集可以产生积聚效应，进一步促进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使被投资人终身受益，还可以通过代际传递使后代受益。

其次，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一方面，诸如“新基建”之类的投资项目必然催生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投资于高技能人才，可以导致企业采用更加技能偏好型的技术，从而内生地引起产业转型与技术进步。笔者与合作者针对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的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增加了高技能人才的供给，从而使得企业更多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及进行研发活动。

再者，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一石三鸟”。人力资本投资既是应对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好方法，又能对付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的“灰犀牛”。良好教育投资可以在短期创造高需求，以减轻新冠疫情导致的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可以缓解人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我国在面临“人口红利”消退挑战下提高人口质量的应有之义。

最后，针对弱势群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能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在中国，由于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造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子女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2015年，全国0-17岁流动儿童规模3426万人，留守儿童规模6877万人，流动人口子女总数1.03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38%。也就是说，中国每10名儿童中就有约4名为流动人口子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儿童大多面临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投资这些弱势儿童的早期发展，将既能产生高水平的教育回报以提高投资的效率，又能通过减少教育不平等及长期的收入不平等从而兼顾公平。

### 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那么，如何围绕走出疫情不利影响，在新一轮投资中，不仅做好“新基建”等物质资本的投资，而且兼顾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力：

第一，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儿童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其余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因此公共财政应该在儿童的早期人力资本发展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但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学前教育经费只占总教育经费的8%左右，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在各级教育中最低，甚至不到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30%，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财政支出尚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因此，政府应当增加对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总量，逐步填补对0-3岁婴幼儿的公共教育服务的空白。

政府投资还应兼顾不同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2018年民办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的62.2%，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56.7%。然而，在这次疫情冲击下，推迟幼儿园开学对许多“自负盈亏”的民办幼儿园造成了经营困难，使它们“活下来”都成了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补助、硬件提升、人力培训等多种方式支持民办幼儿园和民办托育机构的生存与发展。

第二，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和更高质量教育。流动儿童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但他们在城市教育体系里却面临重重困难，无法与当地户籍儿童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2016年，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比例为79.5%，还有近300万名流动儿童只能进入面向流动儿童的较低质量的民办学校。流入地政府可以通过大力兴办新的公办中小校，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公办学位。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提高对就读民办中小学的流动儿童的支持补贴力度。由于公办学校的生均经费较高，通过补贴民办学校提高流动儿童受教育质量是一个比开发公办学校更加经济的做法。例如，上海市政府从2008年起对民办小学补贴生均经费，全面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将生均经费补贴从每年2000元逐步提高到目前的7000元左右。笔者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可能对于民办小学的教学质量改善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从2010年到2012年，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的数学成绩差距缩小了超过一半。

第三，提高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支出。农村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生人数看，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分别为9483万人和1243万人，占总体在校学生的65.4%和52.35%。然而，城乡地区间教育水平差异依旧较大。有学者测算，城乡地区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了近35%，严重加剧了社会中的不平等。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正是影响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2017年农村普通初中和小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依次为1.46万元和1.05万元，虽然都较以前年份有增长，但依旧分别比全国平均支出水平1.64万元和1.13万元低。对此，政府应当提高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支出水平，例如提高农村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师资等方面的投入。不仅如此，还需要重点关注农村教育中的庞大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减缓特殊的成长经历对他们人力资本积累上的负面影响，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四，打造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人工智能、数字技术、5G技术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同时也意味着未来就业市场对相关技能人才队伍的需求。例如，根据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联合预测，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在2025年的职业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然而，中国职业院校的数量和入学人数还较少，投入经费占比小。2017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院校1.07万所，在校生1593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40%左右，而高等教育中的职业院校和在校生的占比则更小。同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463亿元，占全国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总投入的34%，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150亿元，甚至不到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20%。对此，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职业教育，例如提高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加强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为满足今后的新型就业市场需求加快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文章

## 《财经》专访冯帅章：“新基建”推进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作为民生之本，充分的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随着新冠疫情在中国国内的不解缓解，武汉近日解除封城，全国各地的生产和生活也逐步恢复正常，如何保障全国就业形势，正在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一方面，企业复工复产的速度加快，前期积累的消耗和投资正在继续释放，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在复苏；另一方面，在此前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企业的复工时间在推迟，劳动者返岗时间有所错后。与此同时，与疫情相关的行业企业缺工明显，部分招聘活动暂时性推迟。

因许多用人单位取消了在各高校的线下招聘活动，对于部分高校毕业生来说，就业季遭遇疫情，势必会对其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因外贸链条上涉及就业人员过亿，外向型企业的用工需求下降也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即将面临的潜在风险。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业局势总体稳定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但从各种角度来看，受制于种种因素，我们都没有过分乐观的理由，应从短期和长期各个角度进行政策发力。尤其是在‘新基建’的推进过程中加大对于人力的投入。”近些年来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工作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冯帅章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为充分应对疫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产生的长期不利影响，需要同时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入短期内也可达到与其他刺激计划类似的效果，从需求侧稳定经济形势；长期来看，则将会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能从另一角度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财经》：随着新冠疫情在中国国内的逐步受到控制，武汉近日解除封城，全国各地的生产和生活也逐步恢复正常。各方对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的分析正在不

断增多。焦点之一是就业形势问题，对此应如何看待？

冯帅章：目前的就业形势确实比较严峻。根据国家相关部门3月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冲击，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5.3%，2月数据则升至自2015年以来最高，为6.2%；平均劳动时间明显缩短，2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0.2小时，较1月减少6.5小时；1-2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8万人，较2019年同期减少66万人。此外，据人社部相关数据：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还有40%尚未返岗复工；不仅如此，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874万人，国务院已决定扩大今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将就业压力延后。

准确判断当前的就业情况还需要结合历史的维度。由于国企改革和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影响，中国大陆的失业率在九十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早期经历了一个的急剧上升的阶段，但之后一直处于一个平稳下降的过程中。所以整体来看失业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总体而言，即使是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展现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就业市场相当的韧劲。

当然，过往的劳动力市场态势不代表未来。在不发生大的经济波动的情况下，中国的失业率可以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运行。但是随着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国际需求的萎缩，中国的出口贸易将会受到影响，近来一系列消息显示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已经在面临着较大程度的裁员压力，短期来看没有乐观的理由。

失业分为短期失业与长期失业。如果失业者大部分都是短期失业的话，只是一个工作搜寻和劳动力市场的摩擦问题。反之，如果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的失业问题相对严重且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就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应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

长期失业占比较大，在受到负向冲击时就业市场的灵活调整能力可能不足。

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就业市场困难，政策必须重点关注特定人群。青年人的就业和失业情况值得格外关注。从世界各国来看，年青人都是失业率最高的一个群体。但是失业率过高会照成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年青时候如果长期失业还将对于其一生都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此外，农村流动人口、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较低，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劳动报酬较低，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完善。考虑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比例高达43%，所以必须提高该群体就业正规性和稳定性。经济形势不好时，流动人口可能返回老家。所以这部分人口的就业情况无法在官方的统计指标中得到充分反映。

《财经》：为缓解这些特殊群体的就业压力，可以采取哪些针对性的措施？

冯帅章：首先，中国政府一直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工作，到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去工作。通过“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在资金和创业服务方面提供支持，鼓励大学生创业。大学生创业值得鼓励，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为此，政府已经开始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组织毕业生参加职业培训和就业见习。目前来看，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推进该计划，为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提供更多帮助，例如更早地开展职业培训，延长就业见习时间，提供求职补贴，解决毕业未就业的社保断档问题等等。

此外，解决就业的主体是企业，经济下行时，企业面临裁员压力，这时需要政策扶持来避免就业波动。2015年以来，国务院推出了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政策，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缴纳失业保险费，且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企业可以领取稳岗补贴，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该政策就是为了鼓励企业和员工保持长期雇佣关系，稳定就业。中小微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政府应该在支持企业时，也出台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帮助这些中小微企业。

第三，政府应该通过更多政策激励企业维持雇佣水平的稳定，避免大幅度裁员。不仅如此，为了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各方也需要在制度环境方面下功夫。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事项，规范审批行为；拓宽创业企业的融资渠道，解决创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于首次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给予政策补贴等等。

最后，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会有越来越多的技能落伍的劳动者面临着转业转岗，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难以避免。国际经验表明，职业技能培训是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主要手段。一方面，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对于用于职工转岗培训、技能提升的相关支出予以补贴。另一方面，对于农民工和失业人员的培训，需要发挥公共就业服务部门的作用，切实提升这两类人群的就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

目前来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各个方面稳经济、提信心。这些措施包括为企业进行各种补贴，提供贷款，为个人发放消费券等，也包括最近媒体热议的“新基建”。各地也陆续公布了与“新基建”相关的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计划投资体量已超40万亿。“新基建”主要是指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板块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铁公鸡”的老基建，新基建有其优越性和必要性，可以壮大新兴产业，提振消费信心，激发经济增长潜能，缓解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然而，随着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中国传统的投资领域已经出现递减效应，甚至引发产能过剩等问题。因此，不应把“新基建”的领域界定为物质资本投入，而是拓宽认知，在“物”与“人”之间寻找平衡，既投资于物，也投资于“人”。进一步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财经》：如何理解投资于人？

冯帅章：人始终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方面意味着需要通过进行教育改革培养大量“高精尖”人才，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在中国仍存在的数以亿计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们缺乏父母的陪伴，有些连基本的教育都没有享受到。这对于他们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以及后期

的发展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这一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负担。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解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他们将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优势。从短期来看，对于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入也可以达到与其他刺激计划类似的效果，提振信心，从需求侧稳定经济形势；长期来看，则将会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将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财经》：与其他应对疫情的刺激计划相比，大规模投入人力资本投资有何优势？

冯帅章：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多管齐下。相较于其他刺激计划，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以下几点独特优势：

首先，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高、收益时间长。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平均在10%左右，而这还不包括人才聚集产生的正外部性。大规模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不会产生物质资本投资常见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人才聚集反倒是可以产生积聚效应，进一步促进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使被投资人终身受益，还可以通过代际传递使后代受益。

其次，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一方面，诸如“新基建”之类的投资项目必然催生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投资于高技能人才，还可以促使企业采用更加技能偏好型的技术，从而内生地推动产业转型与技术进步。我曾与合作者对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扩招增加了高技能人才的供给，从而使得企业更多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及进行相关研发活动。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既是应对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好方法，又能应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的“灰犀牛”。良好教育投资可在短期创造高需求，以减轻新冠疫情导致的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可以缓解人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中国在面临“人口红利”消退挑战下提高人口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针对弱势群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还能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不平等也有好坏之分。按照诺奖得主James Heckman的说法，凡是提高劳动技能报酬，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带来的不平等，应归于“好的”不平等。因为技能溢价的提高可以让劳动者有更强的动机去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出。反之，凡是因为出生、外部环境、制度等原因而限制人们获取技能，以及限制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相应回报而产生的不平等，应该被归于“坏的”不平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增加，大部分应该归为“好的”不平等。然而，未来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根据官方相关数据估算：2015年时，全国0-17岁流动儿童规模3426万人，留守儿童规模6877万人，流动人口子女总数1.03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38%。也就是说，中国每10名儿童中就有约4名为流动人口子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儿童大多面临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仅会影响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也必然在劳动力市场产生新的“坏的”不平等。投资这些弱势儿童的早期发展，将既能产生高水平的教育回报，促进经济总体发展，又能通过减少教育不平等及长期的收入不平等从而兼顾公平。

#### 《财经》：具体的抓手是什么？

冯帅章：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努力推进教育公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为实现教育公平，我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把饼做大，通过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来满足人民群众包括流动人口不断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我认为可以把拟议中的40万亿“新基建”拿出相当一部分来进行以下这些人力资本领域的投资。

首先，应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根据James Heckman教授的研究，儿童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其余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因此公共财政应该在儿童的早期人力资本发展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但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学前教育经费只占总教育经费的8%左右，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在各级教育中最低，甚至不到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30%；针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公共财政支出尚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

因此，应增加对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总量，并逐步填补对0-3岁婴幼儿公共教育服务的支出空白。在此值得提及的一点是：政府投资应兼顾不同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2018年时，全国民办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的比例为62.2%，民办幼儿园在幼儿园占全国在幼儿园总数的比例为56.7%。在这次疫情冲击下，推迟幼儿园开学对许多“自负盈亏”的民办幼儿园造成了实质性的经营困难，如何使其“活下来”是很大的考验。政府应该拿出真金白银，考虑通过加大补助、硬件提升、人力培训等多种方式支持民办幼儿园和民办托育机构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应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和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居住在城里的流动儿童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但他们在城市教育体系里的地位却往往非常尴尬，无法与当地户籍儿童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2016年，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比例仅为79.5%，还有近300万名流动儿童只能进入针对流动儿童所办的较低质量的民办学校。

为缓解矛盾：一方面，流入地政府应通过大力兴办新的公办中小校，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的公办学位。另一方面，流入地政府还可提高对就读民办中小学的流动儿童的支持补贴力度。由于公办学校的生均经费较高，通过补贴民办学校提高流动儿童的受教育质量，是一个比开放公办学校更加经济的做法。例如，上海市政府从2008年起对民办小学补贴生均经费，全面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将生均经费补贴从每年2000元逐步提高到目前的7000元左右。我与合作者之前对此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可对民办小学教学质量改善起到非常显著的效果。从2010年到2012年，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的数学成绩差距缩小了超过一半。

第三，农村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提高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支出。从学生人数看，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分别为9483万人和1243万人，占总体在校学生的65.4%和52.35%。然而，城乡地区间教育水平差异依旧较大。曾有学者进行过测算：城乡地区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了近35%，严重加剧了社会中的不平等。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正是影响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2017年农村普通初中和小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依次为1.46万元和

1.05万元，虽然都较以前年份有增长，但依旧分别比全国平均支出水平1.64万元和1.13万元低。



留守儿童教育

因此，政府应当提高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支出水平，例如提高农村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师资等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可以考虑大幅度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不仅如此，还需重点关注农村教育中的庞大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减缓特殊的成长经历对他们人力资本积累上的负面影响，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

最后，打造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人工智能、数字技术、5G技术等既构成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其应用规模的不断增加，也意味着就业市场对相关技能人才队伍的需求将不断提升。而根据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联合预测：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在2025年的职业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但中国职业院校的数量和入学人数还较少，投入经费占比也不高。2017年时，全国共有中等职业院校1.07万所，在校生1593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40%左右，而高等教育中的职业院校和在校生的占比则更小。同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463亿元，占全国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总投入的34%，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150亿元，甚至不到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20%。

因此，政府应更加重视职业教育，例如提高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加强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为满足今后的新型就业市场需求加快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培养能够满足企业实际需要的职业化人才。

本文首发在财经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文章

# 《广州日报》专访冯帅章：“折旧率”低 回报率高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6月15日,《广州日报》A13版“今日人物”采访了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他就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该报道也是《广州日报》近日就疫情下中国经济发展访谈著名经济学家的系列报道之一。

以下为采访全文:

“人力资本投资,在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形下,可以起到刺激需求的作用,从需求侧稳定经济形势。”近日,就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本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冯帅章。他表示,在短期内,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可以带动就业,刺激需求;在长期内,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我建议,在‘铁公基’‘新基建’等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也需要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作为重要的政策选项加以考虑。”

## 人力资本投资可提升就业

广州日报: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的区别是什么?

冯帅章:作为投资,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先进进行投入,再获取收益,两者都需要考虑投资回报率;而两者的差别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是人,通俗来说,就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来提高人的生产力。

因此,从投资刺激经济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投资和其他物质资本投资一样,可以在短期内创造需求,从需求侧稳定经济形势。“铁公基”“新基建”等物质资本投资项目需要修厂房、建铁路、修基站等,从而带动对于相应产业的需求;而人力资本投资同样能够通过短期对需求和消费的带来刺激经济。比如,在城市新建学校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因为校舍的修建带动建筑行业,更为重要的是新学校对于教师的需求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短期内的投资,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可以起到提振需求的作用。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其投入要素主要是人,因此对于就业的提升作用可能更为明显和直接。

## 人力资本投资“折旧率”低

广州日报:人力资本投资和其他刺激手段相比,对经济产生的作用是相同的吗?

冯帅章:相比较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是比较长的。像对于儿童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可能在十来年后等他们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体现出回报。但是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往往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折旧率”低,其回报伴随着人的一生。而人力资本的回报还体现在提升健康、和睦家庭、降低犯罪等非经济领域,且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从长期来看,投资人力资本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政策选择。

从短期来看,人力资本投资对需求端的刺激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特别是考虑到现阶段的首要目标是稳就业。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人力资本水平不到位,过度的物质资本投资往往将带来低效率、低收益的浪费。

广州日报:你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导?

冯帅章:主要还是以政府为主。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教育投资主体也是政府。当然,在政府为主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放开民间渠道。对于民间投资,我们一方面是需要引导、加强监管,设定一定的规则;另一方面,民办教育的存在满足了特定需求,对公办学校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良性竞争,有助于我国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此外,个人和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端。我国的文化传统向来重视教育,所以对于教育有非常旺盛的需求,如果能进一步将这些需求激发出来,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

广州日报:你一直以来都很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这是否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方面?

冯帅章:当然。目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总量大概有一亿人。能否解决好这么一个庞大群体的教育问题,事关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大局。对于城市的流动儿童来说,他们进入到公办学校比较困难,这方面可能需要通过在城市兴建更多的公办学校或扩充原有学校来解决,这就是人力资本投资;而在农村,由于学生数量逐步变少,一些老师也不愿意留在农村,这也需要我们去加大投入,提高教师待遇。

## 研究生扩招要保质保量

广州日报:今年围绕大学生就业问题,国家出台了哪些政策,其中就有一种思路是“减存量”,通过研究生扩大招生、专升本等手段来推迟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你对此怎么看?

冯帅章: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适度地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论是作为个人的选择,还是政府的政策,都是一种恰当的理性应对。

我们以1999年开始的扩招为例,首先,大学扩招大幅提高了新一代的受教育水平,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无疑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其次,大学扩招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提升,间接地也带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也就是所谓的内生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是要跟劳动力相匹配的,当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增加后,企业就有动力采用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来进行转型升级。

而目前,社会对于研究生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我觉得适当进行研究生扩招,进一步地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是一件坏事。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扩招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培养的质量。对于大学在扩招过程中面临的校舍、师资不足的情况,也应该加以妥善解决。这恰恰也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带来的需求和机会。

## “人才过剩”问题不存在

广州日报:现在有些发达国家会提到“人才过剩”,像博士的工资可能和基层公务员差不多,那我们以后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问题?

冯帅章:其实在发达国家教育程度和收入的相关性也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劳动力市

场的收入平均也越高;另外,市场也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如果过度教育带来的回报降低,大家的需求自然会相应下降。目前来讲,我们对人才的需求还是很大,并不存在所谓“人才过剩”的问题。

而且从劳动力市场上看,1999年后的扩招也并没有带来很明显的大学生收入溢价降低的情况。这是因为当大学生供给增加后,国家对高技能的劳动需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对大学生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我们要动态地看待人才的供给和需求问题。

另外,人力资本的内涵也不单单是受教育程度或者知识水平。如果考虑到认知和非认知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主动学习能力、生理和心理健康、进取心、责任感等方面进步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人才越多越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就不存在上限。

## 新就业形态也应“正规化”

广州日报:受疫情影响,不少金融、旅游、餐饮等行业的员工转型去做外卖骑手、直播博主等,应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冯帅章:就业结构随着经济结构进行转变是难以避免的。当然这种调整对有些人也是比较痛苦的,短期可能涉及很高的适应成本,甚至伴随收入的下降。长期来看,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直播博主这些所谓的新就业形态将会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些就业形态跟技术进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就业形态和传统就业形态相比会有一些优势。比如说在时间安排上比较灵活,对于教育程度、年龄等方面的要求也比较灵活。总体来说新就业形态的工资收入水平也不低,所以未来这些就业形态肯定会继续稳步发展,而政府要做的就是让这个过程更加顺畅。

我觉得新就业形态未来要向更加“正规化”的方向发展,不能游离于法律监管体系之外。政府需要将与新就业形态相关的指标尽快纳入劳动力市场统计体系,逐步完善相应法律政策,建立针对新型灵活用工的劳动标准;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快改革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为不断壮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充分权益保障。

本文首发在《广州日报》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月文章

## 促进就业专题

### 搜狐智库专访冯帅章：建议政府给企业发放就业补贴，鼓励企业与员工共克时艰



冯帅章

1-3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29万人，同比减少95万人。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9%，环比小幅回落。一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66%。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目前的就业市场的困难有哪些？失业率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当前的失业状况？就相关问题，搜狐智库对话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

**搜狐智库：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冯帅章：当前的就业形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严峻的。2020年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相比2018年3月的5.1%和2019年3月的5.2%，还是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另外，也存在就业者虽然处于就业状态，但是

暂时没有收入或收入下降幅度较大的情况。

**搜狐智库：您认为当前就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冯帅章：最大的困难还是需求不足。劳动力市场由需求和供给决定，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的需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外的总需求都出现了较大的下滑，从而影响了就业。只有当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国内外总需求逐步恢复以后，就业市场才能真正重回正轨。

**搜狐智库：我国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至5.9%，有分析认为该数据与其他各项经济指标的大幅下滑不太匹配。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真实的失业情况？**

冯帅章：我认为要全面理解劳动力市场不能只是盯着城镇失业率，还有以下几个指标也同样值得关注：

1-3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29万人，同比减少95万人。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9%，环比小幅回落。一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66%。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目前的就业市场的困难有哪些？失业率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当前的失业状况？就相关问题，搜狐智库对话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

**搜狐智库：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冯帅章：当前的就业形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严峻的。2020年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相比2018年3月的5.1%和2019年3月的5.2%，还是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另外，也存在就业者虽然处于就业状态，但是暂时没有收入或收入下降幅度较大的情况。

**搜狐智库：您认为当前就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冯帅章：最大的困难还是需求不足。劳动力市场由需求和供给决定，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的需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外的总需求都出现了较大的下滑，从而影响了就业。只有当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国内外总需求逐步恢复以后，就业市场才能真正重回正轨。

**搜狐智库：我国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至5.9%，有分析认为该数据与其他各项经济指标的大幅下滑不太匹配。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真实的失业情况？**

冯帅章：我认为要全面理解劳动力市场不能只是盯着城镇失业率，还有以下几个指标也同样值得关注：

一是劳动参与率。经济下行情况下，人们可能停止搜索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会使得劳动参与率下降，从而减缓对于失业率上升的压力。

二是实际工作时间。实际工作时间的下降可能反映就业不充分的情况。

三是工资水平。收入水平的变动也反映就业质量的变化。只有将这些指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判，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

**搜狐智库：为进一步促进就业，您有哪些建议？**

冯帅章：短期来说，目前就业市场的困难主要在于需求端。因此，政府应在需求端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对中小企业的减税、补贴，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这些目前政府正在采用的措施都会对短期稳定就业有重要作用。另外，政府还可以考虑针对劳动力市场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比如对企业发放就业补贴等，鼓励企业与员工共克时艰。

从长期来看，我们更需要关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端。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对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另一方面，要注意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改革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内容，使得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长远来看，我们还应该对劳动力市场本身进行改革。为解决需求变化引起就业波动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借鉴德国采用的“时间账户”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有一个时间账户，你可以在经济繁荣时加班，这样你多余的工作时间就会“存”在自己的时间账户里。

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即使不工作或工作时间大幅度下降，也可以通过“支取”时间账户里已经存有的时间余额，获得相应的工资收入。政府也会提供一部分支持，确保周期性危机爆发时企业尽量不用大量解雇工人。这可以确保就业和收入的相对稳定。这项举措已经在很多国家使用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搜狐智库：您觉得我国的两套失业率统计方法还存在哪些不足，应如何改进？**

冯帅章：我国目前的调查失业率所依据的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从指标定义、调查内容、抽样设计、调查方法等方面看，总体而言是科学规范的，而且符合国际惯例。当然，相比较发达国家的类似调查，我国劳动力调查的运行时间还比较短。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具体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劳动力调查的质量，有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目前的调查规模可以满足在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尚不能满足分省样本的代表性。因此，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调查样本规模，以满足分省月度发布失业率数据的要求。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差别较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分省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具有较大的附加政策价值。

二是进一步改进抽样设计，提高对于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目前的劳动力调查还是基于居住地的抽样。但是中国具有较大比例的流动人口。由于居住地变动较为频繁，现有调查体系尚不能特别充分地反映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举例来说，当经济形势下行时，流动人口可能出现大量返乡的情况，基于城镇样本的调查失业率就有可能低估劳动力市场恶化的情况。

三是适当扩大信息发布的范围。目前国家统计局每月仅公布全国失业率、25-59岁群体失业率、31个大城市失业率。这些指标对于全面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还是不够的。可以考虑公布劳动参与率、平均工作时间等指标。另外，对于分年龄段，分性别，分地区的等细分指标也可以考虑公布。

登记失业率可以作为调查失业率的一个补充，其变动趋势也是基本与调查失业率相一致的。但是在判断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时候，还是应该以调查失业率作为基准。对于登记失业率，首先需要做出的变动是扩大登记范围，将户籍地的要求变更为常住地，以更加充分地反映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这方面的改革可以与失业保险的相关制度协调进行。

本文首发在搜狐智库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文章

## 搜狐智库对话冯帅章：继续大力扶持 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

教育部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60万海归，再加上去年尚未落实的生源，超过千万的年轻人正寻找就业机会。

如何看待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我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毕业生就业政策哪些比较有效？如何看待毕业生去基层工作？就相关问题，搜狐智库对话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

冯帅章表示，今年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最大的困难还是需求不足。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强，长期就业前景仍然看好。但短期内不应该对就业市场迅速回暖报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扩大就业的需求上，冯帅章指出，中小微企业是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力军，约有六成大学生到中小微企业工作，发挥中小微企业的作用举足轻重。对此，他建议要继续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切实解决他们融

资难和经营成本高的问题。另外要多种政策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例如延长中小微企业招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期限。同时疏通中小微企业的招聘渠道，让岗位信息直接与高校对接。

目前一些地方扩大了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录聘毕业生比例，鼓励毕业生去基层工作。冯帅章表示，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前往基层工作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基层不是一潭死水，这里是中国市场最有潜力的地方。基层同样可以发挥专业优势，让学生们学有所长。

以下为对话精编：

搜狐智库：如何看待今年大学生的就业形势？目前大学生就业存在哪些问题？

冯帅章：目前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疫情对我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冲击。2020年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6.2%，达到2015年以来最高值。

目前国务院已决定扩大今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能够延后一部分就业压力。同时，多省市出台了稳就业政策，加大相应财政补贴力度，相信能够缓解一部分毕业生就业压力。

但归根结底，今年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最大的困难还是需求不足。劳动力市场由需求和供给决定，其中，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的需求。由于今年疫情影响，国内外的总需求都出现了较大的下滑，从而影响了就业市场。只有当世界范围内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国内外总需求逐步恢复以后，就业市场的需求才能真正重回正轨。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强，长期就业前景仍然看好。短期内不应该对就业市场迅速回暖报不切实际的期望。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还体现在就业结构的供需不匹配上。从地理上看，大城市由于经济更加繁荣，工作机会明显多过中小城市。而不同产业的发展现状也决定了热门专业的学生相对好就业，金融、经济、通信等专业的同学大体比传统学科生物、化学、外语等专业的同学更容易找到工作。

同时，部分专业人才过度饱和，有些已经成为教育部被点名的红牌专业，高校在学科招生和学生自主填报志愿时，并没有充分了解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专业课程的设置也与社会市场有些脱节，单一理论学习无法满足社会现实需求。

另外，高技能人才仍然存在供应缺口，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不仅需要高学历人才，更需要高技能人才。高等教育如何进行自我革命，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是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疫情发展也在无形中提供了一个寻新机、开新局的机会。

搜狐智库：我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大学生就业政策有鼓励企业吸纳、拓宽基层就业、以及扩大升学队伍等等，您认为哪些方式比较有效？

冯帅章：近来，政府围绕大学生就业出台了不少政策，这些政策的思路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减存量”的思路，即如何推迟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较少当前的就业需求。尤其是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总量继续突破新高，达到874万，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512万应届毕业生相比，就业挑战更大，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部

门的一些举措，是围绕“减存量”这一目标来提出，例如高校扩招，硕士研究生扩大招生规模18.9万、普通专升本扩招32.2万；扩大毕业生参军入伍行动等等；

第二种是“做增量”的思路，即如何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需求。但是，企业招多少工，用多少人，归根到底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能做的主要是出台补贴、返还失业保险等优惠政策来激励和支持企业用工。

所以从目前来看，“做增量”的主要发力点集中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的扩大投入与发挥国企优势。例如，今年广东省三支一扶项目提出，招募2000名高校毕业生到我省欠发达地区的从事为期两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国家部委领衔的“百日冲刺”行动中提出，城乡社区和基层卫生部门新增岗位要优先招录毕业生，国有企业要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

我认为，稳就业工作是系统性工程，以上两种政策思路如果落实到位，都将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搜狐智库：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

冯帅章：中小微企业是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力军，约有六成大学生到中小微企业工作。因此，发挥中小微企业的作用举足轻重。

我认为可以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是要继续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切实解决他们融资难和经营成本高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中小微企业本身得到发展，才能发挥其就业吸纳能力。

二是多种政策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例如延长中小微企业招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期限，目前许多地方的期限是1年，鼓励有条件的省市可以延长至2~3年，也可以给予一次性的岗位补贴。

三是疏通中小微企业的招聘渠道，利用互联网招聘平台，将当地中小微企业纳入进来，岗位信息直接与高校对接。

四是需要高校做好毕业生的就业辅导工作，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当前就业形势，鼓励他们转变就业思维，将新就业形态、中小微企业等做为重要的就业选择考虑。

**搜狐智库：**在鼓励企业吸纳方面，湖南省规定省属国企拿出不低于50%新增岗位招聘毕业生，并将完成情况纳入企业负责人年度考核。对于企业指标硬性的规定是否可取？

冯帅章：当前我国的“六稳”、“六保”政策，就业问题居首位。国企作先行示范作用，能增强就业市场的信心，从这点来看，值得鼓励和肯定。

当然，我们也不能抛开企业的生存发展谈就业，同时也要拓宽思路，多渠道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首先需要充分调研当地国企、民企的实际经营情况，对今年及明年的用工需求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避免短期内大幅度裁员，也避免盲目扩招岗位。然后基于实际情况的调研，政企共商合作，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维持企业稳定发展，以维持稳定的雇佣水平。最后，除了国企外，也应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发挥新形态就业、中小微企业等多方面作用。

**搜狐智库：**在大学生创业方面，政府可以给予哪些有力的支持？

冯帅章：支持大学生创业是各级政府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一贯以来的立场。根据我们的一些调研与政策梳理也发现，广东在支持青年创业方面的政策配备与资金投入力度很大。一方面是“硬件支持”，例如提供创业孵化基地、人才租赁住房等。最近省教育厅等部门也印发了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文件，要求高校从“机构、人员、场地、经费”各方面为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是“软件配套”。也就是青创活动提供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资助、创业孵化补贴等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硬件支持、软件配套”只是支持学术创业工作的第一步，“扶上马”之后，要做好接下来的“送一程”。从我们的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可以进一步提高改进的地方。有毕业的青创企业家反映，虽然享有政府前期大力支持补贴，入驻孵化园；但由于种种原因，依然难以突破创业瓶颈期，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对此，政府部门也要思考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来，帮助青创人员走的更远，例如定期开展企业家信息交流活动，让青创人员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知名企业家、天使和创业投资人，获得市场机会。

**搜狐智库：**目前一些地方也出台了扩大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录聘毕业生比例，鼓励回原籍本村任职，或去农村中小学任教，毕业生应如何看待去基层工作？

冯帅章：大学生们去基层工作不能只是顾及眼前的工资待遇，更应该从个人发展的角度仔细考虑。

首先，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前往基层工作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在大城市岗位需求逐渐减少、人才逐渐饱和，而基层地区仍然紧缺人才的情况下，毕业生们可以选择基层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

其次，基层不是一潭死水，这里是中国市场最有潜力的地方。我国的城市农村基层居住着大多数人口，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最直接接触到更多的人群，这对于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是极大的锻炼。同时，基层同样可以发挥专业优势，让学生们学有所长。

目前，城市农村基层都是人才紧缺的状况，而众多人口决定了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大学生们在基层的确有发挥专业特长的空间，在给基层带来活力的同时，能极大推动基层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政府应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大学生前往基层发展。

**搜狐智库：**以往，有很多线下的校园招聘会为毕业生提供就业的信息，今年的特殊情况下，如何发挥“互联网+就业”的平台作用？

冯帅章：校园招聘会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市场中介活动，匹配就业市场的需求方与供给方。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化，传统的线下招聘活动也在为数字化技术所渗透，并转向线上招聘。应该指出，就业招聘活动“互联网+”是未来趋势，今年的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

从目前来看，“互联网+就业”平台市场发展已经形成规模。例如，智联招聘等市场机构积极将线下招聘活动转换到线上，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此外，政府部门也加大了“互联网+就业”平台建设，教育部推出的“24365校园招聘服务”活动启动一周后，就累计发布了200多万个校园招聘岗位信息。各类央企也推出“抗疫稳岗扩就业”、“千校万岗”等线上活动。与线下招聘活动相比，线上招聘具有不受地域时间限制、成本低的优势，对求职者、需求者和组织者

三方而言，皆具好处。另外，“互联网+就业”平台建设目的在于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就业市场的匹配效率。

但是，目前公务员、教师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招聘的数字化建设还有待加强。要更好地发挥线上平台作用，除了建设更多的线上招聘平台外，如何整合现有“碎片

化”的平台资源，减少毕业生求职信息搜寻的时间成本也很关键。

本文首发在搜狐智库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月文章

## 2019 千村报告专题

# 广东千村调查① | 三成村庄有公立幼儿园，低龄留守儿童相对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于2018年发起的“广东千村调查”项目，于2019年7月至8月开展第二轮广东省千村调查，深入广东乡村进行了入村入户调研，课题组从行政村、农户两个层面开展数据收集，使用分层抽样法抽取广东省119个行政村，并对3622户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调查内容涉及农户的人口特征、收支、生产、就业、以及农村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现状、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承包地及宅基地改革、农村金融改革、乡村教育等方面。澎湃新闻授权刊发部分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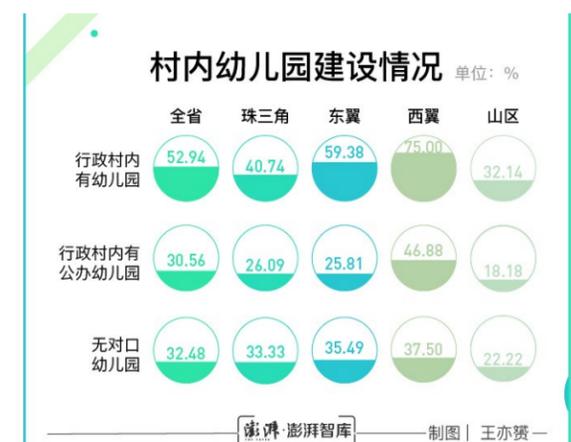
本文描述了广东农村教育现状，并着重呈现村教育的难点问题。

### 一、农村幼儿园建设需加强，学前幼儿就学率待提高

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显示，广东农村的幼儿园建设有待加强。表1显示，村内有幼儿园的村庄比例刚刚过半（52.94%），且仅有三成的村庄有公办幼儿园（30.56%），另外，三成以上村庄的农村户籍儿童没有对口幼儿园（32.48%）。分地区来看，西翼地区75%的农村有幼儿园，占比最高，而山区仅32.14%的农村

有幼儿园，占比最低。另外，广东农村幼儿园多建设在人口多的“大村”，拥有幼儿园的行政村的家庭户数、户籍人数、居民人数和儿童人数都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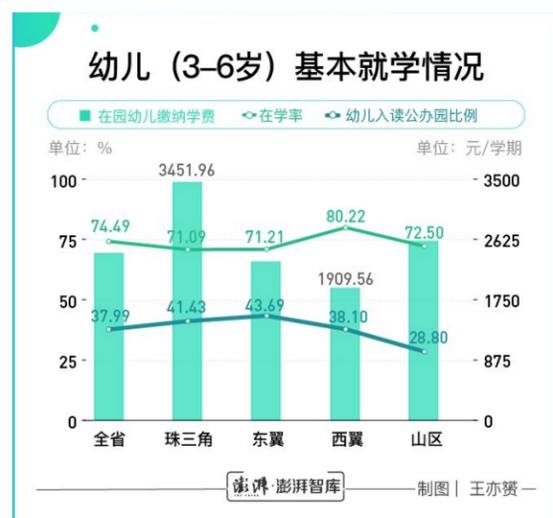
表1 村内幼儿园建设情况（单位：%）



从千村调查的数据来看，广东省农村幼儿的在园率在学率有待提高，在园儿童就读公办幼儿园的比例较低，幼儿园学费地区之间差异较大。表2显示广东省农村幼儿的在园率在学率为74.49%，全省在园儿童就读公办园的比例为37.99%。全省幼儿园学费每学期平均为2422元，约为调查中一个普通家庭半年收入的7.5%。

分地区来看，幼儿在学率最高的为西翼地区，为80.22%，其余三个地区的在学率均为72%左右。各地区幼儿的就学情况与当地幼儿园的建设情况有着紧密联系，由于西翼地区村内幼儿园建设最完善，其幼儿在学率也最高。幼儿入读公办园比率最高的为东翼地区，占比为43.69%，最低则为山区，占比为28.80%。无论是全省平均在园儿童入读公办园的比例还是各个地区的数据，都未达到2018年《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中要求的50%。对于各地区平均缴纳学费，珠三角地区最高，每学期平均缴纳3452元，是平均学费最低的西翼地区的1.8倍。

表2 幼儿（3-6岁）基本就学情况



将2018年和2019年两年千村调查中幼儿阶段儿童在学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幼儿园年龄阶段的儿童在学率从2018年的69.99%提升至2019年的74.49%。

## 二、农村中小学建设较完善，初中儿童就学率需提升

广东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村内中小学建设较为完善。表3显示，拥有小学的行政村占比87.39%，而拥有初中的行政村占比12.61%，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地区来看，珠三角地区的行政村内拥有小学的比例最低，占比为74.07%；东翼地区行政村内有初中的比率为最高，占比为28.13%。各地所表示出的中小学校建设情况的不同，可能与近年来撤点并校的政策有一定关系。

表3 村内中小学建设情况（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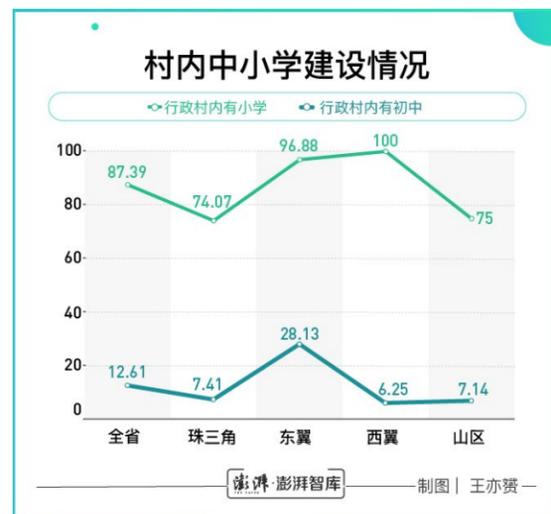


表4显示，全省农村小学年龄段学生在学率平均为99.44%，就学情况相对良好。小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也达到了94.28%，家与学校的距离平均为2.66公里，上学时长平均为12.05分钟。分地区来看，广东各地区小学年龄段在学率均在99%以上，各地小学生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均在91%以上，各地区差距不大。从农村小学建设来看，广东省的情况基本符合就近入学原则。

表4 小学及初中年龄段在校生基本就学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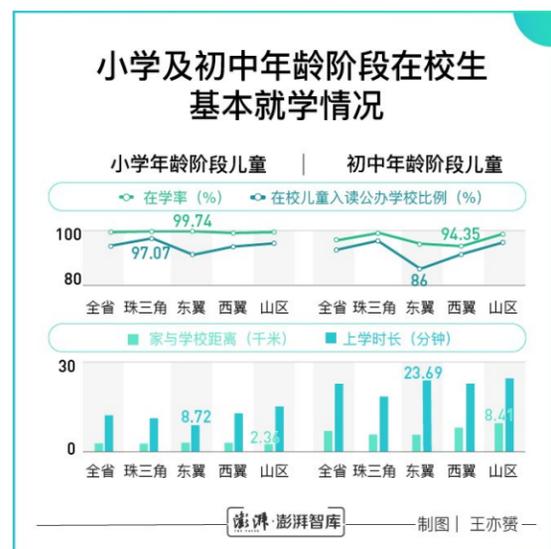


表4所示，广东农村初中年龄段儿童在学率相对偏低（96.64%），控辍保学仍有待加强。分地区来看，各地区中珠三角初中年龄段在学率为最高，占比为99.02%，西翼地区在学率为最低，比例仅为94.35%。初中生的家与学校的距离和上学时长平均分别为6.81公里和22.57分钟，比小学的距离更远且上学时长更长。而从各地区初中生家与学校的距离和上学时长来看，山区学生的上学距离和所需时长均为最高。

报告分析了上学距离与多项学生学习状况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更远学校花费更长时间上学的小学生的成绩排名更令家长不满意，多项教育支出也更高。初中生上学距离越远，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越好，这样正相关的结果和小学生的负相关结果不一致。我们猜测，这可能与撤点并校有一定联系，因为初中生的成绩受学校教学质量影响更大，而更远的、撤并后的初中的教学质量高，而小学生的成绩可能更多受上课精力的影响，因此更远上学距离的小学生成绩反而更差。

## 三、农村留守儿童年龄更小，低年级寄宿情况仍有存在

广东千村调查对留守儿童的定义为“父亲或者母亲近三个月内在县以外打工且一半以上时间不住在家里”的儿童，与教育部过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基本一致。表5显示，2019年广东农村留守儿童的占比为41.31%，留守儿童分不同就学阶段来看，幼儿园阶段的留守儿童占比最高（46.57%），而初中阶段的占比最低（35.52%）。

同时，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的年龄相对要小且显著，留守儿童的年龄平均为8.8岁，而非留守儿童的年龄平均为9.3岁。相比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父母的学历相对更低，其家庭中子女的数量更多，但两类儿童性别差别不大。针对他们的学习状况，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家长更不满意孩子就读的学校，且留守儿童中寄宿的可能性更大，而是否是留守儿童则与孩子的成绩没有显著关系。

表5 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单位：%）



表6报告了寄宿生情况，所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在校生中，寄宿生的占比为11.33%，幼儿园学生中寄宿生的占比最低（1.14%），而初中学生中寄宿生的占比最高（44.08%）。分性别来看，所有幼儿园、小学、初中男生中寄宿的占比为12.04%，所有女生中寄宿的占比为10.59%，男生寄宿的比例略高于女生。样本中寄宿生平均每星期都回家的比例占到了绝大部分（94%），寄宿生平均每学期的住宿费用为398.9元。

表6 寄宿生情况（单位：%）



相比走读生，寄宿生的孩子年龄更大，家中孩子的数量相对更少。同时，寄宿生的教育花费比非寄宿生的各项教育花费显著更高。而两类学生的性别、父母的教育水平、父母外出打工状态、对孩子学校的满意度，以及孩子成绩及其他费用上则没有显著区别。

#### 四、政策建议

根据千村调查的结果，我们对广东省的乡村教育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推进农村学前教育进一步普及。作为经济强省，广东省的学前教育水平与其经济水平并不匹配，要进一步提升人口素质，就要意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级政府一要认真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价值，在资金上给予农村义务教育充分的支持，并要进一步扩大农村公办园数量。

其次，要谨慎进行撤点并校，充分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和特色。虽然撤点并校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整合教育资源，但实际调查结果也反映了撤点并校给学生和家庭带来成绩和支出上的影响。因此，要谨慎稳妥地进行撤点并校。

最后，要重视农村儿童中的特殊群体，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与保护。留守儿童问题的破解之路一定程度上在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快落实“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的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同时，留守儿童的家长也应该肩负相应责任，对留守儿童给予足够的亲情关怀。对于农村寄宿儿童的教育和关爱，政府应该放缓撤点并校的速度，并严格控制低年级学生寄宿数量，学校则应该加强寄宿制的管理，为农村寄宿儿童提供一定的住宿补贴。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文章

## 广东千村调查② | 农村金融割裂，九成赊贷来自亲友，违约率低

农村金融市场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特性，农户借贷或赊账主要是为实现家庭产出最大化、平滑消费。在借款和赊账两种方式中，资金用途、金额和期限，影响着农户在这两种方式之间的选择。

2019年，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针对农村家庭的金融行为在广东全境范围内开展了专题调查，共收集到3622份农户问卷数据。

主要调查发现有：第一，广东省农村农户借款和赊账行为较为普遍：约15%的被调查农户家庭成员在去年一年内借过钱；约8%的被调查农户在过去一年里赊过账。第二，借款来源主要为亲友或熟人，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发生率较低，民间放贷者等非正规金融也基本上不存在。第三，农户借款和赊账作为两种不同的融

资工具在资金用途、金额、期限等方面存在差异。不过借款和赊账在发生率上存在互补关系，而且违约率都很低。这说明农村金融市场具有市场分割的特点，不同的融资工具或渠道服务着不同的融资需求和对象。

#### 全省农村农户借款和赊账行为较为普遍

广东农村地区农户家庭有借款的情况比较普遍。如表1所示，在3529个有效回答中，有14.71%的农户的家庭成员自2018年7月以来有过借款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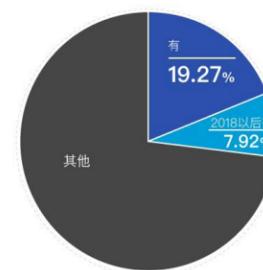
同时，广东农村农户的赊账行为也较为普遍。在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调查的3576户中有19.27%的农户表示家庭成员曾经赊过账，约8%的被调查农户表示在2018年7月之后赊过账。

表一和表二

家庭成员是否借过钱



家庭成员赊账经历



澎湃·澎湃智库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

制图 | 王煜

#### 农户借款主要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村庄附近金融机构过少

如图1所示，500户在去年一年间借过款的农户回答了资金来源。从亲戚朋友处借款是农户最主要的借款渠道（90.00%），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发生率较低（5.80%），私人放贷者和网络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发生率也非常低（3.00%）。由此可见农户亲戚朋友间的互助性借款是绝大多数农户满足资金需求的首要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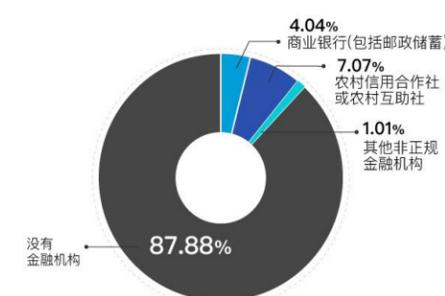
2018年7月至今借过钱的家庭的总数=500

图1 农户2018年7月至今最大笔借款渠道

我们同时调查了各种金融机构在村庄附近的存在状况。表3显示在99个2018年被调查过的行政村中，有87个行政村在去年一年其附近没有新增金融机构，占有效样本的87.88%；没有新增正规金融机构的行政村比例占到88.89%。表4显示在20个新增调查村中，有89.47%的行政村没有任何金融机构（包括正规金融机构）。

表3 自2018年7月起，村内附近是否新增以下金融机构（多选）

自2018年7月起，村内附近是否新增以下金融机构(多选)



澎湃·澎湃智库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

制图 | 王煜

表4 村内或附近是否有以下金融机构（多选）

(20个新增村庄)	村数	占比 (%)
商业银行(包括邮政储蓄)	1	5.26
农村信用社或农村资金互助社	2	10.53
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	0	0
没有以上金融机构	17	89.47

#### 从用途上来看，农户借款和赊账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

调查显示，农户借款主要用于生活和应急；农户赊账主要用于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如图2所示，农户借款主要用于缓冲风险和大项消费：借款有效样本中27.25%的借款用于缓冲风险，包括看病和红白喜事等；50.37%的借款用于大项消费，主要包括建房支出、生活耐用品支出和教育支出三方面；仅有15.49%的农户借款用于投资，包括农业生产投资和工商业经营投资。通过调查赊账的具体物品我们发现农户赊账的主要物品用于从事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图3中，52.67%的赊账的具体物品是化肥；32.74%的赊账的具体物品是农药；9.25%的赊账的具体物品是种苗；6.76%的赊账的具体物品用于养殖牲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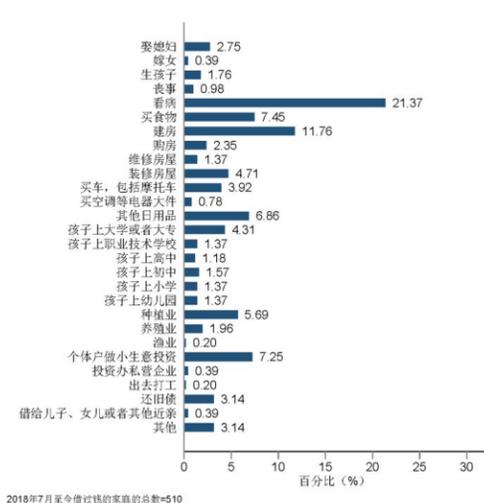


图2 农户最大一笔借款的借款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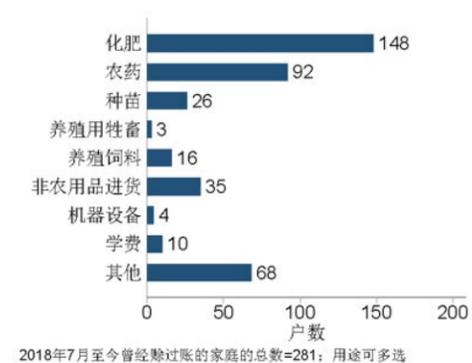


图3 2018年7月至今最大笔除账的具体物品

### 从数量上看, 借钱比除账金额更多

图4、5分别显示了去年农户最大笔借款的金额和最大笔除账物品的价值的分布情况。农户最大笔借款的平均金额为2万元左右; 最大笔除账的平均金额为3000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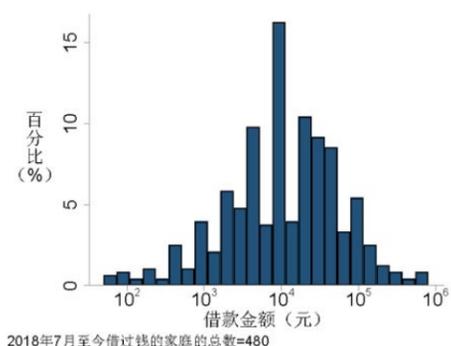


图4 2018年7月至今最大笔借款的金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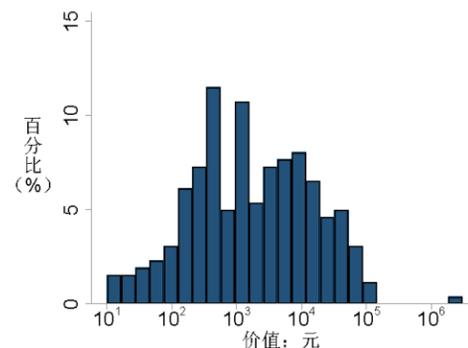


图5 2018年7月至今最大笔除账的物品价值

### 从期限上来看, 农户借款的还款期限比除账的还款期限更长

调查显示, 农户借款的还款期限一般为1年左右。图6中, 有66.27%的农户约定一年内还款。农户除账的还款期限更短, 图7显示约一半的除账(49.79%)需要在当月还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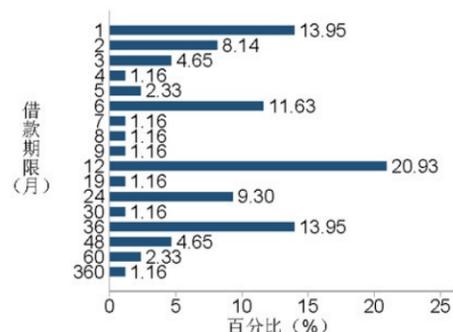


图6 约定的还款期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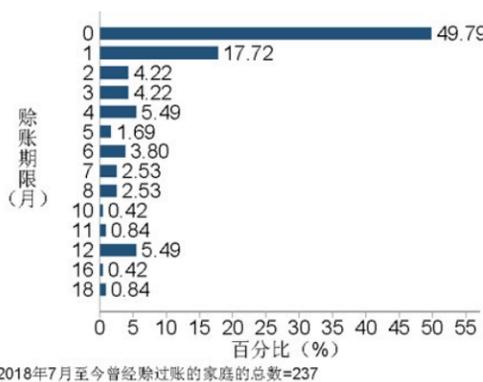


图7 2018年7月至今最大笔除账约定的除账期限(月)

### 从发生率上来看, 农户借款和除账具有互补关系

对农户的借钱和除账行为进行相关分析, 发现农户借钱和除账两种行为的相关系数为正(0.16), 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借贷人在获得借款和除账的可能性上具有一致性: 能获得借款的人也有更多可能性获得除账; 能获得除账的人也有更多可能性获得借款。这反映了在农村金融市场上, 同一农户在是否愿意以及是否有能力还钱和还账上面具有一致性。

### 从违约率上来看, 农户借款和除账的违约率都比较低

借款和除账都是农户在同一个农村社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金融行为, 农村社区成员之间相互知根知底, 交易行为的监督执行成本低, 可以有效地防止违约情况地发生。我们的调查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贷款人是否还会再次借款给借款人从侧面反映了农户借款的违约情况。从表6中可以看出, 69.70%的借款人认为还会再从贷款人处借到钱; 23.48%的借款人认为不确定但可能还会。由此可见, 绝大多数农户私人借贷出现违约的可能性低。

相似的, 是否还会再次得到除账从侧面反映了农户除账的违约情况。从表7中可以看出, 87.45%的农户认为还能再次除账; 8.12%的农户认为不确定但可能还会再次除账。由此可见, 绝大多数农户除账出现违约的可能性也不高。

表6 借钱给您的人是否将来在您需要时还会借给您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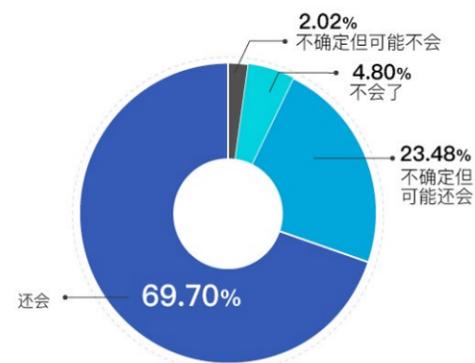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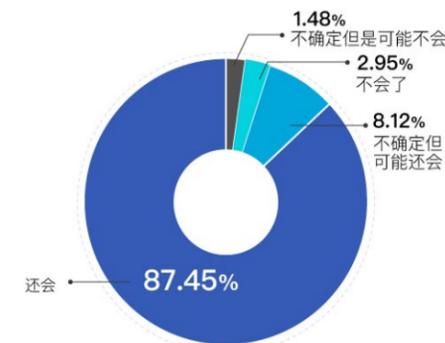


表7 除账给您的人是否愿意将来有需要时继续除账给您



澎湃·澎湃智库

数据来源: 暨南大学

制图 | 王煜

### 政策建议

目前农村借贷以生活性借贷为主。以生产为目的的借贷发生率低, 以生产为目的的除账规模小、期限短。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农村产业的落后。没有可预期的产业发展, 也就不会产生足够的生产性信贷需求。没有足够的产业需求, 不仅正规金融机构不会主动进入农村, 非正规金融机构也不会。

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实现农村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城乡协同发展的根本之道。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需要我们在人才要素上放松人口流动的限制, 均衡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配给; 需要我们在土地要素上努力实现城乡同权; 需要我们在资本要素上明晰产权、增加市场调节、完善市场供给。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将从根本上扭转人才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单方面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出的非正常状态, 扭转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失衡, 从而长远地可持续地推进农村的发展。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月文章

## 广东千村调查③ | 警惕“福利悬崖”， 财务公开确保“真”脱贫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于2018年发起的“广东千村调查”项目，于2019年7月至8月开展第二轮广东省千村调查，深入广东乡村进行了入村入户调研，课题组从行政村、农户两个层面开展数据收集，使用分层抽样法抽取广东省119个行政村，并对3622户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调查内容涉及农户的人口特征、收支、生产、就业、以及农村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现状、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承包地及宅基地改革、农村金融改革、乡村教育等方面。澎湃新闻授权刊发部分章节。本文描述了广东农村扶贫现状，贫困户依然存在返贫风险。

截至2018年底，广东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总体实现，92.88%的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0%以上相对贫困村达到出列标准。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精准扶贫战略的现状，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于2019年7月针对全省25个区县进行了第二轮广东千村调查，访问了超过3600户农村家庭。本报告立足于本轮广东千村调查的数据，旨在了解和发现广东精准扶贫的进展及问题，并为当前和下一步缓解相对贫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扶贫资金充分到位

从两个年份的贫困发生率来看，2019年贫困户占所有家庭的比例相对于2018年有所下降。2018年中的非贫困户中仅有1.69%的家庭在2019年成为贫困户；而2018年的贫困户家庭中有超过一半（51.35%）的家庭在2019年脱贫。在这些脱贫户中，继续接受政府补助的比例为58.44%，西翼地区是脱贫户中继续接受补助比例最高的地区，仍有76.97%的脱贫户继续享受政府补助。从贫困户的动态变化来看，广东省脱贫较为理想显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脱贫不脱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图1：广东省脱贫工作进展

表1 2018-2019年家庭贫困状态转换

2018年状态	2019年状态		家庭数
	非贫困户	贫困户 (%)	
非贫困户	2217 (98.31%)	39 (1.69%)	2310
贫困户	76 (51.35%)	72 (48.65%)	148

2019年，广东省农村贫困户户均财政扶贫资金为11051元，户均对口帮扶单位资金为3662元，户均社会捐赠资金为1907元，户均总扶贫资金达到16620元。地区间各项扶贫资金表现出较大差异，珠三角地区户均财政扶贫资金最高，达到了23050元；山区的对口帮扶单位资金收入较多，户均超一万元；东翼的社会捐赠资金获得最高，平均每户达6364元。总的来说，珠三角地区的户均总扶贫资金最高，达到户均24748元，超过两倍西翼地区的户均总扶贫资金（10246元）。从省级财政和社会帮助资金来看，广东省对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表现出了极强的支持力度。

表2 全省分区域扶贫资金概况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户均财政扶贫资金 (元)	11051.05	23050.17	3450.33	8154.03	12167.52
户均对口帮扶单位资金 (元)	3661.79	1401.69	1510.45	1809.22	10538.16
户均社会捐赠资金 (元)	1907.06	296.14	6364.34	282.35	596.43
户均总扶贫资金 (元)	16619.90	24748.00	11325.12	10245.60	23302.11
户均实收扶贫资金 (元)	3669.84	3631.04	2622.06	5022.62	2726.02
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收益分红的比例 (%)	30.77	13.44	26.28	36.53	44.97

### 户均收入明显提升，但可能存在“福利悬崖”效应

从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收入对比来看，贫困户与非贫困户2018年人均收入均高于省定4000元的贫困标准。其中，2018年和2019年均非贫困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为11457元，2018年和2019年均贫困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为7602元。可见，广东省的贫困户收入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转和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脱贫的人均收入为四类家庭中最低，甚至低于两年均为贫困户的家庭。这是由于两年均为贫困户的政府转移收入为四类群体中最多（2144元），而2019年脱贫的家庭政府转移收入仅为779元。这些转移支付使得两年均为贫困户的家庭与2019年脱贫的家庭中存在接近10%的收入差，脱贫的福利悬崖效应比较明显。而在剔除政府转移收入后，两年均为贫困户的人均家庭收入便显著低于2019年脱贫的家庭。从家庭收入构成来看，两年均为贫困户的家庭相对其他三类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政府转移收入比例较高，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比例较低，显示出这些家庭自立能力较弱。

表3 四类贫困状态家庭收入构成

2018年	两年均非贫困户	2019年入贫	2019年脱贫	两年均为贫困户
人均家庭收入 (元)	11456.87	7868.07	6816.45	7602.97
人均家庭收入 (除去政府转移收入) (元)	11259.85	6998.73	6037.36	5458.93
收入构成 (元)				
农业经营收入	770.67	205.13	303.11	899.10
非农经营收入	1866.71	452.14	479.77	455.17
工资收入	6600.23	4984.08	4112.67	3263.93
财产收入	318.17	53.02	119.80	75.25
非来自政府转移收入	1543.27	1272.96	956.02	705.40
政府转移收入	197.02	869.33	779.10	2144.04

### 扶贫程序认知有待加强，财务公开未充分到位

干部和群众对政策精准了解、严格执行认定流程，是精准识别贫困户的保证。但从建档立卡户评定的流程和规范来看，村干部和贫困户对于建档立卡户的评定过程都有不清楚、了解错误的情况。

表4显示约有42%的受访贫困户认为自己是村干部指定成为贫困户，另分别有9.5%和13.6%的贫困户认为自己是“村民小组评选推荐，村干部指定和“村民小组评选推荐，村干部投票决定”，选择“其他”的25.4%的贫困户中有较高比例的受访者认为是“自己申请，上级批准”。

表4 建档立卡户确定方式

建档立卡户确定方式	比例 (%)	家庭数
村干部指定	42.01	71
村民小组评选推荐，村干部指定	9.47	16
村民小组评选推荐，村干部投票决定	13.61	23
全体村民投票决定	9.47	16
其他，请说明	25.44	43

千村调查数据对受访村干部关于贫困户认定的询问显示（图2），全省仍有12%的行政村村干部认为本村采用的贫困户认定的收入标准是国家标准2736元，存在对精准扶贫政策了解不到位的情况。另外，全省有约34%、珠三角有67%的村庄采用的是市定的更高扶贫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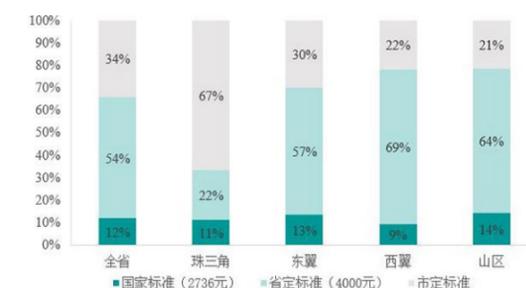


图2 贫困户认定采用的收入标准

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显示，扶贫资金使用情况未做到百分百公示，全省约有88.14%的行政村对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公示。分区域来看，仅西翼地区管理最为到位，其他地方均未做到百分百公示，其中珠三角地区进行公示的行政村比例仅有73.08%。虽然广东省扶贫办发布的《广东省扶贫开发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明确规定，涉及扶贫资金项目有关信息内容应当主动予以公开，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扶贫资金阳光化行动仍需继续推进。

表5 扶贫资金公示情况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示的比例 (%)	88.14	73.08	84.38	100	92.86

### 帮扶措施主要用于“输血”而非“造血”

从广东省农户获得各项帮扶的类型来看(表6),农户获得帮扶类型最多的前三项为:“教育费用减免,学生生活补助”(28.19%)、“医疗救助”(28.19%)、“危房改造”(19.46%),生产补贴和安置就业相对较少。对于发放到农户的扶贫资金,图3显示大部分农户将收到的扶贫资金用于生活消费(57.1%)、看病就医(42.3%)和子女教育(34.9%),从农户的使用来看,也主要集中于日常生活而非投入生产。

表6 农户获得各类帮扶类型的比例(多选)

	获得帮扶比例 (%)
农林牧渔生产	17.45
农产品加工	1.34
危房改造	19.46
教育费用减免,学生生活补助	28.19
医疗救助	28.19
专业技能培训	6.71
就业辅导	4.03
安置公益性岗位就业	1.34
扶志教育	1.34
其他	12.75
没有获得任何帮扶	3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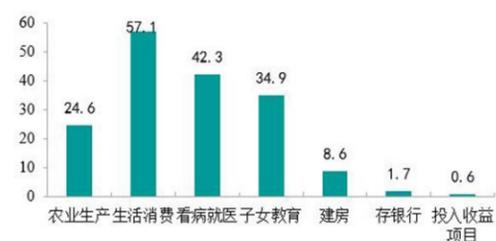


图3 贫困户获得扶贫资金的主要用途 (%)

### 政策建议

一是深入把握政策要点,加强扶贫流程的宣传和公开。对于基层工作人员,要求牢牢把握精准扶贫各个环节的政策要领,全面熟悉精准扶贫过程的程序和各项措施,做到程序透明,心中有数。基层政府也要加大对群众的扶贫政策宣传,鼓励群众参与扶贫工作,及时消除群众对扶贫工作中的疑惑和误解。

二是因人施策进行帮扶,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在接下来的扶贫工作中,需要更重视个体贫困的特性和差异性,制定具有个人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帮扶措施,着重于解决贫困户个体最主要的问题,使扶贫效果具有可持续性。

三是严格警惕福利悬崖,严格管理贫困户进出机制。管理部门需要广泛听取基层意见,与研究机构合作制定科学的建档立卡户进退机制,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同时,应重视贫困户的福利叠加问题,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外的边缘贫困人口也应实施一定地帮扶政策,如发动引导社会力量进行帮扶等。

四是不断巩固脱贫成果,建立长效稳定的帮扶机制。在广东完成精准脱贫伟大任务的“后扶贫时代”,政府应该将扶贫工作向常态化、制度化的模式转变,构建多部门协作、社会力量参与的稳定型工作机制。同时,应当充分利用现有基层信息资源,事前监测贫困户和贫困边缘群体的贫困动态变化,做到主动回应贫困对象的需求,严格控制返贫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实现政府工作机制的优化和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月文章

## 广东千村调查④ | 农民参保积极,买药看病多选择自费

农村养老和社会保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随着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农村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目前正在逐步向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养老保险制度过渡,农村医疗养老服务体系也日趋完善。然而,由于各地农村政策的推进程度不一,伴随着愈加快速的城镇化和农村空心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 新农合参保率高,医保报销了解程度低

总体而言,广东农村居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参保率很高,近三年均分布在90%以上,2018年全省平均覆盖率达到93.18%,山区新农合覆盖率为最高,达到96.21%。广东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参保率则相对较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上升比例约在每年2%。2018年,全省农村新农保覆盖的比例超过70%,达到了72.17%。分地区来看,各地区参保率略有差异,但差异的绝对值不大。其中,西翼地区相对参保率较低,山区参保率最高,为74.19%。

表1 近三年新农合参保率单位: %

年份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2016	91.85	89.54	92.25	92.03	93.41
2017	92.68	90.89	92.91	91.95	94.99
2018	93.18	91.30	93.06	92.22	96.21

表2 近三年新农保参保率单位: %

年份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2016	67.54	67.83	69.40	65.24	67.59
2017	69.80	70.73	70.74	67.65	70.24
2018	72.17	73.10	71.38	70.42	74.19

关于药品限价表,广东农村地区参与新农合的受访者没听说/不知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品限价表的比例高达92.41%,有了解过和很清楚的比例仅为1.50%和0.31%。具体来说,各个地区的受访者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药品限价表了解程度差异性不大。

表3 药品限价表了解情况单位: %

了解程度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没听说过/不知道	92.41	91.24	93.34	92.10	92.78
知道,但不了解	5.79	7.47	5.61	5.05	5.35
有了解过	1.50	1.01	0.93	2.31	1.62
很清楚	0.31	0.29	0.12	0.55	0.25

关于慢性病补助申请,总体来看,整个广东农村地区只有0.99%的家庭有申请慢性病补助。其中珠三角地区有2.24%的家庭申请慢性病补助,所占比例为四个地区中最多,东翼地区申请慢性病补助的家庭最少(0.21%)。

表4 申请慢性病补助情况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已申请	0.99	2.24	0.21	0.62	1.07
未申请	94.97	96.11	93.15	94.71	96.21
不知道	4.03	1.65	6.64	4.67	2.73

### 轻病自费治疗

2018年广东农民地区受访家庭购买药品平均花费2055.64元,报销比例平均为11%。从地区差异性来看,东翼地区和山区的家庭药品总花费平均在2200元以上,珠三角地区和西翼地区较少,分别为1758元和1763元。东翼地区的药品花费报销比例最低,且与其他三个地区差异性较大。

总的来说,受访人群的轻病处理方式,主要集中在药店自己买药,去村诊所、私人诊所、村卫生所治疗,所占比例都在40.00%以上,而选择县城医院、市级医院、省城医院的比例较低,均低于10.00%。

表5 药品花费情况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药品总花费(元)	2055.64	1757.71	2356.07	1762.52	2294.59
药品花费报销金额(元)	226.65	194.28	85.97	232.53	370.02
药品花费报销比例(%)	11	11	4	13	16

表6 村民轻病处理方式(多选)单位: %

方式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去药店自己买药	49.51	53.33	40.90	52.04	52.62
村诊所私人诊所	43.39	35.12	62.03	38.87	35.60
村卫生所	41.39	51.79	26.05	44.83	44.52
乡镇卫生院	32.37	48.10	11.19	35.01	37.74
县级医院	6.57	9.76	3.87	5.54	7.62
市级医院	2.64	4.05	1.26	2.93	2.50
省城医院	0.31	0.95	0	0	0.36
其他	3.09	4.64	3.14	2.19	2.50

### 农村老人收入偏低,部分无人看管

总体来看,广东省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15%,老龄化现象明显。具体来看,各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中,西翼地区及山区的比例(13.35%和12.95%)较珠三角和东翼地区的更低(16.21%和15.87%)。

广东农村老人的月收入是比较低的,总体而言,老人平均月收入金额约为933.66元,其中来自养老金的收入为327.96元,占比约为三分之一。分地区来看,珠三角地区的老人月收入最高,为1180.33元,其养老金收入也是最高,为562.39元。其次是东部地区,为1001.85元;再次是山区,为856.2元;最后是西翼地区,月收入仅为701.86元。

表7 平均月收入情况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月收入金额(元)	933.66	1180.33	1001.85	701.86	856.20
其中来自养老金的金额(元)	327.96	562.39	298.38	170.77	299.28

广东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老人无人看管的情况,全省平均有14.29%的村庄存在此种现象,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从具体地区的差异性来看,东翼和珠三角村庄存在老人无人看管的比例较低,其中,珠三角地区村庄老人无人看管的比例为7.41%,东翼地区该比例为6.25%。而在西翼地区和山区有相当比例的村庄有此类现象,其中,西翼地区有25%的村庄存在老人无人看管的情况,山区则有17.86%的村庄存在老人无人看管的情况。

表8 村里是否有老人无人看管单位: %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有	14.29	7.41	6.25	25	17.86

### 老人日常生活较为单一

广东农村老人的日常活动较为单一,主要是干家务活、农活和带小孩,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创办企业的占极少数。其中干家务活的占比最大,为75.39%,其次为干农活(51.64%)和带小孩(41.09%)。分地区来看,珠三角地区老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5.12%)和进行打牌、下棋、跳广场舞等娱乐活动(18.42%)的比例相对更高。

表9 老人日常活动情况(多选)单位: %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干家务活	75.39	78.67	64.61	79.85	79.78
干农活	51.64	52.63	39.12	57.86	58.36
带小孩(包括孙子女、其他小孩等)	41.09	41.69	37.49	41.03	44.74
创办企业、做生意	1.79	1.80	1.98	1.60	1.75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3.44	5.12	2.56	3.44	2.83
打牌、下棋、跳广场舞等娱乐活动	13.61	18.42	8.96	12.90	15.09
其他	20.78	20.64	27.82	14.62	19.54

老人健康状况一般,体检比例偏低。广东农村地区老人健康自评情况普遍一般,有较多老人认为自己身体情况不好。具体而言,健康状况一般的占比最大,为44.14%;健康状况不好和很不好的分别占比23.99%和6.99%,比例相对较高。

其中珠三角和东翼地区老人健康自评状况选择“很好”和“好”的比例较高,珠三角地区选择“很好”和“好”的比例总和为28.96%,东翼地区选择“很好”和“好”的比例总和为30.26%。西翼地区老人健康自评状况相对较差,选择“不好”和“很不好”的比例都较高。

表10 老人健康自评情况单位: %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很好	7.70	9.97	9.33	5.17	6.41
好	17.19	18.99	20.93	12.27	16.49
一般	44.14	43.99	47.67	40.43	44.24
不好	23.99	22.81	17.41	32.97	22.91
很不好	6.99	4.23	4.66	9.15	9.95

广东农村老人做过体检的比例较低,农村老人的体检项目仍有待普及。具体而言,广东农村整体上有53.31%的老人做过体检,其中东翼地区老人做过体检的占比远低于平均值,仅占36.68%,山区老人做过体检的比例占55.75%<https://oms.thepaper.cn/oms/ext/fckeditor/editor/images/spacer.gif>,略高于平均值,两个地区需重点进一步普及。

表11 老人是否做过体检单位: %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体检过	53.31	60.50	36.68	62.38	55.75

### 小结

村民治病主要在县医院、乡镇内的医疗机构或者靠自己买药,另外,村民普遍对药品限价表不了解。需要加强农村医保方面的宣传,适当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和医务人员培训。农村老龄化明显,留守比例较高,老人收入普遍偏低。需要构建各个部门的联动机制,通过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来搭建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

农村老人身体状况一般、进行体检的比例偏低。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资金和政策的扶持,逐步使所有农村老人享受免费体检。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月文章

## 广东千村调查⑤ | 农村就业率刚过半,不足3成农民进城务工

### 农村劳动力就业率下降,省外务工比例上升

农民的就业收支情况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同时,农村创业创新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2019年广东千村调查就针对广东农村的就业收支情况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除了包括就业情况、收支情况和非农经营情况三个方面以外,还针对近年来“人情变味”、“人情压力”给大众造成负担这一现象,额外关注了人情往来情况。

通过将连续两年访问到的样本进行对比分析显示,广东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率由2018年60.75%下降到2019年的55.77%(图1),其中山区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由57.23%下降到51.33%。而广东农村16岁及以上人口有劳动能力未工作的比例由2018年的2.46%上升到2019年的5.20%(图2),其中珠三角地区上升幅度最大,由1.93%上升到6.44%。就业率的下降和有劳动能力未工作比例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图1 16岁及以上人口就业率 (%)



图2 16岁及以上人口有劳动能力未工作的比例 (%)

珠三角和东翼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例略有上升(图3)，分别从2017年的17.38%和20.73%上升到2018年的19.18%和21.95%。而西翼和山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例略有下降，分别从2017年的38.32%和50.54%下降到2018年的34.53%和47.95%。总体来看，广东农村劳动力跨县外出务工比例变化不大，均在三成左右(31.16%和30.14%)。横向比较来看，山区和西翼地区外出务工比例仍明显高于珠三角和东翼地区。



图3 广东农村劳动力跨县外出务工比例 (%)

注：图1、2、3数据来源于2018和2019年广东千村调查个体面板数据

2017年和2018年全省外出劳动力在珠三角务工的比例相差不多(表1)，分别为80.41%和80.50%，在粤东地区务工的比例有所下降(15.36%下降到12.38%)，而在省外务工的比例略有上升(4.23%上升到7.13%)。分地区来看，东翼农村劳动力就近务工的比例有所提高(19.61%提升至27.16%)，而西翼和山区农村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集聚的趋势有所加强，分别从74.93%和87.18%上升至82.2%和88.29%。而且四个地区省外务工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其中山区提升的程度最大，近2.6倍。

表1 广东农村跨县外出务工劳动力工作区域分布的变化 单位：%

流出地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2017	2018	2017	2018	2017	2018	2017	2018	2017	2018
珠三角	80.41	80.50	93.81	86.92	73.86	62.35	74.93	82.20	87.18	88.29
粤东西北	15.36	12.38	0	3.74	19.61	27.16	20.70	11.33	11.11	7.21
省外	4.23	7.13	6.19	9.35	6.54	10.49	4.37	6.47	1.71	4.50

注：数据来源于2018和2019年广东千村调查个体面板数据

### 农户收入主要源于工资，食品烟酒消费比例最高

从收入构成来看(表2)，2018年广东农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依次是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分别为61.29%、19.88%和15.73%。分地区来看，山区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占比最高，达到63.91%；西翼农户经营性收入占比最高，达到26.67%；珠三角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均为最高，占比分别为8.93%和20.37%。

表2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构成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平均每户常住人口(人)	3.78	3.56	3.87	3.93	3.74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年)	17169.77	19263.17	16708.78	14844.61	18152.36
工资性收入	10523.05	11192.92	10392.05	9085.32	11601.09
经营性收入	3413.98	2427.25	3922.86	3959.22	3255.21
财产性收入	532.55	1719.74	156.97	73.31	245.32
转移性收入	2700.20	3923.27	2236.90	1726.76	3050.73
单位：%	收入构成				
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	100	100	100	100
工资性收入	61.29	58.11	62.20	61.20	63.91
经营性收入	19.88	12.60	23.48	26.67	17.93
财产性收入	3.10	8.93	0.94	0.49	1.35
转移性收入	15.73	20.37	13.39	11.63	16.81
样本规模	3275	790	839	872	774

从消费构成来看(表3)，2018年全省农户食品烟酒消费占比最高，达到38.35%；其次是居住支出、交通

通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为19.25%、12.00%和11.90%。分地区来看，东翼农户食品消费占比最高，达到46.32%；珠三角农户交通通信支出占比最高，达到16.98%；山区农户居住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最高，分别为22.63%和14.54%。

表3 家庭人均消费及构成

地区	户数	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家庭占比 (%)
全省	3597	10.20
珠三角	844	9.83
东翼	957	15.15
西翼	958	7.52
山区	838	7.88

### 全省农户非农经营状况欠佳，需要资金及销售渠道支持

(一) 广东省农户工商业经营项目参与度不高，地区间差异较大

从省级层面上来看，广东省农村家庭非农经营行为并不普遍，仅有10.20%受访者家庭从事非农经营项目。省内农户参与非农经营项目行为的地区差异较大，东翼地区最高(15.15%)，西翼最低(7.52%)。

表4 广东省农村家庭参与非农经营情况

地区	户数	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家庭占比 (%)
全省	3597	10.20
珠三角	844	9.83
东翼	957	15.15
西翼	958	7.52
山区	838	7.88

从表5可以看出，目前正在从事非农经营项目的农户中，三成以上的家庭经营项目持续时间已超过十年(31.88%)。但新开始的非农经营项目所占的比例也较为可观，最近五年开始经营的比例为44.93%，显示出了近年来农户进行非农创业活动的热情。

表5 农村家庭非农经营活动开始时间

	户数	占比 (%)
2019年以来	32	9.28
2017-2018	54	15.65
2014-2016	69	20.00
2009-2013	80	23.19
2009年之前	110	31.88

(二) 农户非农经营规模较小收益偏低

家庭非农经营内容以实体店个体户为主(66.37%)，另外有15.93%的家庭选择除实体店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和经营企业外其他类型的经营项目。从经营开始的时间趋势来看，虽然近年来家庭创业项目仍以实体店个体户为主，但选择网店和运输这类新型的经营项目的家庭比例有较大增加，从2017年之前的不足10%上升至2017年之后的15%左右。

大部分家庭的非农经营项目都是小规模经营，以家庭成员参与为主。表7显示，82.57%的家庭没有从家庭外雇佣帮手。表8进一步显示，家庭经营项目经营收入较低，超过56%的家庭每月经营收入不到4000元。

表6 农村家庭非农经营内容

经营项目开始时间	总户数	经营内容					
		实体店个体户 (%)	租赁 (%)	运输 (%)	网店 (%)	经营企业 (%)	其他 (%)
2019年以来	32	50.00	0	15.63	15.63	6.25	12.50
2017-2018	53	54.72	1.89	15.09	15.09	1.89	11.32
2014-2016	67	79.10	0	2.99	2.99	4.48	10.45
2009-2013	78	69.23	0	6.41	2.56	5.13	16.67
2009年之前	109	66.97	0	6.42	0.92	3.67	22.02
总计	339	66.37	0.29	7.96	5.31	4.13	15.93

表7 农村家庭生产经营规模

经营项目雇佣家庭外人数(人)	户数	占比 (%)
0	289	82.57
1-2	31	8.86
3-5	20	5.71
6-10	8	2.29
10+	2	0.57

表8 农村家庭生产经营收入

每月经营收入	户数	占比 (%)
1000元及以下	82	24.55
1001-2000元	43	12.87
2001-4000元	63	18.86
4001-7000元	33	9.88
7001-10000元	10	2.99
10000元以上	24	7.19
不清楚	79	23.65

(三) 非农经营项目主要需要资金和销售渠道支持

表9进一步显示，农村非农经营项目主要希望得到资金和销售渠道的支持，占比超过25%，但不同经营类型的家庭希望获得的最主要帮助略有差别。

表9 家庭经营项目最需要获得的帮助

家庭经营类型	户数	希望获得各项帮助的家庭比例(%)					
		税收优惠	初始创业资金	经营管理培训	销售渠道支持	其他帮助	不需要帮助
实体店个体户	207	13.53	27.05	4.83	23.67	7.25	23.67
租赁	1	0	0	0	0	0	100
运输	24	12.50	37.50	0	25.00	12.50	12.50
网店	15	13.33	26.67	0	46.67	6.67	6.67
经营企业	14	35.71	35.71	0	21.43	7.14	0
其他	51	5.88	23.53	5.88	27.45	7.84	29.41
总计	317	12.93	27.80	4.10	25.60	7.60	22.10

### 多数地区葬礼收不抵支

全省平均来看,农村家庭一年总人情支出约为1666元,以三口之家来看,人情支出仅占家庭总收入3%。分地区来看,珠三角地区经济最为发达,但总人情支出最少,仅为1320元。西翼和东翼地区人情较重,东翼每笔随份子数额最高,平均为322元,西翼地区年人情支出最高,达到1906元。

表10 各地人情支出概况

地区	调查户数	随份子平均每笔(元)	总人情支出(元)
珠三角	745	229.91	1320.24
东翼	733	322.43	1889.14
西翼	881	194.58	1906.22
山区	778	198.20	1516.18
全省	3137	233.74	1666.33

人情往来较为重大的两件事为婚礼和葬礼。从中位数来看(表11),东翼地区的婚礼收入最低为2000元,西翼地区婚礼收入最高为15000元。另外,全省彩礼支出的平均数为3.1万元,中位数为2万元,为全省农村人均家庭收入的1.18-1.82倍。

表12展示了葬礼收支情况,其中东翼地区对葬礼最为重视,葬礼的支出中位数达到了5万元,为全省农村人均年收入的2.9倍,葬礼收入也达到了1.75万元。珠三角、西翼和山区葬礼支出相对较低,并且葬礼收入的中位数均为0,显示出有超过50%的家庭举办葬礼未收取份子钱。总体来说,在四个地区举办葬礼都是收不抵支,葬礼的支出对于家庭来说仍是一笔较大的负担。

表11 各地的彩礼支出和婚礼收入(备注:全省3622户中抽样数据)

地区	给彩礼次数	彩礼支出(元)		婚礼次数	婚礼收入(元)	
		平均数	中位数		平均数	中位数
全省	85	31217.87	20000	94	14000.83	9100
珠三角	11	70812.50	30000	14	19944.45	4500
东翼	24	34524.40	35000	27	12857.90	2000
西翼	34	17424.40	10000	37	13806.56	15000
山区	16	28499.93	29500	16	11870.83	9100

表12 各地葬礼支出和收入(备注:全省3622户中抽样数据)

地区	葬礼次数	葬礼支出(元)		葬礼收入(元)	
		平均数	中位数	平均数	中位数
全省	122	26024.41	12000.00	13844.96	200
珠三角	22	20657.50	8250.00	5052.63	0
东翼	46	47809.09	50000.00	38230.77	17500
西翼	27	13277.27	13000.00	2680.00	0
山区	27	12227.78	7333.33	2241.27	0

### 政策建议

根据千村调查的结果,我们对广东省的就业及收支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警惕广东农村地区就业率下降的趋势,确保农村劳动力就业稳定。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增大。与城镇地区的失业统计不同,农村地区的失业具有隐蔽性,容易被忽略。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人群中有相当比例是毕业却待业的学生,值得特别关注。政府应做好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失业统计工作,做好就业帮扶,确保就业稳定。

第二,粤东北劳动力向珠三角集聚的趋势明显,劳动力就近就业的比例有待提高。数据显示,粤东北山区尤其是西翼和山区的农村劳动力超过80%前往珠三角地区务工。农村人口进城后的稳定就业是城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缺乏就近的非农工作机会,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翼和山区城镇化率偏低。受新冠疫情影响,粤东北劳动力前往珠三角务工明显受阻。短期内,政府应该做好粤东北劳动力就近非农就业的工作,降低疫情对农民工的收入负面影响。长期来看,应该进一步发挥粤东北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吸引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月文章

## 对话

# 《南方日报》对话张思思:多维度护航房企健康发展



张思思

2019年的房地产行业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家在“房住不炒”和“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政策基调下,始终未放松对市场的调控力度。各地方通过因城施策,科学有效地引导行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HFI-60指数创立的初心是要以多维度的企业体检报告来为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近日,HFI-60指数独家学术支持团队负责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张思思博士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2020年整个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同在,建议房企加快转型脚步,以更好的专业能力服务当下社会民生需求。

**南方日报:从HFI-60全年指数如何看出2019年我国房地产经济的晴雨状况?数据处理和技术上如何把控?**

张思思:HFI-60指数是目前第一个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而设计的房企健康指数产品,榜单纳入了粤港澳大湾区60家具有代表性的房地产企业作为监测样本,能够较全面地反映粤港澳大湾区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概貌。

在监测指标上,我们综合考察和评估企业的财务数据、舆情分析和社会责任等方面,构建监测房企健康发

展状况的量化综合评估指标体系。HFI-60指数只认可和接受上市房企的半年和全年财务公告数据。

事实上,客观可靠的数据已经包含了企业发展现状的信息,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数据自己说话,减少人为主观因素干扰。在指数构建的技术方法上,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每个指标贡献较多的成分因子,以此得到指标的权重。相比于主观赋值法,该方法得到的结果更加客观。我们通过综合评价体系给样本企业打分,考察房企的健康发展状况,从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房地产业的发展状况。

**南方日报:根据2019年HFI-60指数,您对60家房企的健康发展状况有何看法?**

张思思:判断企业的健康发展状况,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财务健康方面包括企业规模、盈利质量、现金流状况、偿债能力等;公共关系方面包括消费者权益保障、合规合法经营等;社会责任方面包括参与公益事业、社区规范治理等。

所以,HFI-60指数榜单的排名不是单纯考虑资产规模和扩张速度。根据本次监测结果,我们发现一些房企虽然资产规模较小,但在资产管理、现金流管理、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表现突出,所以总健康指数得分较高,他们未来的表现值得关注。而一些大型房企会因为其负债情况和现金流状况表现一般,其总健康指数得分相对较低。

**南方日报:高负债依然是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面对疫情冲击,企业应该如何守好底盘、抗御风险?**

张思思:资管新规和房住不炒调控周期开启后,房企的融资端和销售端都面临较大压力。叠加今年疫情对购房需求造成一定冲击,房企销售回款速度明显下降。

净负债率可以反映上市房企的负债情况，我们对该指标进行了监测。总体而言，2019年60家样本房企平均净负债率达到113.31%，其中有5家房企超过200%，可以看出房企总体负债情况比较严峻。可能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些中小房企进入破产申请或重组，项目并购数目也会增加，房地产行业进一步分化。

在资金收紧的背景下，房企存货周转、现金流管理、成本把控等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房企需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注重现有存货的管理和销售，尽快回笼资金；另一方面在融资、开发和销售等环节上做好成本管控，符合条件的房企可以通过上市、房地产信托等多途径融资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同时也需要我国金融体系支持房企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对过往信用记录良好、暂时资金周转困难的房企的贷款予以展期。

南方日报：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城市群和都市圈时代，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亦有明显指向，未来房地产企业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张思思：一线城市土地开发空间逐渐减少，居民家庭增加杠杆的幅度也有限，参考其他国家都市圈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我国房企需要逐渐实现生活服务、产业引导、城市运营的战略转型，这能够给房企带来更稳定和长期的现金流入，也更好地服务当下的社会民生需求。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深入推进城镇保障房建设，这需要政府、开发商和金融机构多方合作，可以试点探索PPP、BOT等融资模式建设保障性住房。

最后，此次疫情也凸显了“宜居城市”的重要性，房企可以围绕居民需求，做好服务商角色，例如提升社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完善配套生活保障设施，为居民提供附加值服务。

本文首发在《南方日报》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月文章

## 专访邱筠、史炜：用科学的研究 记录这场无硝烟的战争



史炜、邱筠

近日，我院邱筠、史炜老师与耶鲁大学学者的合作论文即将在人口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人口经济学》）上发表。该文研究了我国的防控政策如何遏制了由人口流动产生的疫情扩散，对其他国家应对当前疫情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全球劳动组织（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上对该文章的主要发现进行了报道。我们就此

采访了邱筠、史炜这对学术伉俪，了解该篇论文背后的故事，以更加深刻地回顾和反思这场还未结束的无硝烟战争。

### “面对疫情，我们能做些什么？”

1月22日，邱筠和史炜自驾回江西过年，一路上，所到之处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22日途经赣州，发现当地的口罩果然已经完全脱销。1月20日，钟南山即表示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回到家后，两人的弦崩得更紧了。在自我小心防护的同时也提醒家人们不要到处走动。短暂地返乡后，两人在大年初四返回广州。后来两人从新闻得知，就在他们返程当天，途经的县城有一位医生在防疫期间突发疾病去世。这对邱筠的触动很大。关于灾难，邱筠的成长中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然而那时的她尚年幼，对灾难给人的打击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内心没有受到较大冲击。但这次，她觉得“心里过不去，特别难受”。“每天我都被各种惊人的数据和

信息淹没，为了振作起来，我需要从自己擅长的方面做一些事情。多年后当我回头看这场灾难，无论有没有用，至少我努力过。”

史炜和妻子的想法不谋而合，面对每天都在快速上涨的感染数据和死亡数据，他感到紧迫。两人在广州宅家的日子里，一起翻阅整理了相关文献，决定一起做一研究。

### “好的研究重在给人以启示”

一直以来，史炜都在空间计量经济学领域里深耕。“疫情的传播恰恰反映了区域间的高度关联，人口的流动带来了空间上的扩散。这也是武汉封城的原因。”而对于邱筠来说，“做这个研究对我们来说并没有技术壁垒，重点在于愿意迈开第一步。”

据邱筠介绍，研究的过程比较顺利，由于研究的方法和模型都可以借鉴过往的经典文献，因此构思的过程并不困难。同时，数据的获取方面也没有造成障碍，所有数据来自公开数据，研究用到的气象数据也来自邱筠多年来的苦心积累。过往大量的积累和学习，让整个研究水到渠成。

不过，卫生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并非两人的主攻领域。两人仔细回想熟悉的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想到了耶鲁大学公共卫生与经济学系的助理教授陈希。过去几年，他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青年教师合作发表过论文，也曾来学院与教师们进行学术交流。两人随即联系陈希，三人迅速一拍即合。“他的公共卫生背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专业性的把关，更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单纯的经济学视野跳出去，看到了更广阔的东西。”史炜说。在研究的过程中，陈希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医学前沿文献和专业的分析角度。

3月初，他们的合作研究已经形成了初稿，并在学院内部的Brownbag Seminar上进行了分享。学院的同事们也给出了大量宝贵的建议，帮助他们及时弥补很多不足。过后，他们即将文章投稿到了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期刊。可喜的是，投稿一周后即收到了审稿人的意见，并获得了审稿人的肯定，称该项研究“非常及时”。不过，审稿人建议这篇论文不该仅仅是使用工具来完成一个模型，更重要的是给大众以启示。

因此，他们在后期两周的修改中加入了对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梳理，从宏观到微观，从全国到地方，细致全面地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审稿人没有要求我们去

这些梳理，但是这些城市的政策以及相关的效果评估会对国外有借鉴意义。”邱筠说。

### “继续做接地气的中国问题研究”

4月初，他们收到了来自Journal of Population of Economics编辑部的好消息——文章被接受，即将发表。随即《环球时报》、环球网、新华网、人民网等权威媒体都报道了论文研究成果。他们的论文发现，截至2月29日，在中国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有效避免了140万以上的新增感染者和超过5.6万人的死亡。此外，从反映病毒传播力的基本再生指数（R0）来看，有效且强有力的公共卫生举措使这一指数从1月底的2.992迅速减弱为2月底的1.243，并在湖北以外降低为0.614。也就是说，1月下旬，一个新冠肺炎病人平均可以传染近3人，而2月底时一个人只能传给1.2人，且湖北以外地区2月底时一个人只能传给0.6人，这证明此时中国已经有力地遏制住新冠病毒的传播。而前一段时间北师大田怀玉团队发表于Science的论文，研究结果也与他们的论文相互论证。

论文还提到，此次全球各国应对新冠疫情可主要分为两种基本策略，一种策略致力于减轻但不一定阻止病毒传播，另一种策略则依靠更严格的措施来抑制和扭转病毒感染的增长轨迹。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后一种策略。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最初实施的是“减轻但不一定阻止病毒传播”策略，但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正转向中韩等国更严格的遏制策略。论文认为，随着新冠肺炎演变成全球性大流行和传染病指数型增长的特征越早压低传染曲线，能够避免的感染数越多。中国采取的措施不仅加深了全球对疫情防控的理解，也为今后针对类似传染病的预防工作提供了借鉴。

谈到这篇文章的社会价值，邱筠和史炜觉得他们只是做了该做的。史炜认为，“这场疫情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在关注的事情，在这场疫情当中，每个人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很多经济学家都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很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建议，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至于它的价值，“需要时间去发现”。“兴趣和使命感共同驱动着我完成了这篇论文。”邱筠认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场大灾难中每个个体要如何度过？我要回答自己这个问题。所以为了不轻易忘记它，我要做一些事情帮助大家一起记住它。”

最后,当问到他们在论文完成的过程中,得到了哪些外界的帮助时,邱筠说:“感谢 Journal of Population of Economics 的编辑和审稿人,仿佛他们与我们拧成了一股绳,让更多人更快地看到了我们的研究。”史炜认为,学院教师虽然以“海归”为主,但却有很浓厚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氛围,并看重研究的政策含义,他时常记

得,要做接地气的面向中国读者的研究,“这一点很重要。”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文章

## 专访 Zimmermann 主编: IESR 对于新冠肺炎的研究提出了可供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参考的研究结论

近日,我院邱筠、史炜老师与耶鲁大学学者陈希的合作论文即将在人口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人口经济学》)上发表。该文研究了我国的防控政策如何遏制了由人口流动产生的疫情扩散,对其他国家应对当前疫情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全球劳动组织(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上对该文章的主要发现进行了报道。我们就此采访了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杂志的主编 Klaus F. Zimmermann 教授,他对该篇论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荣誉教授和人口经济学杂志主编。曾在墨尔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伯恩大学、慕尼黑大学、东京大学、曼海姆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他编写或编辑了 55 本书,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中发表了 160 篇论文,另有 150 篇论文被收录于论文集。他致力于将传播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理念,定期为国际顶级媒体撰稿,并为政府与非政府机构提供建议。

Q: 在您看来,这篇论文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您希望这篇论文产生怎样的影响?

Zimmermann: 据我所知,这是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文章。我们深入了解了新冠病毒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如何应对这场疫情的。这篇严谨的论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在数据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要将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过程从政府与人民的应对措施中分离出来,并对该过程进行量化分析。在这一点上,该研究在方法上为此类研究建立了标准,并提出了可供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参考的研究结论。

Q: 为何您会认为这篇论文很适合发表在《人口经济学杂志》上?这篇论文与其他出现在科学和医学类杂志上的相关论文有何区别?



Klaus F. Zimmermann 教授

Zimmermann 教授现为中欧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乔治索罗斯访问教授、伯恩大学全职教授、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荣誉教授、柏林自由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Zimmermann: 这种病毒对人类的风险行为、社会福利、生命安全等要素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些要素正是人口经济学核心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篇经济学研究,其特殊之处在于对个体与政府行为的重视,以及对反事实情境的推断。

Q: 这篇论文的发表过程特别快,为何您认为时效性对于这篇文章尤为重要?《人口经济学杂志》又是如何实现这个极短的发表周期的?

Zimmermann: 一般来说,要让一篇论文被顶级经济学杂志接受需要几年的时间。文章通常需要经过漫长

的审阅和多次的论文修改,将文章投递至顶级期刊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是人口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尽管作者和期刊编辑在早期就意识到了这篇文章非常适合发表在该期刊上,但是这篇文章仍需经过标准的、高质量的匿名同行评审。正常的审稿周期是六周左右,但三名审稿人在一周内就提供了详细的审稿报告,并提出了大量的修改建议。而作者在两周内就对所有修改建议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处理与非常详细的答复,在最大程度上对论文进行了提升。我们也尽量简化了处理论文的程序。鉴于这项研究对当前全球的疫情防控具有重大意义,在整个过程中各方都非常支持。

## 好文回顾

### 【澎湃】郭文殊: 亏钱的长租公寓怎样才能赚到钱

作者: 郭文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长租公寓这个行业,目前还赚不到钱。虽然该行业里初创企业众多,其真实财务状况难以为人所知,不过从目前唯二两家在美国上市的青客公寓(NASDAQ:QK)和蛋壳公寓(NYSE:DNK)所发布的财报来看,规模越大,亏损越来越多,应该是目前长租公寓行业的主旋律。比如在 2017 年到 2019 年的三年中,蛋壳公寓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57 亿、26.75 亿和 71.29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分别为 -2.72 亿、-13.7 亿和 -34.37 亿元人民币。青客公寓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5.23 亿、8.89 亿和 12.34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则分别为 -2.45 亿、-4.99 亿和 -4.98 亿元人民币。在由观点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2020 年 1-3 月中国长租公寓发展指数前 20 榜单中,蛋壳公寓和青客公寓分别位列第 2 和第 6 名,可见这两家企业的财务状况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家公司赚不到钱,可能是公司自己的问题。所有的公司都赚不到钱,这个行业可能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

题。进一步来看,如果一个行业从诞生开始,所有的企业都在亏损,这个行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对长租公寓所在的市场进行定义。

#### 为什么不赚钱?

中国的长租公寓,从物业产权上来说,分为自持式和包租式。从运营模式上来说,又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这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互有关联的维度。自持式公寓,意味着物业的产权属于公寓运营方,除了部分资源雄厚的房企,大多数新晋玩家不具备这个能力。相对而言,包租式公寓的门槛低得多,只要少部分资金,就可以将闲置物业租下,经过装修再转租出去,赚取租金差,这也是中国多数长租公寓的发家之道。

一般而言，包租式公寓的运营商采用“有房即收”的策略，这样得来的房源分散在城市的各个社区，属于分布式运营。如果运营商资金充足，能够租下整栋物业，就可以对物业进行统一装修、统一出租，这样的运营模式被称为集中式运营。

相比于分布式，集中式运营对于资金的要求更高，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更少，不过由于统一装修和管理，可以有效降低单位房间的运营成本。另外相比于个体房东3-5年的租约，整栋包租的租期可以达到10年以上，这给了运营商更多的时间来收回成本。

对于自持物业的公寓运营商，则不存在分布式这一选项，整栋持有、集中运营是唯一的发展模式。从规模上来看，2019年上半年，排名前5的房企系运营商管理公寓18.13万间，排名前5的集中式公寓运营商共管理公寓25.2万间，而排名前5的分布式公寓运营商共管理公寓222.5万间，是前两者加起来的5倍还多。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房企旗下的公寓，也并非都是由房企自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属于整栋包租+集中式运营。因此就目前而言，包租式仍是中国长租公寓的绝对主流，而其中又以分布式占绝大多数。这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美国，长租公寓基本属于运营商的自持物业。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中国过低的租售比导致低回报。这其中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租售不同权”等制度性因素，在此不进行详细探讨。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除少部分自持型公寓外，多数长租公寓牵涉到三方的利益，即房东、运营商和租客，因此，在分析长租公寓企业的商业行为时，有必要将这三者纳入同一市场中。

除此之外，另一需要考虑的角色是传统的租赁中介，这是在前长租公寓时代，房东和租客之间必不可少的匹配媒介，也是在长租公寓崛起后受到冲击最大的一个群体。因为租赁中介的客户和长租公寓高度重合，我们可以将其放在同一个市场来进行分析。这样一来，我们的市场就包含房东、租客，以及作为平台的传统中介和长租公寓企业。

这样的市场定义，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分析长租公寓这一行业存在的意义。在前长租公寓时代，房东和租客之间只能通过传统中介进行匹配，这之中存在匹配效率不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从租客的角度来说，搜寻成本、与中介沟通的成本、房屋隐藏的质量问题，以及房东随时提前解约所带来的心理负担，都是可以让任何租客“脱一层皮”的惨痛经历。而从房东的角度来说，除了与中介沟通的成本外，等待合适的租客或者合适的价格所带来的时间成本，也是阻碍部分闲置房源进入租赁市场的障碍。

长租公寓的诞生，从两个方面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一方面，集中式长租公寓的出现，让原本无法被利用的闲置资产，如商用物业、废弃酒店等，得以进入住宅租赁市场，从外部增加了房源供给。另一方面，分布式的长租公寓，通过和房东签订长期合约，有效减少了房东的沟通和等待成本，提高了房东出租房屋的意愿，从内部增加了房源供给。此外，无论是集中式还是分布式，运营商都会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装修，并用企业信用为合约背书，使租客免受房屋质量和提前搬家的困扰。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租公寓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当然有存在的必要。

#### 一个创造了巨大社会效益的行业赚不到钱，问题只能出在成本上。

一些行业的成本高企，因为研发成本高，前期的高投入能够带来后期的高产出，而长租公寓的成本高，却是结构性的，具体表现是“租金倒挂”，或是“高收低租”，这一点在分布式的长租公寓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所谓“高收低租”，倒不一定真的是3000块一个月的房子收过来，2000块一个月租出去。而是计入了装修维护成本之后，房租收益无法涵盖收房成本，这就导致了运营一间，亏损一间，规模越大，亏损越多的情况。比如青客公寓，2018财年租金成本6.65亿元，其他经营成本及费用为6.52亿元，加上0.77亿元的利息费用，最后导致亏损将近5亿元。

收房成本高，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因为参与这个行业的企业太多，互相竞争推高了收房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一般认为充分竞争是有利于行业发展和消费者福利的。但是在长租公寓的行业里，过度竞争已经使得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导致了资源的错配。而这个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始终有一部分租客，或是出于家庭原因，或是出于生活习惯，是需要通过传统中介来租房的，而当长租公寓推高了收房价格之后，房东群体即使选择透过传统中介出租，也势必会提高租金，这就使得没有选择长租公寓的这部分租客成为了竞争外部性的牺牲品，违背了竞争的初衷。

这是个令人疑惑的现象：既然边际成本已经高于边际收益，为什么众多长租公寓企业依然不惜代价继续在这个泥坑里越陷越深呢？

和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一众烧钱的新兴产业一样，对于这个问题，长租公寓行业的参与者也用行动给出了相似的答案：靠烧钱扩大规模，在期待成本降低、租金上涨的同时，等待竞争对手的掉队，从而一举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首先是成本，一般来说，类似长租公寓这种行业都有点“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不过对于行业主流的分布式公寓，由于房源分散，装修维护都不能统一调配，这种规模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单位成本，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次是租金，对于租金上涨的期望，来源于租房群体收入的增加，年轻人口向大城市的持续流入，以及配套服务所产生的增值效应。应该说，租金上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特别是过去几年，资产价格经过快速上涨后已经进入瓶颈期，在大城市购买房屋自住，一方面所需投入过高，另一方面由房价上涨带来的预期回报也不再具有吸引力，这将使得一大部分年轻职业人士在租房市场停留更长时间。然而租金上涨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同时，对于租金上涨的期望也会刺激房东群体，从而反过来推高收房成本，依靠租金上涨能否真正实现盈利，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至于行业的参与者是否会掉队，反而成了一个相对容易做出的判断，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有几十家长租公寓企业选择退出这个行业。但这种退出往往是具有破坏性的，除了由于“租金贷”暴雷所导致的“屋财两空”这种有恶劣影响的社会事件外，一个长租公寓企业的退出，本身就会给房东和租客带来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退出还将不断持续下去，直到整个行业进入一个可以稳定盈利的均衡状态，而与之伴随的对房东和租客的冲击，也将时常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 解决之道

那么，长租公寓的赚钱之道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不仅有长租公寓行业的参与者，也有行业的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就在上述的三个环节当中。从长租公寓企业的角度来看，目前分布式公寓的成本已经很难再降低，

转向集中式发展几乎成为必然。在当前“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各地出台了很多鼓励租赁的政策，包括推出许多“只租不售”的公共住宅专用土地。拥有大量分布式公寓管理经验的长租公寓企业，可以尝试参与这些公共住宅的管理。而要提升租金，除了依赖宏观经济变化下的租金上涨外，还要依靠企业改善自身质量，创造用户粘性，通过高素质的服务来获得附加值。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企业对用户的需求和偏好有着极致的分析，也需要企业拥有强大的执行力，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随着规模的增长，对质量控制的难度会成倍增加，因此，投入更多精力做好存量管理，对于长租公寓企业来说，其重要性将不亚于开拓新的市场。

从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应鼓励长租公寓企业参与公共住宅的运营管理，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做。此外，在制定监管措施的时候，应更从实际出发，增加精细化监管，减少一刀切的措施。比如长租公寓赖以生存的“N+1”模式，通过在客厅设立隔断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得房成本。

设立隔断间，这是当下中国广大劳动群体较低的收入水平和一二线城市相对高昂的生活成本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客观事实。因此，与其一刀切禁止“N+1”，不如对房屋的消防、通风、采光和结构安全等要素做出要求，在符合要求的基础上允许“N+1”模式，这样不仅使得长租公寓企业有效地降低了成本，也将群租这一现象纳入到可控和可监管的范围，在实际上提升了居住安全。此外，对于退出的长租公寓企业，应制定相关政策，要求其妥善安置原有租户，尽量减少对房东和租客的影响，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最后，要使得长租公寓行业乃至整个住宅租赁行业从根本上得到发展，还需要推动“租售平权”的落实，特别是在教育平权上。只有当租房的人能够享受到买房的人所拥有的权利时，我们国家的居住文化才会真正发生改变。

一个行业想要长期获得健康发展，企业是需要赚到钱的，至少，要能看到赚钱的方向。长租公寓的赚钱之道，或许也能给我国房地产制度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原文发表在澎湃新闻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月文章

## 深圳真的爆发“离婚潮”了吗？专家这样解读



这两天，关于“深圳离婚潮”“深圳离婚排号”等话题的议论，被炒得沸沸扬扬。深圳真的爆发“离婚潮”了吗？专家对此怎么看？5月20日，南方+记者李强邀请到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助理教授唐高洁，对所谓“离婚潮”发表见解。以下为他们的详细观点：

近日，“深圳突现离婚潮”这类话题在社交平台引起热议，朋友圈里也流传着标题中带有“报复性离婚”等字眼的文章。一些人甚至翻出了“2017年深圳离婚率36.35%”的旧账，“今年四月，深圳离婚总量达到了结婚总量的84%，每100对新入领证就有84对夫妻离婚”等描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已婚网友们又开始感叹现代社会中婚姻的脆弱和无奈，未婚网友的恐婚指数再次增加。也有人认为这与婚姻本身无关，主要是因为房子……先别着急被收割流量和情感。现代婚姻真的如此脆弱吗？新冠肺炎疫情真的推动了“离婚潮”的来临吗？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基本概念和事实。

### “离结比”本身意义不大

要谈论离婚率，首先得确定什么是离婚率。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离婚率计算方法是“粗离婚率”，即当年的离婚人数与当年的平均人口数的千分比，这也是我国所采用的计算方法。然而，在一些帖子中，经常能看到用“离结比”被错误地代替为离婚率。

例如，最近的一篇帖子描述：“2017年全国结婚1010.8万对，离婚380万对。其中，深圳的离婚率是36.25%，位居全国前三，广东省第一。”也就是说，平

时我们看到的动辄超过30%的“离婚率”是由当年离婚人数除以当年结婚人数计算而来。很明显，这一计算方法得到的其实是“离结比”，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谈论的离婚率。

结婚和离婚是两个不同人群的选择，结婚人数主要对应当年适婚年龄人口，而离婚人数应该对应的是当年已婚的所有人口，而通常后者人数也远多于前者。因此“离结比”本身意义不大，也不能用来反映社会婚姻状况的变化。

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现代婚姻观念的普及都有可能引起离婚率的上升。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经济和社会较为发达，居民对婚姻质量的期望相对较高，人们对离婚这一选择也更为宽容，这些因素的叠加都有可能使得深圳的离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不存在今年离婚数暴增的事实

最近一篇帖子提到，“按照深圳全年来算，历年离婚总量不会超过结婚总量的三分之一，可在4月，深圳的离婚总量已经达到了结婚总量的84%”，“受疫情影响，四五月迎来离婚潮……”四月的“离结比”远高于全年平均，可以认为是离婚潮来了吗？显然，还是不行。

据笔者参与某项目研究获得的数据，对深圳市2018年和2019年各月份的离婚和结婚登记数据进行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结婚登记数具有明显的月度波动，而离婚登记的季节性不是很明显。人们偏爱在1月、5月、8月和9月登记结婚，而4月和7月则是一年中结婚登记的“淡季”。因此，在这些结婚“淡季”的月份中，“离结比”自然会相对较高。

根据深圳市的登记数据，2019、2020年的3月“离结比”分别是45.5%、49.9%，而这两年4月的离结比则分别高达93.7%和90.4%。同比2019年同期的“离结比”，2020年的“离结比”并没有显著增长。

进一步从登记数来看，深圳市2018年和2019年1-5月的结婚登记总数分别为26549对和28124对，离婚登记数为11151对和11781对。从今年已经登记的人

数加上5月下半月预约的人数来看，结婚和离婚登记对数分别为22146对和12278对，与往年同期相比，结婚对数有较大幅度减少，而离婚人数只是稍有增加。

可见，根本不存在今年离婚数暴增的事实，何谈疫情推动深圳离婚数的暴增？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热议的深圳畸高“离婚率”，是因为一些人偷换概念误导了大众。登记数据表明，疫情并没有推动所谓“离婚潮”的来临。然

而，人们对这类话题的广泛关注也折射出了现代人对婚姻的不安全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体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人们对于婚姻稳定的焦虑感也在上升。在这个“520”来临之际，如果大众少一些对婚姻的焦虑，多一些对婚姻的尊重，整个社会也一定会更加美好和谐。

本文首发在“南方+”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月文章

## 蔡澍：理解扶贫，超越现有经济理论的中国实践

作者：蔡澍（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实现每个人安居乐业、生活富足美满，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在现实中，常常有一部分人被落下，落入“贫困陷阱”。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扶贫事业不断推进，逐步从“粗放式扶贫”转变为“精准扶贫”，并预计在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扶贫”？更进一步，为什么粗放式扶贫应该转变成精准扶贫？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发。

### 贫困陷阱是否存在？

顾名思义，“贫困陷阱”描绘的是国家或个人长期陷于贫困的状态，突出了贫困“自我维持”的特点。对于国家来说，陷入贫困陷阱意味着这个国家从过去至今一直摆脱不了经济落后的局面；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陷入贫困陷阱意味着个体一辈子难以摆脱贫困，甚至形成代际传递。

为什么贫困会自我维持？目前，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类观点认为，恶劣的外部条件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如劳动力或金融市场不发达、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差等等。其逻辑很直观，比如，因为穷，导致生产资料投资不足，无法有效发展生产，也就无法脱贫；又如，因为穷，修不起路，资源不能有效流通，只能继续陷于贫穷。“因贫致病、因病返贫”也是一种典型的贫困陷阱。另外，家庭贫穷也可能

导致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最终使贫困“代代相传”，形成代际贫困陷阱。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人的有限理性是致贫的重要因素。俗话说“人穷志短”，在贫困时，人往往缺乏长远目光，行为决策也难以达到长期最优。例如，笔者曾从实地调研中了解到，有些贫困户厌恶风险，不敢尝试新事物，不敢闯、不敢干，缺乏脱贫干劲。此外，贫困往往不利于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有些贫困户嗜酒、嗜赌；在贫困环境下养成或强化的不良习惯，进一步制约了贫困户走出贫困陷阱的可能。

### 消灭贫困，我们能做什么？

不管是外部条件约束的观点，还是个人特质约束的观点，两者都暗示了通过外部干预帮助贫困者走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经济学家们关于致贫机制的分析是正确的吗？或者说，通过外部干预打破贫困陷阱可行吗？针对这些问题，发展经济学家主要通过“随机干预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的方法进行验证。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麻省理工大学的Esther Duflo和Abhijit Banerjee，以及哈佛大学的Michael Kremer，表彰的正是他们“在全球扶贫问题上使用的实验方法（for their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global poverty）”。所谓的“实验方法”即是随机干预试验。

随机干预试验类似于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进行的控制实验。在试验中,设置初始状态相似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接受特定的干预,对照组不接受干预。之后,通过对比两组对象在某些特征上有无显著不同,来确定干预是否有效。当然,“社会实验”比“实验室实验”要复杂很多,挑战也更大,如社会实验干扰因素更多,可能难以进行一些实验室级别的精准控制,在此不再赘述。

目前,在扶贫领域,经济学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干预试验,如为贫困户提供小额贷款、技能培训,资助贫困户购置生产资料,帮助贫困户办理保险,开办银行账户,等等。还有的在医疗健康领域进行干预,如为贫困地区的人们发放蚊帐、蛔虫药、加碘盐等等。然而,形形色色的干预试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试验成功了,但也有不少试验是失败的。

这是否证明有关“贫困陷阱”的逻辑分析错了呢?其实不然。虽然随机干预试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对其结果的解读须要谨慎。首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导致“贫困陷阱”的原因可能复杂多样。一个人或家庭的贫困现状,可能是从外部条件到个人心理各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某项干预可能只解决了某一个环节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其他环节的问题。例如,我们观察到贫困户缺乏资金购置生产资料,我们便给他们提供种羊、种鸡,但是没有提供配套的养殖技能培训,或者没有真正调动他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如此,通过援助生产资料来实现脱贫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

其次,社会实验的复杂性在于各地的初始禀赋可能千差万别,在某些地区进行随机干预试验后获得的结论可能无法简单推广到其他地方。以小额信贷为例,国外的学者在印度、蒙古、墨西哥等国进行的试验发现,小额信贷无法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笔者参与的一项在中国部分省份执行的试验却显示,小额信贷提高了受资助家庭的收入。笔者发现,中国试验的成功与中国城乡分割、劳动力流动不畅的背景密切相关。正是因为在中国城乡流动成本较高,缺乏启动资金的贫困户难以进城务工。小额信贷一方面促进了农业投资和收入,另一方面显著降低了贫困户进城务工的门槛,最终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正如大家常说的,“幸福的家庭大同小异,不幸的家庭千差万别”,对每个贫困户来说,他们的禀赋条件和致贫原因各不相同,通过一个干预、一

种方法获得广泛的成功是不切实际的。这也引出了中国为什么在经过较长时间的区域开发式扶贫之后,逐渐转变为“建档立卡”的精准扶贫。

### 中国的扶贫实践及启示

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消除了绝大部分贫困人口之后,剩下的贫困户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尚未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正是因为基层的情况非常复杂,普适的扶贫方法并不存在。因此,中国政府实施了“精准扶贫”战略。具体而言,这项战略包括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位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中国现阶段扶贫工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建档立卡”。正如前文提到的,导致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不能简单指望某一项政策干预就能奏效。在实践中需要因地制宜、仔细甄别,建档立卡、因户施策,对特定农户进行精准追踪,提供最合适的扶贫策略。截至2020年5月,全国97%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显示出这一措施有一定成效。

其次,是“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是指将贫困人群从那些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居住和发展生产的地区,集中搬迁到宜居宜产的地方。笔者曾走访过广西一个易地扶贫安置点。笔者观察到,安置社区的楼房井然有序,环境整洁,道路畅通。安置点的住户之前住的大都是危房,人居环境的改善为他们脱离贫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在全国得到广泛实施。国务院扶贫办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已有960多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完成了易地扶贫搬迁,入住率达99%。

最后,是既从经济上扶贫,更从精神上“扶贫”。调动贫困户脱贫的内在积极性十分重要。例如西南财大甘犁老师推动的“劳动奖励计划”就是调动劳动积极性的有益尝试。该计划对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采取“以奖代补”的扶助形式。在劳动收入较低时,奖金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样,可以鼓励贫困户更积极地参与工作,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补助。

“精准扶贫”的策略能否直接复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呢?不同国家减贫的进程不同,面对大面积的贫困,早期在中国实施的区域开发式扶贫被证明

是有效的。当减贫进程深化,精准扶贫的策略才是必要且有效的。中国的扶贫实践基于经济学理论,又超越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如何讲好中国扶贫减贫的故事,从中国扶贫实践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规律和启示?作

为一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笔者倍感任重而道远。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月文章

## 新萨姆定律：美国经济已于三月进入衰退

作者：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孙坚栋（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博士后）



美国某城市街头

尽管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及市场人士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这些判断都是基于对于经济形势的一种笼统的印象,缺乏严格的科学基础。最权威判断美国经济周期的NBER对于衰退的界定往往滞后数月。而根据劳动力市场表现对于经济衰退进行早期判断的“萨姆定律”,对于三月份数据的判断是美国尚未进入衰退。笔者的一项最新研究(Feng and Sun, 2020)对于“萨姆定律”所依据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测量误差的调整。根据我们调整后的结果,美国经济已经于三月正式进入衰退。

###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美国劳动力市场

截至4月25日,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导致美国92.5万人确诊,超过5.2万人死亡,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限制经济活动的措施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在4月

初发布的月度就业形势报告显示,3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近70.1万,这是该项指标在近10年来的第一次下降,跌幅也接近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峰值80万。全国失业率从2月的3.5%升至4.4%,而此前美国的失业率正处于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劳动参与率也从2月的63.4%降至62.7%,短短一个月内就跌去了过去一年的增长值。尽管这些数字足以令人震惊,但是这仍然不足以真实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这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活动限制措施发生在3月中下旬,而上述劳动力市场指标所依赖的住户调查在这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因此这些调查尚未完全覆盖经历大量企业倒闭和裁员的工人。此外,受疫情影响,调查拒访率明显提升,且部分面访由电话访问代替,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影响3月份的数据质量。

与月度就业数据相比,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每周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和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更能及时地反映疫情之下美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数据显示,3月28日当周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686.7万,是在此前历史最高记录的近10倍之多;而3月14日当周,也就是当前人口调查的参考周,这一数字仅为28.2万。尽管4月份以来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迎来了三连降,但是另一个指标——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仍在不断增加。数据显示,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从3月14日当周的178.4万持续升至3月28日当周的744.6万,到4月11日当周,这一数字已飙升至1597.6万。由此可见,美国的失业率可能仍将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一段时间,并保持在高位。

如此严峻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也促使美国国会在3月末通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2.2万亿美元财政救助措施，以帮助企业和个人应对因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并向医疗系统提供急需的医疗用品。由于这一紧急救助措施包含了提高失业救济金额、扩大救济范围和延长救助期限等内容，使得之前无法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临时工、休假的雇员和自由职业者也符合了申请资格，且即将到达申领期限的失业者也能继续领取，因此一定程度上也推高了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 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尽管大多数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不可避免，甚至许多人猜测美国已经处在衰退期，但科学地确定衰退的准确时点却是另一回事。在美国，经济周期拐点的日期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the NBER Business Cycle Dating Committee）确定，而经济衰退即为经济周期波峰和波谷之间的这段时期。然而，NBER确定经济周期拐点日期的方法是回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系列非实时的、需经过多次调整的经济指标。因此，通常在衰退发生半年至一年之后，NBER才能正式确定经济周期的拐点。考虑到衰退可能给经济体带来的巨大冲击，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及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货币或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就显得十分重要。尽管NBER谨慎的操作步骤确保准确识别衰退，但对于政策制定而言可能为时已晚。

近期，前美联储经济学家克劳迪娅·萨姆（Claudia Sahm）认为可以利用失业率的变化来判断美国经济是否进入衰退期，并提出了“萨姆衰退指标”：如果当月的失业率（以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衡量）相对于过去12个月的最低点上升了0.5个百分点或更多，那么美国经济就进入了衰退期。回顾70年代末以来的5次经济衰退，萨姆衰退指标在历次衰退开始后4个月内就准确识别出了衰退，与NBER的官方通告相比，显著提前了识别衰退的时点。考虑到萨姆衰退指标在识别经济衰退时出色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它也因此被收录到了美联储经济数据库，并受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

但是，萨姆衰退指标是基于官方失业率计算得到的，而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基于住户调查得到的劳动力状态（就业、失业和不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误分类现象，由此得到劳动力市场指标（如失业率等）往往也是有误差的。正如3月份就业形势报告所述：

“那些在整个调查参考周期内没有参加工作并希望被召回工作的工人，应被分类为被临时裁员的失业者。2020年3月，被分类为被临时裁员的失业者的人数大大增加。然而，3月份被分类为就业但暂时缺勤的人数也大大增加。在3月份调查开始之前，我们向住户调查访问员传达了特别指示，要求将所有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业务关闭而暂时缺勤的就业人员划分为被临时裁员的失业者。很明显，并不是所有遭遇这种情况的工人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正确分类的。当受访者误解问题或访问员错误地记录回答时，这种非抽样误差的误分类就有可能发生。……如果将（超过往年3月典型水平的）被分类为就业但由于‘其他原因’而缺勤的劳动者重新划分为被临时裁员的失业者，那么失业率将比当前的4.4%高1个百分点。”

Feng and Hu (2013) 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利用潜在变量模型研究了劳动力状态误分类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力状态中的误分类偏差严重低估了失业率的水平，而且当失业率越高时，低估的程度也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可能在经济衰退之初，由于误分类偏差而导致官方失业率的上升幅度小于真实失业率的上升幅度。这可能会延迟由失业率变动而释放的衰退信号，因此削弱萨姆衰退指标识别的时效性。

我们的最新研究采用Feng and Hu (2013) 提出的方法校正了美国官方失业率中的误分类偏差，并利用校正后的失业率重新计算了萨姆衰退指标。我们发现，校正后的失业率从2月的5.3%跃升至3月的6.9%，相较于官方失业率从3.5%升至4.4%，经校正的失业率的水平值和增长幅度都有明显提高。当衰退刚刚开始时，校正后的衰退指标的上升时点总是先于原始的衰退指标，这也印证了我们的猜测，即失业率中的误分类偏差可能抑制衰退信号的释放。随后，我们依据萨姆的想法为校正后的衰退指标重新设定一个临界值：我们可以接受延迟识别衰退，但不能容忍将经济扩张误判为衰退。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得到校正后的衰退指标的临界值为0.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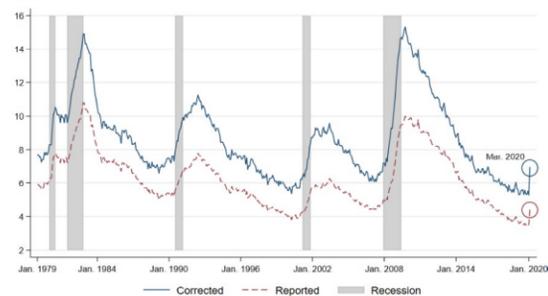


图1：官方失业率（红色虚线）和误差调整后的失业率（蓝色实线）

经过调整后的萨姆衰退指标能否提高识别衰退的及时性呢？回顾过去5次经济衰退，原始的萨姆衰退指标在衰退开始后的4个月内就识别出了所有衰退，而我们调整后的萨姆衰退指标则更进一步，显著提高了识别衰退的时效性。特别是最近的两次经济衰退，经调整的萨姆衰退指标均在衰退当月就识别了衰退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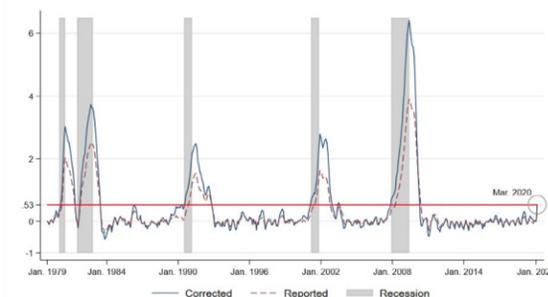


图2：原始的萨姆衰退指标（红色虚线）和调整后的衰退指标（蓝色实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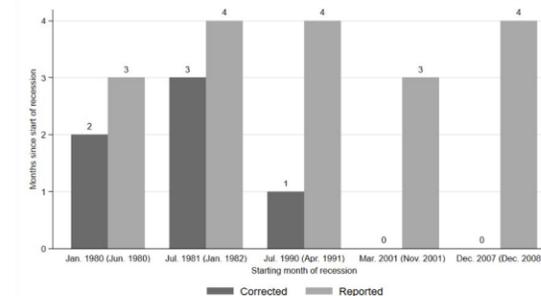


图3：误差调整前后衰退指标的时效性对比。（横坐标为经济衰退开始的月份，括号内为NBER宣布的月份）

回到本节开头的问题：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了吗？根据计算结果，3月份的萨姆衰退指标为0.3，尚未到达其衰退临界值0.5；而经调整的萨姆衰退指标为0.54，恰好击穿了我们的新设定的临界值0.53。因此，我们的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在3月份进入了衰退期。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文章

## 关于国人的收入状况，我们了解多少

作者：卢晶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到“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一时间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对这一数字进行解读。

### 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与收入水平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平均收入指的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数。国家统计局通过对全国有代表性的16万户住户进行调查来获得有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信息。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4种来源。

我国研究收入分配的著名学者李实教授指出，2019年收入最低的4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79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5元。这表明我国确实有

40%以上的人群，其平均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也是我们社会中的低收入人群。”也就是说，有超过5.6亿的低收入人群。

学者Chenqin利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推算出2018年、2017年和2016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000元的人数分别为5亿、5.2亿和5.6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利用7万户代表性住户样本推算，我国有5.47亿人（39.1%）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6亿人（42.85%）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090元。

至此，我们对我国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收入水平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这6亿低收入家庭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今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但持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依然任重道远。

## 对高收入群体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估算为何差异巨大

有趣的是，前文北师大课题组对于我国高收入群体比例和规模的推算引起了更大的热议。根据他们的推算，我国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 10000-20000 元之间的人口比例为 0.56%，规模为 784 万人，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大于 20000 元的人口比例为 0.05%，规模为 70 万人。换言之，全国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的人口比例为 0.61%，规模为 854 万人。以 3 口之家为例，人均可支配月收入 10000 元，即家庭可支配收入 30000 元，如果夫妻两人都工作，则平均每人收入 15000 元，这样的家庭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到 1%。

表 1 家庭人均月收入分布与人口数

百分比 (%)	人口数 (万人)	累计百分比 (%)	累计人口数 (万人)
<=0	0.39	0.39	0.39
0-500	15.42	15.81	22135
500-800	14.43	30.24	42338
800-1000	8.86	39.10	54742
1000-1090	3.75	42.85	59992
1090-1100	0.37	43.22	60510
1100-1500	13.30	56.52	79131
1500-2000	12.33	68.85	96393
2000-3000	14.81	83.66	117128
3000-5000	11.21	94.87	132823
5000-10000	4.52	99.39	139151
10000-20000	0.56	99.95	139935
20000+	0.05	100.00	140005

注：本表是 2019 年数据，人口规模用国家统计局总人口数乘以对应比例。

数据来源：万海远，孟凡强《月收入不足千元，这6亿人都在哪》，财新网

此文一出学界众多同仁纷纷找我讨论，这结果与他们的直观印象不符。笔者看到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撰文指出：“2019 年，中国每月税后可支配收入超过 2 万元的人数，应该至少超过 1 千万，这远远超过北师大抽样统计推算的 70 万人，差距来自于对高收入群体的抽样比例过低。”他做出此推断援引了法国经济学家，《21 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及合作者关于我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皮凯蒂和合作者估算了 2015 年我国成年人人均税前国民收入的分布情况（注意，是税前国民收入）。顶端 1% 群体的平均收入为 83.6 万，规模为 1072 万人。底层 50% 群体的平均收入为 17645 元，规模为 5.36 亿人。还是以 3 口之家，夫妻都工作为例，顶层 1% 人群平均月收入为 6.97 万，家庭人均月收入为 4.65 万。底层 50% 群体平均月收入 1470 元，家庭人均月收入 980 元。

收入群体	人口数量 (人)	收入门槛值 (元)	平均收入 (元)	收入份额 (%)
全部人口	1072289708	0	57807	100.0
底层 50% 人口	536144854	0	17645	15.3
中间 40% 人口	428915883	35029	63021	43.6
顶层 10% 人口	107228971	116489	237757	41.1
其中：顶层 1% 人口	10722897	324851	836013	14.5
顶层 0.1% 人口	1072290	924613	4219447	7.3
顶层 0.01% 人口	107229	5371286	26634998	4.6
顶层 0.001% 人口	10723	35216943	164188917	2.8

注：本表报告了 2015 年中国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单位为个体成年（20 岁以上；已婚夫妇的收入被均分或两份）。2015 年，1 欧元 = 7.0 元人民币（市场汇率）或 4.6 元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表中收入为税前国民

数据来源：皮凯蒂等（2019）

那么以上两种关于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估算哪种更能反映国人收入的实际情况呢？我们要从概念上进行辨析，两者探讨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北师大课题组测算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通俗的说就是老百姓实际到手的，可以用来消费的收入。皮凯蒂测算的是国民收入，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定义，国民收入 = GDP - 资本折旧 + 国外净收入。从要素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国民收入 = 劳动要素收入 + 资本要素收入。通俗来说，国民收入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全部收入。

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利用家户数据测算的可支配收入无法覆盖全部的国民收入，尤其是资本收入；而越是高收入家庭资本收入的比重越大，这就会造成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及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低估。为什么家户调查无法很好的覆盖资本收入呢？首先，愿意参与家户收入调查的富裕家庭较少，样本代表性有欠缺；其次，富裕家庭倾向于低报自身的收入。最后，资本收入有时以其他形式存在（如私营公司的未分配利润），按照家户收入调查的定义确实无法覆盖。

这也就是为什么皮凯蒂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广分配性国民收入核算（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他们认为国民收入应该是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更好的切入点，因为我们最终关心的是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大蛋糕”（劳动收入 + 资本收入）如何在全体国民之间进行分配。

通俗来说，通过国民经济核算，我们知道国民总收入是多少，但是有些收入组成部分在家户调查中无法体现，我们也就不知道这部分收入在国民当中如何分配，那么需要利用其他数据来源和一定的方法推断出国民收入在全体国民之间如何分配。

皮凯蒂与合作者对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核算也是以统计局的家户调查数据为基础，但是利用所得税申报数据、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家户财富调查数据对于资本收入的缺失进行了一系列修正，最终推算出国民收入在全体成年人之间的分配状况。

抛开测算年份，收入统计口径（税前还是税后），以及以全体居民还是成年人为基础计算人均收入的差别，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低收入群体规模和收入水平的测算，两种方法的结果比较接近，但对于高收入群体的估算则差别较大。

究其原因，对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家户调查数据可以很好的覆盖这些收入；但对于高收入群体，收入来源主要是财产性收入（资本收入），如果不利用其他信息来推断，家户调查则很难准确反映这部分人的收入状况。极端的例子，福布斯富豪榜统计的是富豪的财富值而不是年收入，对于最富有的人来说，收入的统计更为困难。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家户调查数据可以较好的反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但是在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进行推断时需要格外谨慎。老百姓关心自己的收入水平吗？我认为是关心的，不然总理的讲话不会引起如此热议。那政府部门需要清楚了解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非常必要。因为政府负责制定收入再分配政策，评估政策的有效性与可能产生的后果，前提就是要对收入分配状况有清晰的了解。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有关分配性国民收入核算的研究。

目前，我国收入再分配政策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当有限。李实教授及团队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再分配政策（个人所得税、缴费和转移支付）使得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下降不到 10%，而欧洲国家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在 30%-40% 左右。



从前文的介绍中可知，不同群体的收入来源差异很大，收入再分配政策仅仅盯住个人所得税远远不够。虽然个人所得税制度在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专项附加扣除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我们应该开阔思路，摸清各类收入的分配状况，对于不同类型的收入（尤其是资本收入）制定针对性的再分配政策。

我国仍是一个以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收入是老百姓关心的大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步伐需要进一步加快，让发展成果被更充分、更广泛地分享，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月文章

# 今天你“团菜”了吗？

## “封城”下的社区团购新零售模式

作者：苏应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20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破了节日的祥和与欢乐，也打乱了千家万户的平静生活。为阻断疫情在全国的传播，1月23日，千万级人口省会城市武汉封城；随后，武汉各小区开始采取封控管理，严格限制居民出入小区。在严峻的疫情下，如何解决“菜篮子”问题成为牵动千家万户的棘手难题。就在此时，以生鲜产品为主的各大团购平台瞬间爆发，食享会、美家买菜、十荟团等迅速打入各大社区市场，“在线预订+小区自提”的模式，为居民拎起了“移动菜篮子”。仿佛在一夜之间，各团购群在社区居民中红红火火地建立起来。首先，团购团长发布产品信息，组织居民通过接龙或者小程序的方式进行线上预定。取货当天，宅家居民们纷纷摩拳擦掌、蓄势待发，随着团长一声“菜到了”，居民们拿着写有取号牌或诸如电话号码、姓名抑或是“武汉加油”等暗号的关键信息，全副武装，下楼取菜。一条条间隔一米的取菜队伍在各小区摆开阵势，在与团长互相对视与取菜牌信息后，迅速完成交接。这也几乎成为武汉封城生活中千千万万小区独特的风景线，给紧绷的神经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希冀。随着疫情渐渐平息，武汉解封，小区逐步开放，疫情留

下的产物——社区团购小组却似乎扎下根来，继续蓬勃发展，悄然改变着老百姓的家庭采购消费模式。可以说，一场疫情让武汉的“无接触经济”数月间星火燎原。以总部位于武汉光谷的食享会为例，武汉共有7400多个小区，不到一个月，食享会便覆盖武汉1000+小区，活跃用户超35万。

### 社区团购模式是什么？

社区团购属于S2B2C这种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商业零售模式。首先让我们来科普一下何为S2B2C：S2B2C是一种集合供货商赋能于渠道商并共同服务于顾客的全新电子商务营销模式，S2B2C中，S即是大供货商，B指渠道商，C为顾客。在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为，团购平台作为大供货商（S）需整合上游优质供应商，提供给加入平台的社区团长（B）各种技术、数据支持，辅助团长（B）完成对社区居民（C）的服务。团长（B）在其中的作用则是借助微信群、小程序等一对一沟通顾客（C），发现需求并组织社区居民拼团，同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平台（S），与平台提供的物流仓储服务进行接洽，商品到达社区后负责接收与分发商品，并落实社区居民（C）所需的售后服务。居民只需完成线上下单支付，次日或者隔日便可在社区内制定地点完成自提。和传统的C2B模式相比，社区团购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供应商、商家与消费者的协同网。

### 社区团购经营模式解析

社区团购平台大多选择生鲜水果类产品，特别是爆品作为切入口品类来引流。由于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需求量大，而且购买频率高，所以生鲜类产品在其市场开发初期容易帮助平台黏住客户。据不完全统计，生鲜类产品在整体品类结构中约占30%-40%。生鲜类产品更是占据食享会平台销售额的60%。那么为何社区团购能以低于商超市场价高达1/3的价格出售产品呢？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商品定价由成本与市场竞争模式决定。众

所周知，生鲜类产品同质性强，可以被认为是完全市场竞争，也就是说，平台并不具备明显的垄断势力。因而，是否能以低价吸引到顾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供应链竞争力以及成本结构。和许多超市、菜市场不同，团购平台一般选择从生产地直接购买商品，由于跳过了中间商这一环节，其采购成本大大降低。在物流方面，社区团购平台采用集约化配送降低成本。全程走干线物流，进入城市后由货车集中送到小区门口，再由团长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此外，无需租用门店也为其节省了租赁成本。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团购采用的是预售模式，即先统计订单需求，再进行采购，这种模式降低了生鲜储存时间过长而造成的损耗，库存压力也相对小。可以说，该商业模式的新特征奠定了其成本优势。

在盈利方面，尽管单价低廉意味着单位利润低，而团购则意味着需求量较大，团购平台也因此很好地实现了“薄利多销”。由于生鲜类产品总体利润空间有限，平台进而引进毛利更高的日用品、米面粮油、奶制品、美妆等“家庭消费”品类。以食享会为例，根据该平台经营一年半的盈利情况估算，其业务毛利21%，团长佣金成本10%，仓储、物流损耗大约6%，业务净利润能达到4.5%。

### 社区团购模式的发展历程

社区团购从2018年兴起，7月至10月更是出现井喷式融资潮。据不完全统计，3个月内头部企业诸如“你我您”、食享会、呆萝卜、十荟团、邻邻壹、谊品生鲜、考拉精选、兴盛优选，获得融资金额近20亿元，全年融资超过40亿。但从2019年下半年以来，不少社区团购头部企业相继出现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等问题，部分企业黯然退出。然而疫情的突袭，猝不及防地推了社区团购平台一把，使其重燃活力，以黑马之姿驰骋于春节期间的生鲜零售业。由于武汉小区采取严格封控管理，来自传统零售业的竞争骤减，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团购平台的市场开发与进入成本也随之降低。各大平台于是顺势打开武汉各大社区市场。同时，各大社区涌现出一批志愿者担任起平台团购团长，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平台招募团长的成本。在疫情的大环境下，由于许多团长不仅把这份工作看作了谋生的手段，更是为疫情做服务和贡献，短期内其对平台的忠诚度和服务质量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证。在客户方面，一大批在疫情前忠实于传统商超购物的中老年客户“被迫”加入移动支付与社区团购，从而使团购平台进一步扩大了潜

在市场和客户群。因而，疫情给居民带来的各种不便利却意外地催生了社区团购这一新型零售模式，为其创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条件。

### 社区团购模式能够持续发展吗？

疫情红利过后，社区团购模式能否持续发展呢？其实，从疫情中期二月中旬以来，盒马、京东、拼多多等巨头已经杀入社区团购业，不断入局的还有传统商超诸如沃尔玛、步步高、永辉超市等，此外还有周黑鸭、国联水产、云集等企业。巨头加码，资本角逐，行业的重新洗牌似乎成为大势所趋。此外，逐渐恢复活力的传统商超以及菜市场消费等传统零售模式也必然重新加剧行业竞争。

团购平台还将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例如，如何在疫情过后维持团长的忠诚度和服务质量？面对可能出现的消费者分流、需求下降，如何从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黏住更多的消费者？由于团购平台大多走少而精的产品供给路线，长期来看，可能无法满足消费者对多样性的偏好。如何扩充品类，满足消费者需求？此外，生鲜品类最大的问题是难以保证品质稳定，如何维持供应链的稳定？如果说区域市场的供应链资源尚可解决，但接下来如何持续向全国扩张。

针对以上问题，已有先行者率先采取了应对措施。近期，团购平台食享会与传统商超中商超市展开战略合作，旨在用“超市+社区店+社群”模式全线布局湖北。双方将开展集中采购，进一步丰富商品品类并降低采购成本、降低供应链成本，共享客户，建立社区门店，试图打造线上线下紧密相连的新零售新业态。这一新型模式也给后疫情时代的社区团购模式提供了新思路与思考。相信只有通过积极探索，摆脱同质化竞争，发挥并保持核心竞争力，方能在行业厮杀中一鸣惊人，拔得头筹。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月文章

## 公办幼儿园的摇号录取能保证公平么？

作者：宋彦（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近日，广州各区也相继公布了公办幼儿园的招生方案。摇号读公办还是用钱去私立？

其实，摇号属于录取机制里面确定优先级的工具，而录取机制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是一种用于匹配需求和供给录取机制。常见的录取机制包括了即时录取 (Immediate acceptance) 和延时录取 (Deferred acceptance)。这两种机制录取有时也分别被称为梯度和平行录取。没错，就是那个高考报志愿时让无数家长、孩子集体脱发的梯度录取和平行录取。

目前中国的高考采取的是平行录取（延时录取）来匹配考生和高校名额。在过去十几年里，如何改革录取机制使高考录取更加公平和有效是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的焦点。

但是幼儿园的录取机制如何影响录取结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各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市各个区采用的机制都有显著差异，并且改革方向不完全一致。接下来我们将以幼儿园录取为例，总结现有的录取体系，尝试讨论不同录取机制对学生和学校匹配的结果的影响。

下面是公办幼儿园录取机制概况：整体来说，公办幼儿园招生大致分为三种：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非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以及事业单位公办幼儿园。

1. 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优先考虑符合相关条件的小区业主子女入园，剩余学位再面向社会通过电脑派位进行分配

2. 非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90%的名额面向社会电脑摇号，面向社会招生后剩余的学位，由招生工作小组统筹安排

3. 事业单位公办幼儿园：除招收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子女外，有条件的可向社会公开招聘周边居民子女入园

我们所面临的“摇号”，主要应用于第二类，即公

办幼儿园的电脑摇号中。这一类型的录取主要有三步：

参加摇号的家长选择n所幼儿园，并且排序



对所有参加摇号的家长进行抽签，也就是生成一个随机数，作为每个人的优先级。



根据家长的选择、优先级和学校的学位数量，使用录取机制来分配学位。

我们可以将幼儿园录取和高考录取进行对比。高考录取的三个步骤为：

考生参加高考，通过考试成绩来确定优先级。



家长选择 n 所学校



根据家长的选择，优先级和学校的学位数量，使用录取机制来分配学位

由此可见，高考和幼儿园录取体系的区别在于：优先级的定义和两者所使用的录取机制是不同的。高考使用考试分数作为录取标准，是为了实现能力和高校质量的匹配。但幼儿园的小娃娃并不需要凭能力入学，因此选择电脑生成随机数作为娃娃们的优先级是符合逻辑的，这可以避免以其他标准作为优先级而带来的不公平现象。

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两者目前采取的录取机制的差别可能带来的影响。

考虑到广大家长、孩子的发量，高考录取体系自从2003年以来在多个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其中一个就

是从梯度录取（即时录取）改为平行录取（延时录取），并且增加可以选择的学校数量。

在遥远的上世纪实行的即时录取的主要特点是，在每一轮的高考志愿匹配过程中产生的结果，都不会在接下来发生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填报志愿的策略对录取结果影响很大。

相比之下，延时录取每一轮的匹配结果都是暂时的，只有在所有匹配轮次结束之后才会得到最终的学生与学校的匹配结果。因此，延时录取可以明显降低学生填报志愿策略的重要性。同时，延时录取机制中允许的志愿数量越多，志愿策略的重要性就越低 (Chen and Kensten, 2017)。实证研究也发现，高考从即时录取转变为延时录取显著增加了高分考生和好学校（学术水平更高）匹配的概率 (Bo et al., 2019)。

令人心塞的是，在幼儿园录取中类似的改革并没有发生，诸多地区仍然使用即时录取，并且只允许家长选择一所幼儿园。即时录取且只允许一所幼儿园录取，这

种录取机制意味着一旦因为抽签所得到的优先级不够高，被所选择的幼儿园拒绝时，就只能去选择不参加抽签的私立幼儿园。而私立幼儿园通常收费比公立更高。因此，家长在选择幼儿园时必然会非常谨慎。同时这也意味着家长所能承担的私立幼儿园收费的能力，会影响他们在填报公立幼儿园意向时的策略。家庭条件越好，所能承担的私立幼儿园费用的能力就越高，也就可以选择更激进策略。

因为家庭条件不同带来的策略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录取结果上的不平等。家庭条件好的更愿意填报热门的幼儿园，家庭条件差的会因为抗风险能力差而放弃填报这些幼儿园。最终录取结果的均衡可能是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去到热门或者私立幼儿园，而家庭较差的学生去到质量稍差的公办幼儿园。这就背离了录取体系中使用随机数分配名额来实现公平录取的初衷。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文章

## 数字政府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作者：王武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过去的几个月，中国被笼罩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阴影之下。现在，抗疫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下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回想起来，许多人都认为，如果武汉当时能早点出台有力的应对措施，我们就能进一步减少生命损失和经济代价。

这就涉及到政府治理能力的问题。不同领域的人士都从自己的观察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例如，有人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出发，希望加强流行病的防控体系；有人从地方官治理能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应该更加注重地方行政主官的治理水平以及专业背景；有人对当时物资紧缺、疲于应对的状况印象深刻，提出应该建立

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以及加强而不是削弱公立医院的发展；还有其他各方面的专业人士从更多角度提出的真知灼见。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我想探讨为什么要建设数字政府，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数字政府，建好数字政府在应对这场灾害中的有效性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重要性。

### 为什么要建设数字政府？

数字政府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2017年，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要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数字支付场景

报告将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资源来看待。基础资源越丰富，对生产效率和便捷生活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就会在网络效应下变得更强。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掌握方方面面的资源。如果能将这些资源数字化，并进而建成数字政府，将有力地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够有效地执政？数字政府是唯一的答案。

### 建设什么样的数字政府？

什么是真正的数字政府，这是建设数字政府的首要问题。

第一，政府所掌握的所有资源和信息都实现数字化，形成政府的核心资源。对于物理的资源，要在虚拟世界中有一个数据上全方位的刻画，形成数据资源。政府天然地掌握一个社会的核心数据。例如户政部门在人一出生就登记了个人身份数据和家庭关系数据，手机信号塔实时地掌握用户的位置数据以及由此生成的移动轨迹数据，房产局登记了所有的房屋产权数据，等等。

政府如果不将数字资源当成核心资源来对待，互联网企业也会将一切能获取的信息和资源数据化，并利用它们去产生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万物互联将成为潮流，互联网企业将获取更加丰富的数据。如果政府主动地行动起来，将政府的每一个行为都用数据沉淀下来，将数字资源变成一种公共资源，则可以大大地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并降低利用数据所需要付

出的成本。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区块链等技术的支持下，数据资源将很难被无痕迹地篡改。这有可能解决“天高皇帝远”——这个在中央政府对地方实现有效治理过程中被困扰千年的难题。

第二，政府所有的数据都在网上。上了网的数据是活数据，可以做到在需要的时候被即时调用。这样活的数据才是真正宝贵的资源，而且它们在被使用过后变得更有价值。这是数据资源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如石油、煤矿等资源的根本区别。数据资源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从范围和深度上都会产生自我加强的效果，也预示了数据时代的潮流会一往无前，不可阻挡。

第三，政府所有的数据都可以用来调取和计算。计算产生智能，数据的价值是通过计算来实现的。这里列举两个例子。今年2月份，公安机关破获了28年前发生的“南医大凶杀案”。而破案的关键就是犯罪嫌疑人一个近亲的血样DNA被公安机关拿来与“Y库”进行对比发现高度吻合。去年4月份，一起震惊全国的涉嫌轼母案的嫌疑犯吴某被抓。而在案发1380天后发现吴某踪迹的则是重庆江北机场的人脸识别系统。在这两个例子中，对联网数据进行计算所产生的力量可见一斑。而这只是计算的一个小小的应用，未来限制更多创新的只有想象力。

### 数字政府的重要意义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地方政府的表现参差不齐。有一个省在全国最早启动一级响应，第一个通报疑似病例，第一个开通复工人员专列。这就是常被网友叫其他省过来“抄作业”的浙江。浙江省一开始是疫情比较严重的省份，但是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使得它能够较早地实现复工，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背后，是浙江对数据的重视和利用，例如“健康码”和“五色图”。数字政府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的强大效能将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第一，在流行病防控体系上具有巨大价值。实现疫情的在线监控，不需要国家两次派出国家级专家组才能得到真实的疫情。根据浙江新闻客户端报道，从去年9月开始，杭州建设的城市大脑就能让相关领导看到杭州市当天即时的发烧门诊人数。这一实时动态的数据对于政府的决策而言是无价之宝。将它与其他数据相结合，政府会大大地提高做出正确精准应对措施的可能性。推而广之，如果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省份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新冠疫情可能就不会像实际发生的那样蔓延开来。

第二，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价值。人会撒谎，但是沉淀下来的数据不会撒谎。有句话说，“你不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便是沉淀下来的包罗万象的数据。

第三，在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上的重大价值。包罗万象的数据通过计算产生智能，这是互联网公司产生巨大商业价值的关键。一个成功的数字政府，也同样需要将数据资源利用好，通过计算来指导政府的日常工作。

### 总结

设想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如下场景：

当不明的传染病被诊断后，这个数据无法被篡改，实时地传导到疾控部门，并且与其他数据综合在一起被计算从而智能地生成一系列的决策建议；

当我们需要迁移户籍的时候，不需要人在两个城市来回地跑动，只需要在当时流行的移动终端上输入一些信息便可以轻松地完成迁移；

当我们需要办理护照的时候，只需要在网上进行申请，信息的提交和审核通过传感器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

基层公务员从繁琐的文档工作中被解放出来，干部的业绩可以被实时地考核和评比，腐败成为一件稀有的事情……

有了数字政府，这一切都可能出现。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月文章

## 重视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医疗保障水平

作者：韩昱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工从农村老家到城市务工。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增加184万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他们在城市就业困难和收入偏低等问题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农民工长期具有的城乡二元属性和社会边缘性，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长期被忽视。

### 一、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障的构成

我国目前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主要由职工保险和居民保险构成。职工保险包括公费医疗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职保”）。居民保险包括针对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针对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以及近些年来由这两种保险合并组成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于农民工具有城乡二元属性，他们不仅被流入城市的城职保覆盖，还被流出农村的新农合覆盖。

城职保开始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1998年我国实施了全面的城职保改革，2010年公费医疗改革全面展开。目前城职保已经基本取代了劳保、公费医疗制度。

城职保的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用人单位缴费率控制在职工工资总额的6%左右，职工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退休人群的保险费用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其具体缴费比例由各统筹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与其它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城职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构成。社会统筹基金的资金来源于用人单位缴纳的部分保险费，主要以地级以上行政区为统筹单位实行属地管理，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并有一定的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个人医疗账户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纳的全部保费和用人单位缴纳的部分保费。这笔资金相当于个人的资产，

主要用于支付门诊的医疗费和超出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的住院医疗费。

新农合是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推行的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的一种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新农合以政府资助为主、个人适当缴费的方式筹集资金。2017年，新农合政府补贴每人每年450元，个人缴费180元。新农合一般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各县（市）确定支付范围、标准和额度。自2003年新农合开始试点以来，参加新农合的人数和比例都大幅上涨，2013年的参保率达到了99%<sup>[1]</sup>。为了解决医保在城乡的多方面差距，国家自201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制度合并，以形成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城职保是现今国内保障范围较广、保障力度较强、报销比例较高的基本医疗保险。2018年，城职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81.6%，实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71.8%；合并后的包含原新农合的城乡居民保险政策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65.6%，实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56.1%。

2009年之前关于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政策不明确，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按照当地需求实施了不同的管理方法，农民工医疗参保状况不统一。随着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在流入地的医疗保障等各项社会保障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09年3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明确，积极推进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很多地区和城市也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和保障农民工购买城职保，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中。

## 二、农民工在城市中“就医难”

农民工城职保的参保率很低。虽然国家在2009年就从政策上鼓励并保障农民工在流入地参加城职保，但统计数据显示参保率并不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7.6%。蒋云贇使用2013年《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比例为18.7%。秦立建、陈波（2014）使用原国家卫计委2010年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专项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的医疗保险参保率为29%。由于调查的地区、统计口径等可能存在差别，上述统计数据得到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参保比例不同，但是可以得到共同结论：虽然农民工作为城市的重要建设者，他们在城市的医疗保险

参保率是远低于其他群体的。一些农民工选择在老家参加新农合，但新农合的医疗费用垫付制度、异地报销制度和报销水平等因素使其保障水平远低于城职保低，这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就医难”的问题。

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民工参加城职保的情况。例如，李培林 & 李炜（2010）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6年和2008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城职保的覆盖率为71.13%，而农民工仅为17.14%，但有2/3的农民工参加了新农合。一些研究关注了农民工城职保参保率低的原因。Xu et al.（2011）考察了2006年七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的城市医疗保险参与率仅为11.5%，他们对社保缺乏了解和参保意愿都是参保率较低的重要原因。Cheng et al.（2014）对比了2008年北京农民工中的城乡移民和城城移民，发现城乡移民比城城移民更少购买社保，并且签订劳动合同对购买社保有很大的影响。Gao et al.（2012）发现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长期合同），以及从签订短期合同（或无合同）变为签订长期合同，都能显著增加他们参与职工医疗保险的概率。

## 三、政策建议

大批的农民工在城市打拼后由于年龄、创业意愿等因素而选择返乡，这些返乡的农民工都存在医疗保险的顾虑。如何实现医疗保险的异地报销和转移问题，是下一步医疗保险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央在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见中已经提出要逐步提高医疗保险的统筹级别，统一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基金管理和定点管理。在此基础上，如何将政策覆盖到需要参加城职保的农民工群体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选择不为职工上保险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降低成本，甚至有些企业在完全为职工上“五险一金”的情况下将无法存活。而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状的办法则是提高中小企业盈利水平。2019年政府降低增值税，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等，这些减税措施能够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企业盈利，使企业有动力稳定雇佣员工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

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他们需要提高对社保的认识，意识到参与保险是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同时政府应该引导在农民聚集的产业园区等开展职业培训，加大对城职保的保障内容的宣传力度，使农民工认识到城职保是保障水平更高的医疗保险。

# 金融危机可以被预测吗？

作者：谢慧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北京时间3月19日凌晨，美股触史上第5次熔断，而近4次都发生在今年3月。于是网上流传着巴菲特“活久见”段子：

3月8日，巴菲特：我活了89岁，只见过一次美股熔断。

3月9日，巴菲特：我活了89岁，只见过两次美股熔断。

3月12日，巴菲特：我活了89岁，只见过三次美股熔断。

3月16日，巴菲特：我活了89岁，只见过四次美股熔断，我太年轻了……

3月19日，巴菲特：……

面对市场突然的动荡，大家很容易认为股市大跌是“黑天鹅”<sup>[i]</sup>事件导致。例如此次疫情没有人能够预知，疫情爆发后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美股在此之前已经跨越了十年牛市。

Didier Sornette曾在TED上做过一次非常经典的演讲<sup>[ii]</sup>，他认为金融危机不是黑天鹅，而是可以被预测的“龙王”（dragon kings）。在这里，“龙王”指观测数据的异常值（outliers）。它们的数量级别通常非常大，超出了样本分布规律，像“龙”一样引人注目。Didier Sornette提出，突发因素（或外生冲击）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系统不稳定性才是根源，而捕捉“龙王”则是预测危机的关键。

## 金融危机不是“黑天鹅”

2013年诺奖经济学得主尤金·法玛（Eugene Fama）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 EMH），认为金融资产价格已经反映了全部可得信息。金融危机被视作由外生冲击造成，即“黑天鹅”因素导致。既然如此，那么市场和政府所能做的则非常有限，只能在危机之后尽量降低经济损失程度。

然而，该理论隐含的理性人假设过于完美。事实上，我们很难期待市场的参与者做到时刻理性，并迅速对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复杂系统方法（complex system approach）放宽了对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它将经济的演化看作是动态的、非线性的和不确定的过程。

我们可以将金融市场看作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sup>[iv]</sup>，系统内部存在模仿（imitation）、羊群效应（herding）、自组织协同（self-organized cooperativity）、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s）等现象，系统本身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endogenous instabilities）。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时常能观测到一些异常值（“龙王”），传统的统计分析会将其排除在外，然而它们也是金融复杂系统的一部分。Didier Sornette指出约2/3的“龙王”实际上是金融危机。“龙王”不同于黑天鹅，恰恰相反，它们是可以被预测的。

## 随处可见的幂律分布

首先需要了解，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中随处可见的幂律分布，它可以用于描述地震能量、战争规模、单词使用频率、好莱坞电影收入、城市规模、股指回报等事件的分布规律。幂律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x可以趋于无限大；指数 $\mu$ 则描述了分布尾巴的性质，当 $\mu < 2$ ，则称为“肥尾分布”。在双对数坐标下，幂律分布表现为一条斜率为负幂指数（ $-\mu$ ）的直线。

以地震规模为例，幂律分布可以对其进行比较好的拟合。下图1为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地震地区的地震矩 $M_0$ （大致与能量成正比）的分布，横轴为地震能量 $M_0$ 的对数，纵轴为地震频次的对数，幂指数 $\mu \approx 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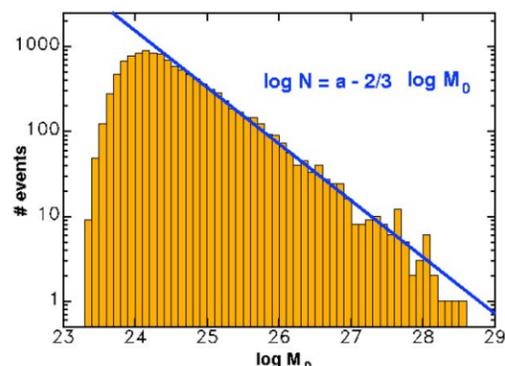


图1地震能量与频次分布

社会系统中也能发现不少幂律分布规律，下面以好莱坞电影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回报为例。图2为好莱坞制片厂生产的50部顶级电影收入与排名顺序图（按其1977年至1994年每年的收入计算），幂指数  $\mu \approx 1.5$ 。图3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896年5月27日至2000年5月31日期间的正值（连续线）和负值日收益率（虚线）的生存分布，包含28415个数据点。尾部笔直部分符合对数标度的幂律分布，指数  $\mu \approx 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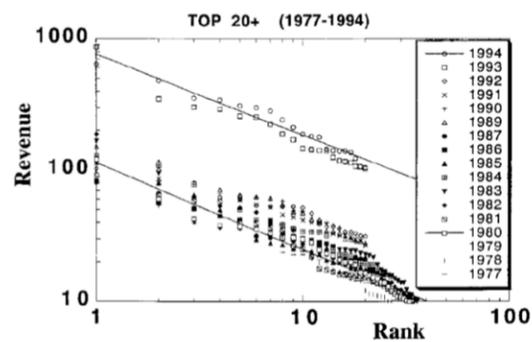


图2好莱坞电影收入与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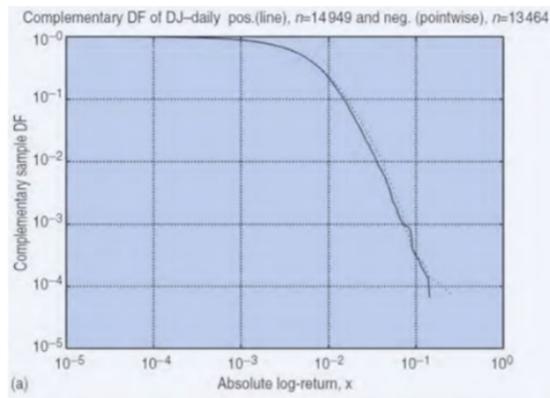


图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回报

### “龙王”：常规幂律分布无法捕捉的异常值

异常值“龙王”无法被常规的幂律分布捕捉，它们值得关注。在统计学上，为了得到更可靠的推断，我们通常会将极端值视为误差或异常值，将其排除在外。Didier Sornette 则认为这些异常值具有重大意义。他注意到，在大量复杂系统中，极端事件甚至比幂律分布尾部向外推测的数量级更大。他们将这些极端值称为“龙王”（dragon kings），这表示我们在面对超越常识的对象。

金融市场中也能找到这些“龙王”，它们被单点统计数据忽略。虽然从上文图3来看，幂律分布似乎很好地描述了股票市场的收益和损失。但 Didier Sornette 指出，基于固定期限（例如小时、日、周等）计算收益，就会忽视重大风险因素。举个简单例子，10% 市场下跌在统计上的概率为 0.001[v]，那么连续下跌 30% 的概率则为 10<sup>-9</sup>，这说明四百万年才遇见一次。但是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却不时看到市场在短期内大幅连续下跌。因此，单点统计数据无法展现系统所蕴含的巨大风险。这背后的逻辑漏洞为，我们假想损失是彼此独立的。

Didier Sornette 恰恰认为这些损失都是彼此相关的。他如此定义金融危机：金融崩溃是互相联系的连续大量损失在瞬间的爆发（‘Financial crashes are transient bursts of dependence between successive large losses.’）。他认为我们应该分析金融资产的涨幅（drawups）和跌幅（drawdowns）[vi] 的分布规律，这更能够反映市场的风险。图4展现了美国30家企业股票的涨幅和跌幅分布，横轴为涨跌幅度（%），纵轴为概率取对数。大部分数据分布在幂律函数上，但尾部存在一些“龙王”极端值。Johansen 和 Sornette 发现，约有 2/3 的“龙王”实际上为大泡沫之后的股市崩盘。他们提出的龙王理论将金融危机视为泡沫的终结。泡沫产生于市场交易中的正反馈机制 [vii]，导致价格超指数级发展，而这一增速不可持续。因此，金融危机实际由系统不稳定性（systemic instability）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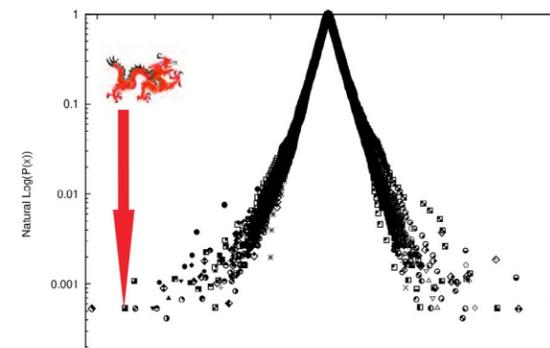


图4 美国30家企业股票的涨跌幅

### 捕捉“龙王”预测金融危机

许多复杂系统都在其特性和动态方面都存在质变。Didier Sornette 提出，灾难性事件涉及许多不同规模的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组织集体机制的转换。系统的“质变”可能有许多名称：破裂（ruptures）、相变（phase transitions）、分叉（bifurcations）、灾难（catastrophes）、临界点（tipping points），它们通常是“龙王”的起源。引用复杂系统理论和统计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不需要大的扰动就能导致剧烈的瓦解。那么，当一个市场经历了十年大涨，狂欢则随时都可能停止。

金融危机同样存在可观的先兆信号（precursory signals），系统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信息包含在超指数增长的早期发展阶段之中。早在1996年，Didier Sornette 等人运用对数周期幂律奇异性模型（LPPLS），识别了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的前兆模式、弛豫振荡和余震特征，模式与地震相似。其中，“对数周期”是指加速振荡的部分，“幂律”则代表由于正反馈带来的超指数增长。他们的模型理念主要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理性预期泡沫、行为金融的投资者和交易员模仿行为和羊群效应、数学和统计物理学中分叉和相变概念。将以上理念引入 LPPL 模型，采用参数化表现形式，使得模型能够捕捉到资产价格在临界点的奇异性特征以及周期性震荡特征，从而检测泡沫发展和预测泡沫破裂的临界点。

Didier Sornette 的实验室 Financial Crisis Observatory (简称 FCO) 做了不少预测金融危机的研究。事实上，他们已经成功预测过2004年英国房地产泡沫、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2008年全球石油泡沫，也包括2005年、2009年、2015年我国股市泡沫（如下图5）。图5的蓝色线代表上证指数（左纵轴），红色线代表“DS LPPLS Confidence”（右纵轴），是 FCO 实

验室实时监测泡沫的指标之一，越大则代表此时 LPPLS 模型的拟合度越好。他们识别了2015年上证指数的三次泡沫及随后的纠正，分别发生在2014年末、2015年4月和6月，领先于市场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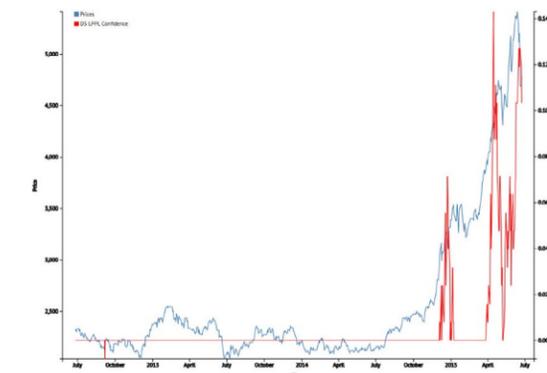


图5 FCO实验室对2015年上证指数泡沫的实时预测

Didier Sornette 指出甄别“龙王”需要使用不同的窗口期去测试数据，并且要求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检验。同时注意，这些能够让我们预测到泡沫的终结，但不能预测崩溃本身（‘end of bubbles, not crashes per se’）。因为有时泡沫后系统不一定会崩溃，有可能进入平稳期或缓慢衰减。就像无法100%准确预测天气，当然我们也无法100%准确预测股票市场。

### 小结

综上，Didier Sornette 的研究直接指出，金融市场的超指数增速不可持续。复杂系统理论认为，金融危机实质由内生不稳定性导致。如此看来，美股大跌的黑锅，疫情不能背。而那些经常被概率统计忽略的异常值“龙王”值得我们注意，捕捉它们是预测危机的关键。

马克·吐温曾说过：“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而是我们确信的谬误论断”（‘What gets us into trouble is not what we don't know. It's what we know for sure that just ain't so.’）根据 Didier Sornette 的研究，金融危机不是黑天鹅，而是可预测的龙王。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文章

## 在戴口罩这件事上，我们与外国人差别有多大？

作者：张亚楠 谢慧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席卷全球，在这场全世界与病毒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多起因医疗物资而引起的争夺纠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口罩的争夺。口罩作为本次疫情期间最为关键的“硬通货”，是无可替代的“安全感”来源。然而，与我国全民口罩现象相对的是，欧美国家似乎对口罩防护并不青睐。因此有一个问题不由得引发思考，为何西方国家不愿意戴口罩？这究竟是他们的防疫措施中没有此项宣传，或是文化差异使得他们确实不喜欢戴口罩，还是说，当地的口罩供求仍然存在较大矛盾？

### 防疫宣传：欧美以勤洗手和少走动为主

在浏览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几个欧美国家官网之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家均强调了减少外出和聚集、勤洗手、保持距离一类的措施。我们打开英国政府官网首页，就会弹出英国政府对民众的要求，第一条说的便是减少外出，保持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同时，英国政府也提醒民众要经常洗手，同时强调了无症状者也可能传播病毒的情况。但在英国政府的这份提醒中，并未提及到民众到公共场所需要戴口罩等任何关于口罩防护的情况。

美国政府网站首页也提供了由美国国家疾控中心提到的几条家庭保护措施：第一条是勤洗手，第二条是避免外出，第三条是聚集时要戴口罩遮住口鼻，第四条是咳嗽和打喷嚏时要遮住口鼻，第五条则是注意清洁和消毒。这是一份较为全面的家庭防疫指南，也提到了口罩的防护。然而，在其第三条聚集时要戴口罩这一措施中，其口罩英文使用为“a cloth face cover”而非“facemask”，且专门强调了不允许使用医护人员的“facemask”。因

此，这项防疫措施中提到的“cloth face cover”应该是布面口罩、围巾一类的遮挡物，而非提倡戴普通的一次性防护口罩，更不必说医用防护口罩和 N95 口罩了。

曾经的“震中”意大利的政府官网给出的新冠肺炎的防护行为中也提到了口罩，不过，他们并未说明普通人需要戴口罩，而是强调了怀疑自己已感染新冠肺炎或是已经出现相关症状的人，需要佩戴口罩。

回到国内，由于疫情最早发现于中国，国家层面做了诸多防护措施指南，尤其对于口罩的运用，不光在个人防护中强调了口罩的作用，而且对于口罩佩戴场所、口罩处理等问题做了大量答复。

从个人防护的角度讲，各国在倡议不同的防疫措施时都注意到了个人卫生和避免聚集的重要性，这是从切断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角度进行的最为有效的几项措施。

而对于口罩防护的重要性，各国官方层面并未像中国一样倡导全民口罩。而从各类媒体报道中也能看到，西方民众在大街上戴口罩的现象并不如我国普遍。笔者认为，一方面源于欧美与亚洲截然不同的“口罩文化”，另一方面也源于国外口罩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的现实情况。

### 迥异的口罩文化：从西方到中国

我国此次“全民口罩”的现象并非没有根据。近二十年我国经历了几次公共卫生事件和环境污染问题，包括 2003 年 SARS、2009 年 H1N1 流感和雾霾事件，因此国人对戴口罩的防护行为并不陌生，可谓是居家必备之良品。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的表征较轻，早期试剂检测的速度较慢、范围较小，又适逢人口流动极频繁的春节时期，所以民间戴口罩的行为比官方倡议更早。

中西方国家不同的口罩现象与其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有关。第一，中西方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明显不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告诉人们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还有天堂和地狱。而中国虽有“生死有命”的说法，但总体来说是避讳死亡的，例如，古人总是对长生不老有着

执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如此重大的威胁时，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避免悲剧的发生，对待病毒，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少杀一个。因而口罩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第二，中西方文化的内核有着本质区别。西方是自由主义的，他们强调个性的表达，反对对人的限制和约束；而东方儒家文化更崇尚集体主义，他们更有大局观，能够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牺牲个人的部分利益，当国家向民众提出要求之时，人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暂时牺牲自己。

因此，中国政府呼吁戴口罩和待在家中时，人们能够很快响应政府的号召忍受戴口罩的不适，并响应号召居家减少外出。世卫组织此次也称赞中国的防控措施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 供求矛盾：医用口罩供应链中断

欧美和日本等国口罩短缺，依赖进口。美国方面，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3 月 4 日发布，美国现有库存 4200 万枚 N95 和医用外科口罩，如果疫情爆发，大约需要 35 亿枚。由此可推算，美国现有库存仅能满足医疗人员所需的 1.2%，缺口高达近 99%。美国计划在未来 18 个月动用部分资金购买 5 亿个 N95 防毒面具和口罩。欧洲国家方面，德国、意大利、法国等不少国家出现口罩争夺战。日本方面，根据日本卫生材料工业联合会统计，2018 年日本销售 55 亿个口罩，70% 从中国进口，20% 为日本本国生产，还有 10% 来自泰国、缅甸等国。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和出口国。2019 年全年，我国共生产了 50 亿只口罩，占全球总量的 50%。摩根士丹利分析，从口罩供应链来看，全球 85% 的医用口罩生产在中国。为应对疫情冲击，政府鼓励我国企业转型生产和扩产口罩，我国口罩产能因此得以较快恢复。工信部发布，截至 2 月 29 日，包括普通口罩、医用一次性口罩、医用 N95 口罩在内，中国口罩日产量为 1.16 亿个。截至 4 月 5 日，中国医用 N95 口罩日产能超过 340 万只。这是国家集中力度保障医疗物资的生产和调度后取得的艰辛成果。

回顾我国疫情爆发期间，许多国家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中国目前也在尽力回馈。外交部统计，截至 3 月 2 日，共有 62 个国家和 7 个国际组织向中国捐赠了口罩、防护服等中国急需的疫情防控物资。桃李相

报，在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国外疫情加速蔓延之际，我国向有关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据统计，截至 3 月底，共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中国提出相关物资需求，涉及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海关统计，从 3 月 1 日到 4 月 4 日，我国共验放出口口罩约 38.6 亿个，价值 77.2 亿元；防护服 3752 万件，价值 9.1 亿元；呼吸机 1.6 万台，价值 3.1 亿元。

医用口罩的生产需要完整的供应链，疫情冲击下，由于全球供应链中断、各国产品认证标准存在差异等原因，全球医用口罩短期内供不应求为常态。医用口罩的上游原材料首先为石油提炼出的聚丙烯 (PP) 颗粒，然后生产聚丙烯纤维，最后用聚丙烯纤维生产无纺布。首先，医用口罩核心材料熔喷布现有存量不足。我国是口罩上游原材料的生产大国，据了解，熔喷布价格已从 2 万元/吨上涨到约 30~40 万元/吨。第二，熔喷布的生产设备存在较高技术门槛，核心的喷头及配件需要从德国、日本等国进口，生产线投入成本达到千万元级别。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中断，出口和进口贸易广受影响。第三，企业转型生产医用口罩门槛高，要求配备净化车间、微生物检测实验室等设备，也需要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才可生产，普通企业很难转型、扩产。最后，各国产品认证标准存在差异。从 4 月 1 日起，我国口罩出口需要取得国内注册证和出口国注册证“双证”。欧盟为例，口罩获准进口需要有欧盟 CE 标志认证，表示其符合安全、卫生、环保和消费者保护等一系列欧盟指令所要表达的要求。疫情期间中外人员往来受限，影响相关认证速度，国际物流也相应提高运费。因此在短期之内，全球医用口罩产量难增加，仍会面临较大的产出缺口。

### 结语：

出于不同的防护策略、文化差异和供需矛盾等种种原因，西方与中国在口罩防护问题上走出了两条并不相同的道路。然而无论采取何种防护策略，只要人民的生命权受到尊重，国家策略便不失为好的策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疫情席卷全球的浪潮之下，各国积极抗疫是人类携手走出困境的唯一方式。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 月文章

## 关于“共享员工”用工模式的几点思考

作者：薛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余家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名为“共享员工”的用工模式。受管控隔离措施的影响，在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旅游等停工行业出现暂时性的劳动力过剩，而在快递物流、外卖配送、新零售、电商服务等行业中，则因增产出现了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相关报道显示，在2020年春节假期，新零售代表盒马的员工在岗只有70%，隔离措施带来激增的订单需求下，对应的劳动力缺口高达6000人。

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存在暂时性劳动力短缺的企业向存在暂时性劳动力过剩的企业“借调”待岗员工，以调节供需上的结构错配，这便是“共享员工”的用工模式。据媒体报道，盒马最早提出了“借调”待岗员工想法，从云海肴、青年餐厅等餐饮行业招募了近500名员工。此后，沃尔玛、京东、苏宁、联想等企业也相继跟进，推出类似的“共享员工”举措。“共享员工”模式已从商超与餐饮业发展到物流和制造业，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扩展。

“共享员工”的用工现象及其模式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与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共享员工”是就业灵活化的新现象，打破了传统雇佣关系束缚，有可能代表了未来其中一种新就业形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共享员工”只是疫情期间为解“燃眉之急”的临时性举措，由于存在劳动关系模糊、用工用人分离等问题，容易带来劳资纠纷，并非劳动力用工市场的长久之措。

虽然对目前“共享员工”的讨论颇多，但基本止于新闻报道，颇有“隔靴搔痒”之感。正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当前/过去”才为人所真正理解。我们的思考是，“共享员工”这一模式，真的是全新的吗？在既往劳动用工市场中，是否有迹可循？结合笔者收集到的研究案例，本文试图说明，“共享员工”并非全新用工机制，而是既往“劳务派遣用工”在当前的变体。

### 劳务派遣：“共享员工”的前身？

2019年底，在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我们调研了东莞一家业务主要面向北美市场的制造企业。受到贸易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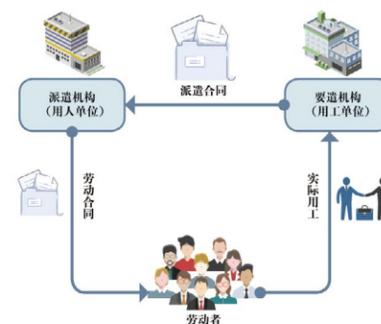
影响，商品竞争优势减弱，该企业出口北美的商品市场份额从既往40%下降到近来的20%左右。市场波动带来了企业用工过剩问题。为了减轻用工成本，企业决意裁员，减少一线员工的使用。但对企业来说，如果一次性裁员较多，需要依法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对于企业本身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从短期上裁员并不能减轻用工成本；另外，由于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市场订单未来是否会随中美局势缓和而恢复增长？即使再招录工人重新恢复生产，从长期来看，同样要付出较高用工成本。

面对这两点不确定性，该企业策略是注册成立了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在协商与沟通的前提下，根据职工绩效排名，把原属企业，处于“被裁”行列的职工的劳动关系转移到该劳务派遣公司下。对于这一举措，近八成的普工选择了关系转移。随后，企业通过与周边企业联系，解决这些职工的就业问题。相比日结的零工而言，这些职工过去在企业稳定工作，特定工艺的熟练程度较高，能力较强，同时数量成批量，具有就业竞争力，得到附近没有受贸易战影响的企业工厂欢迎。通过这一举措，公司解决了内部用工过剩的问题，节省了用人成本近3000万，同时满足当地用工的季节性需求。一旦生产恢复，这些劳动力将重新使用，避免了裁员后再招聘、培训新工人所带来一系列的成本支出。

东莞企业案例与当前员工共享案例具有相似性。都是一种如何在生产波动、用工过剩背景下进行市场性的自救行为。但区别在于，在东莞企业案例中，企业先成立了劳务派遣公司，再作出“员工共享”的决策，而非直接把员工“借用”给周边工厂。为什么企业需要如此“大费周章”，这需要回到劳务派遣用工的发展说起。

### 劳务派遣：从滥用到规范

我国的劳务派遣现象最早兴起于在2005年，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用人单位）与派遣劳工（就业者）订立劳动合同，把劳动者派向其他用工单位（用工单位），再由其用工单位向派遣机构支付一笔服务费用的一种用工形式。劳务派遣制度的本意在于，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的就业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第66条）。



虽然理论上，劳务派遣机构也需要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保障、社会保险及用工福利。但实际上，由于“用工单位”及“用人单位”的责任分离，以及监管缺位，劳务派遣工人很难享受到“正式”职工同样的待遇，面临着“同工不同酬”、“职业天花板”、就业不稳定/短工化以及工伤事故频发等问题。针对涉及劳务派遣司法文书的研究发现，21世纪近10年来，不少企业利用法理和司法实践中的黑洞，使用劳务派遣中介公司作为摆脱对劳动者保护义务的“护身符”。

在低成本用工与劳动责任规避的驱动下，劳务派遣用工滥用现象非常普遍。中华全国总工会曾先后于2010年、2011年两年对全国25个城市、1000家企业、10000名职工进行问卷调查。其估算表明，全国企业中，劳务派遣工占企业职工总数13.1%，约3700万人。而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工都是农民工身份。更为惊人的是，在上海，调查到的42万职工中近四分之一为劳务派遣工人；将近四成的劳务派遣工人在用工单位中就业超过六年以上。劳务派遣制度不仅被企业用于临时性或非全职工人，更是被用于长期的全职工人，部分企业借用劳务派遣的名义，在企业内部构建二元劳动力市场。

为了遏制劳务派遣用工乱象，在2012年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劳务派遣机构的经营准入条件（注册资本大大提高），并新增了行政许可审批制度：要求“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第57条）。在2014年人社部出台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则进一步规范了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用工比例及其相关程序。尤其是，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10%。这样一来，劳务派遣用工市场实际上得到了较为严格的规范与限制。所以在这五年来，市场转向了外包（outsourcing）、众包（crowdsourcing）等同样灵活，却因为新型而尚未得到劳动法规充分规范的用工市场。

### “共享员工”：不应回到原点

	用人单位	用工单位	用人单位有无派遣资质	劳动法规有无对应规范
员工共享	A企业	B企业	无	无
劳务派遣	A企业	B企业	有	有

虽然目前没有相关解答指出“共享员工”就是劳务派遣，但我们可以看到共享式用工与劳务派遣具有相似性。本质上，都是“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分离，而目前对于员工共享现象，用人单位无派遣资质，劳动法规也无对应规范。

本文认为，“共享员工”并非全新现象，是既往“劳务派遣用工”在当下的变体。属于疫情期间临时性、暂时性用工的“特事特办”。从法规的角度看，是没有劳务派遣资质的用人企业把员工派遣去第三方企业用工行为。兜兜转转，“共享员工”，不应回到原点。对于灵活性用工，还是需要已有劳动法律法规框架下进行，否则容易带来用工纠纷问题。人社部2月份发布的一份解答中也强调：“原用人单位和借调单位不得以‘共享员工’之名，进行违法劳务派遣，或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规避用工责任”。

但是，“共享员工”并非无借鉴之处。我们的思考是，“共享员工”现象反应了劳动力市场灵活化需求。如果仅仅是僵化遵循劳动保护制度，企业与就业者皆面对着一一定的交易成本，例如失业者在重新搜寻工作上花费时间精力，不同企业在辞退或招聘需要花费较大的支出。为此，就业市场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平台，根据双方的实际需求撮合劳动力与企业的搜寻匹配工作。

在此，笔者支持在政府职能部门指导与监督下，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情况下，在企业间依法借调、重新配置职工，实现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化”。一方面，可以帮助职工规避失业风险，减轻就业者搜寻工作成本；另一方面，能减轻企业用工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减轻规模裁员带来的开支。近来，杭州、东莞等地所采取的“用工余缺调剂平台”、“共享员工信息平台”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盘活闲置的要素资源正是“共享经济”的要义。但归根到底，无论何种用工模式都应该尊重劳动者知情权与同意权，并充分维护其应得权益。对以上权益的保障机制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表现为工会、集体谈判等制度，而在我国，充分实现这些权利需要做的工作依然很多。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月文章

## 暨济一堂

## 疫情之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2020年6月13日-14日,由我院主办的第四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在线上顺利举行。来自哈佛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北德克萨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青草公益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相聚“云端”,围绕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发展问题展开为期两天的政策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200余位关注该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在线参会,共同探讨新冠疫情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

在13日的政策论坛上,共11位资深学者发表了精彩观点。我们特将观点进行整理后发布。

## 史耀疆:疫情背景下我国贫困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史耀疆教授分享了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在疫情后可能面临的新的问题。中国目前大约有1,170万0-2岁留守儿童,超过中国0-2岁儿童的四分之一(UNICEF, 2014)。在疫情以后,部分流动人口被隔离,导致他们的婴幼儿子女缺少照顾。虽然在疫情期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文件要保障这类儿童的关爱照顾,但是,父母外出对婴幼儿究竟带来怎样的效应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母亲外出务工的情况越来越多。目前,学界尚没有形成母亲外出务工对孩子产生影响的共识,但根据一些研究表明,0-3岁的孩子在缺乏父母的陪伴下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身心健康以及社会情感发展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的研究也表明,0-3岁是对孩子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最高的一个时期。根据史耀疆教授团队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农村有大量0-3岁的孩子是处在缺乏母亲照顾的状态,这些孩子存在认知滞后、语言滞后、社会情感发育滞后的问题,因此,母亲外出打工会对孩子的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母亲的外出务工能够为家庭带来正向的收入效应,但在疫情的影响下,母亲的外出务工收入可能会降低,因此收入效应减弱;同时,母亲外出务工使他们对子女的照顾陪伴效应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有效的提升农村人口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史耀疆教授建议实施一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让农村母亲能够留在家中陪伴婴幼儿。

## 陆铭:近期关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一些焦点问题

陆铭教授分享了疫情影响下关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五个看法。其一,本次新冠疫情主要影响了大量农民工就业的服务业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造成了大量农民工失业、社保断缴、在城市的居住中断。因为这些原因,他们的随迁子女可能将不符合流入地城市的入学条件。

其二,陆铭教授认为,不能因为本次疫情从武汉开始暴发,就认为疫情与城市规模有关,从而反对城市化和大城市发展。

其三,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高中教育问题,我们需要有前瞻性。一旦高中教育进入到普及阶段之后,在流动人口众多的特大城市将急剧增长对高中教育资源的需求。

其四,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得到重视。在《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的出台下,中国的特大城市发展可能会为了抢占国际人才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的门槛。因此,我国可能出现流动人口获得大城市户籍的门槛高过外国人永久居留的门槛的情况,这个矛盾需要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

其五,陆铭教授建议未来柔性处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权力。例如,针对部分出生和生活一直在当地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他建议从城市的人文关怀和公平角度,考虑他们的入学需求,适当降低入学门槛。

## 吴开俊:疫情冲击下再谈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问题

吴开俊教授针对广东省农民工随迁子女集中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和惠州七个珠三角城市,报告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问题。

首先,相比京津冀和长三角的随迁子女集中城市,这七个珠三角城市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在财政投入的努力系数、“入读公办学校”学生总量、与父母“在一起”指数等指标都比较靠前。从经费投入的角度看,珠三角城市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在市级财政(包括区/县),合计承担的比例均在97.83%左右,而中央和省财政合计承担比例几乎没超过3%。

其次,吴开俊分享了对未入读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进行不同水平的生均经费补贴,这七个城市的经费缺口的大小。他们发现,如果通过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方式来补贴生均经费,广州、佛山和中山的经费缺口总计25.15亿,而深圳、东莞、珠海、惠州四个城市的总和经费缺口有77.69亿。

最后,面对这些经费缺口,报告中建议依据不同城市的财政负担情况,调整地方、省财政、中央财政的分担比例。广州、佛山和中山的教育经费由市级(包括区/县)财政自己承担。而其余四市的缺口过大,应由更高级别的省财政和中央财政进行分担,例如省财政负担比例上升至20%,中央财政约为5%。

## 冯文猛:强化学校健康教育,提升流动人口子女应对疫情能力

冯文猛的报告主要围绕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健康教育展开。报告指出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根本需以预防为主,因此,以学校为基础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以增进学生及学校全体人员健康为目的的学校健康教育十分重要。教育内容包括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和公共卫生意识,掌握知识技能,减少危险因素影响。

首先,报告梳理了国际上学校健康教育的有关做法,主要以立法推动为主。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新加坡、日本和英国等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设立国家健康教育相关法律条文。

其次,报告指出我国学校健康教育发展的制度政策在不断推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目前我国健康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政策包括综合性政策,例如《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等,以及和以特定疾病防控为目的的专项教育政策,例如《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等。当前,几乎全国所有学校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学校健康教育活动。

最后,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学校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为四点:健康教育政策体系不完善,部门协作性欠缺;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动力不足;健康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学校开展健康教育能力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应对性的政策建议。

## 陈媛媛:疫情期间的流动儿童教育

陈媛媛教授基于上海流动儿童跟踪调查数据分享了疫情期间流动儿童教育的最新状况。首先,报告指出,2014年以来,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导致北京和上海的流动儿童入学率下降。根据上海的调研数据,2015年起,市区公办学校内流动儿童比例逐渐下降;郊区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比例在2015-2018年下降,2019年后有所回升;郊区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招生人数下降,同年级学生转出率上升。2019年后招生人数有所上升,但学校之间差异很大。

其次,报告调研发现,疫情期间,流动儿童转学率显著增加,尤其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主要原因包括家长因疫情离开上海,返回原籍地工作;有些学生留在原籍,因为原籍的学校开学更早。

报告进一步指出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疫情期间遇到的四点困难:返校率下降,生源减少,生均经费下降,导致学校财务困难;教师工资水平低,师资不足;疫情防控的人力、财力和场地资源不足;学生返校和上下学增加了疫情防控难度。

最后,报告总结了流动儿童疫情期间的学习情况:流动儿童学习的设备条件受限,很多仍然在农村,没有网络;家长教育水平较低,无法辅导;线上的教学效果打折扣;复课后有些学生无法返学。

## 刘玉照：跨界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组织参与的多重困境及其超越——对长三角流动儿童教育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实践的考察

刘玉照教授与王元腾博士基于对长三角流动儿童教育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实践的考察，首先分析了跨界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社会组织所面临的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是“跨区域”的儿童服务提供，存在衔接与协同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跨领域”，社会组织“独立自主、公益追求”的实践取向与政府的“有意控制”及市场的“牟利取向”之间存在张力。

其次，他们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为了超越当前所面临的参与困境，社会组织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跨区域”中充当了“网络链接”的角色。一是通过搭建中介桥梁，以民间性非正式组织身份嫁接起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间的沟通渠道；二是打造资源链接平台，增加了社会组织间的沟通交流机会，加强稳定合作。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跨领域”中扮演了“缝隙粘合”的角色。一是转化政府资源，构造均衡点；二是面对社会组织牟利的质疑，主动切割市场和公益服务领域以强调公益价值追求；三是构造多元化组织身份，多方动员企业、政府资源。这些举措消弭了社会组织与市场、政府间的张力。

## 周纪平：疫情下的上海随迁子女学校近况

周纪平会长先介绍上海随迁子女学校的数量变化，在最多的时候大约在160所左右，但近几年随着城市人口管控相关政策，上海市采取公办为主的管理办法，逐渐压缩民办随迁子女学校，到现在仅剩64所，今年还将关闭一些。接着他分析了疫情下上海随迁子女学校的近况：首先，因疫情原因，学生流向发生变化。年初，不少随迁学生随父母返回老家过年，在疫情发生后，一部分选择留在老家，父母在当地就近务工，不再返沪。人数不是很多，但各镇情况有所不同，有的接近百分之五十。返沪未返校继续在家上网课也有一部分，尤其是即将关停的学校受影响更大，家长对学校缺乏信任感。年度考核对学校关停有直接影响，不能达标的学校当即取消下一年度的招生指标计划；由于生源减少，获得的经费补助减少，这更加剧了教学人员流失，迫使学校关停。第二，教育行政部门将随迁子女学校的教师培训纳入全市学校教师培训体系，并依相同考核标准要求学校，这对于随迁子女学校有利，但也加大了压力。第三，疫情

期间 NGO 组织针对随迁子女开展了不少社会服务。例如开展家长网络教育讲座、资助困难学生饮食等。最后，随迁学校经费紧张，仍是当前主要问题。优秀教师留不住，随迁子女学校运营难度大。五个区中虽然有两个区已将生均经费提升到每人每年7000元，但另外三个区任然维持在6000元。希望政府加大随迁子女学校的经费投入和扶持力度，保证学校良性运作。

## 陆建非：抗疫的困顿与磨练——以上海和杭州两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为例

陆建非教授分享了他观察到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新冠疫情下面临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和管理上的困顿与磨练。首先他谈及了他在疫情期间到访过的位于杭州余杭区和上海宝山区的两所学校。通过对学校情况的调查和分析，他发现几点现状：第一，网课的质量不高；第二，线上学习环境不好；第三，抗疫现状不容乐观；第四，两所学校的经济状况比较乐观。根据这种现状，他进一步从心理、经济和管理三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困顿和磨练。

随后，陆建非提到，本次疫情更加凸显了流动人口所面临的问题，例如流动人口群体的边缘化、健康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保护危机。同时，本次疫情也给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进程带来比较大的困难，打乱了扶贫的节奏。

最后，陆建非认为要关注、关心、关爱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一定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不断提高它们在抗疫磨练当中的生存能力，使得民工子女学校能够长久有耐力地发展。

## 唐晓杰：线上教育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影响

受疫情的影响的停课不停学是中国最大规模的线上教育的实验，线上教育对流动人口子女到底有什么影响，是唐晓杰所关注的主题。

唐晓杰首先介绍了近几年上海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基本情况：总量基本稳定，但是近年来随迁子女学校及其学生数量越来越少，主要由公办学校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

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育虽然受到很多的认可，但唐晓杰认为：虽然流动人口子女能够接受线上教育，能够享受线上优质资源，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可能受到制约，比如电子设备的获取，家庭的环境，课本教材的到位率和师生互动的平台等方面。

最后，唐晓杰针对“搞好线上教育要覆盖全体学生，尤其能够对流动人口的子女，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所谓优质教育”这一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加强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二是要加强电子教材电子课本的配套。三是要监控技术带来的风险。四是要加强教师的线上教学能力。

## 黄励：打工妈妈互助积分入学探索

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黄励分享了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在广州打工社区中组织打工妈妈就积分入学入户政策进行互助的一些探索经验。黄励的团队走访发现，积分入学入户政策有助于外来务工家庭获得公共福利和教育公平，但由于家长们不了解政策、看不懂政策细则、申请过程麻烦等原因阻碍这些家庭享受积分入学的机会。通过组织打工妈妈进行积分入学政策互助，以宣讲会、线上微信群等互助形式介绍积分入学政策内容和分享成功家庭经验将有助于这些外来务工家庭克服障碍，获得社会支持，扩大积分入学政策的实际受益面。

## 向芯：疫情冲击下的流动儿童中考困境

向芯博士以广州为例，详细阐述了当前流动儿童面临的初中毕业后的升学问题。青草公益的调研团队跟踪广州异地中考政策的变迁。2014年正式推出异地中考政策提高了非户籍生考公办普通高中的门槛，且压缩了公办普高开放给非本地户籍学生的学位数量和比例。根据向芯团队的估算，2018年，广州非本地户籍考生被公办普高录取几率仅有本地户籍考生的五分之一左右。

其次，向芯根据青草公益2018-2020年间的田野调查资料，将流动儿童入学的初中根据生源类型和升学引导策略分为“中考至上”、“系统分流”、“中考无望”三类，并发现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学生参加中考的引导策略不同。他们还发现，由于流动儿童面临的系统性的升学壁垒，很多学校里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早就确定了读高中是没有希望的，向芯团队借用人类学理论中的阈限(liminality)的概念来形容这些学生所处的状态：

主流的考试升学目标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但又还没有其他有说服力的目标和框架指引他们当下的生活，于是许多学生沉迷于娱乐，在家长、老师看来好像不求上进。

疫情的冲击对处于“中考导向”和“过渡空间”的学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疫情导致的中考时间不确定和线上学习效果不佳让“中考导向”的学生和家长更加焦虑；而处于“过渡空间”的学生则被从对他们无意义的课堂学习中解放了，他们中有的更加沉迷于游戏、刷视频，但也有一部分同学利用了这段时间学习新技能、尝试做微商，从而丰富了对自身未来职业发展的想象。

向芯最后总结了当前政策与实践面临的挑战。如何推动提高甚至取消非户籍生学位限额、如何帮助提前被判定为上普高无望的初中学生提前积极主动地探索未来出路，以及如何改善中职教育和改变社会对中职的歧视是当前政策与实践面临的三大挑战。

## “问政暨南”第十二期：关注新冠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20年4月22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程名望教授作客我院“问政暨南”系列第12期讲座活动，并作了题为“新冠疫情的公共危机属性及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的报告。本次讲座以线上会议的模式进行。

程名望教授首先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分析了新冠疫情的公共危机属性，而强力的中国政府处理这类公共事件更加有效。据此，程名望教授认为：良好的合作关系应是网络合作关系，在多元社会背景下的公共治理，更加需要综合专家和公众意见的多元治理。

随后，程名望教授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全球经济的短期冲击与长期影响。他认为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超越SARS，我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保六”非常困难，但疫情造成的冲击属于短期冲击，不影响中国经济崛起的逻辑和趋势。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可能会引起世界格局变动，但不具备世界经济危机的特征，也大概率不会产生经济危机，这只是一次短期冲击。



然后，程名望教授使用经济模型和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逻辑与未来。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为：经济总量大，目前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他进一步将中国事实概括为四点：分母大、相关性强、潜力大和腾挪空间大。纵观中国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程名望教授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总结为两条经验：推进市场化和科学的力量。中国经济模式本质上是依靠投资的推动，这也造成了我国供

给过剩的现状。他将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发现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有四成依靠要素投入，六成依靠效率和创新。因此我国经济增加的源动力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体制的改革。据此，程名望教授预测今后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紧接着，程名望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并结合新冠疫情解读了几个热点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点：经济快速下滑；民间投资快速下滑，企业家信心指数降至“冰点”；国进民退，效率受损。但是，现在中国正在转型期，正由粗放式增长转型为兼顾生活质量、经济增长和生态的高质量增长。考虑这次疫情，程名望教授从货币、汇率、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四个方面进行热点解读。他认为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本币贬值压力犹存但不会大幅贬值；地产市场的黄金期已结束，但增长期犹存；资本市场虽然乐观，但是大牛市条件仍不具备。

最后，程名望教授指出了疫情后可能出现的隐患：包括可能会加剧和美国脱钩，可能会相信举国体制而有阻市场化推进，可能会担心“大城市之劣”而逆城镇化，可能会有民粹主义抬头。为此，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他表示，（1）不宜和美国脱钩；（2）不宜质疑市场化；（3）不宜逆城镇化；（4）不宜民粹主义。

## “问政暨南”第十三期：利用信用风险量化模型预测新冠病毒疫情趋势

2020年4月30日，信风金融科技的创始人兼CEO，MSCI公司亚太区ABS业务高级顾问，财新智库高级顾问陈剑博士受邀作客我院“问政暨南”系列讲座第13期活动，作了题为“利用信用风险量化模型预测新冠病毒疫情趋势”的报告。本次讲座的举办方式为线上讲座。

陈剑博士最近把信用风险的量化模型用于新冠疫情预测，取得很好的结果，已经与医学界同事发表多篇医学论文，并在财经网、MedRxiv等网站发表了系列观点和相关论文。本次讲座，陈剑博士主要介绍了信用风险的量化模型对于新冠疫情预测的准确性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报告伊始，陈剑博士以一例漫画强调了在黑天鹅时代，无知很危险。同时，他以4月18日白宫疫情发布会上质疑中国每10万人口死亡人数过低之事为引，强调了在黑天鹅时代，常识比知识更重要。他对此的解释为：中国疫情集中在湖北武汉，而中国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切断了传染源，使得其他省份的疫情并不严重。因此中国的死亡率并不高。

在介绍预测模型之前，陈剑博士首先强调了疫情预测的重要性，他认为预测主要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此，陈剑博士介绍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模型，例如SIR、SEIR、存活分析法（Survival Analysis）、考克斯风险模型（Cox Hazard Model）和TMM，并重点分析和对比了SIR预测模型和TMM模型，其中TMM模型是量化金融模型，首次被陈剑博士引入流行病学领域，用来预测此次疫情。陈剑博士使用TMM模型对意大利、韩国、伊朗、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预测结果已被事实证明相当准确，而SIR模型的预测范围较宽，误差较大。因此相较SIR模型，TMM模型更加灵活，更加稳定，更加准确。

在这里，陈剑博士着重强调了对美国预测的难度很大，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制度、防控措施和贫富差异所造成的，并指出美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检测不足。其中，他主要介绍了贫富差异与疫情的关系。以纽约州为例，疫情和贫富分化有相当大的相关性，即收入越高死亡率越低，收入越低死亡率越高。而对全球疫情的预测

来说，陈剑博士表示并没有一个较好的预测方法，TMM模型对于相对封闭的环境更加准确。但他表示全球疫情的防治需要各国携手共同解决。

随后，陈剑博士通过趋势对比和简单的线性估计，分析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防治效率。根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除湖北省外地区的防治效率最高，湖北省内由于疫情过于严重，效率有所降低，但都远高于其他国家。韩国改进后的防治效率大大提升。

关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陈剑博士主要介绍了其3月20日在MSCI上发表的文章“*How coronavirus could hurt Chinese consumer*”。在该文中陈剑博士就已预测新冠疫情将严重影响中国消费信贷。而截至3月底的消费贷款数据表明预测准确。具体表现为：首次逾期率飙升后下降，低收入人群受冲击更高、低额贷款风险更高、逾期转化率持续恶化、早偿率下降后明显反弹。

最后，陈剑指出未来研究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疫情冲击是暂时，还是持久的？如果是暂时的，多久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如果是持久的，哪些指标会持续变化，最终稳定？早期逾期的恶化对于最终违约的影响多大？对于不同收入，不同行业，影响有多大？经济、贸易、金融的新常态是什么？他再次强调需要用常识做合理的判断，在外部冲击下，以前的模型可能会失效，需要进一步探索新模型。

## “问政暨南”第十四期：农村土地第三轮承包制度设计的正当性分析

2020年6月10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问政暨南”第14期邀请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赵德余教授，讲座的主题为“农村土地第三轮承包制度设计的正当性分析”。本文的总结中，部分背景介绍与小标题为编辑所整理。



农村土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地区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一种农业生产形式。中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是从1983年前后开始，一直到1997年止，承包期为15年；而部分地区则从1978年就开始，到1993年承包到期。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间是从1998年开始至2027年底止，承包期为30年；个别地区从1993年开始，到2023年承包到期。也就是说，我国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即将在未来十年内到期。

为此，2019年11月底，党中央及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意见提出，现有农村承包地将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由农户继续承包，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背后，牵涉的是农村土地の利用与归属问题，事关农民对土地权利的长期期待。随着人口流动与社会发展，部分承包土地的农户家庭成员进城务工，并早已定居城镇地区，不再务农；而部分农村家庭成员则在90年代第二轮土地承包确权完成后才出生，名下没有土地，无地可耕。对此，哪些人应当获得第三轮农村土地承包权资格？哪些人需要被排除在农村土地承包权资格之外？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三轮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设计的道德逻辑是什么？

理解土地承包权及其分配不仅仅要考虑现实政策决策逻辑，还要回到政治哲学中分析权利的正当性。赵德余教授利用不同情形下土地承包案例，分别比较三种正义立场对政策道德基础解释的逻辑差异。这三种正义论分别为诺齐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以及功利主义。

### “诺齐克式立场”：程序即正义

首先是诺齐克（Robert Nozick）古典自由主义下的正义立场。诺齐克是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其1974年出版的作品《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是当代（保守）自由主义中有关“正义”讨论的集大成者。“诺齐克式立场”可以被简单理解为程序即正义，其正义的演绎分为占有原则、转让原则及补偿原则三步骤。

诺齐克提出一个有关土地及资源占有的正义原则。他认为，只要人们满足洛克式的附带条件（Lockean proviso），也就是最初自然状态占取时没有令其他人的情况变得更坏，这种占有便是公正的。紧接着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有权拥有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这就涉及有关转让的正义原则，简单说，占有的转让是必须建立在双方合意的自愿基础上，这个时候分配才是正义的。从“诺齐克式”的占有原则与转让原则来看，农民的第

二轮承包权利应得到继续承认。但是，在现实中，在第二轮承包后的30年前里，农民家庭新增人口导致人均土地承包绝对份额的下降、以及其他农户家庭由于人口减少（如户口外迁或者人口死亡）引起的人均土地承包份额的相对比例的上升，这些对于个人或他人的土地承包权利造成了侵害或损失。那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违背了以上两正义原则（占有正义及转让正义）。此时，需要进入诺齐克提出的第三正义原则：补偿正义（a 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 of injustice）。例如上海在以赎买机制鼓励农户放弃土地承包权，并提供农户充分保障。

从2019年出台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来看，国家事实上已经取消了下轮承包土地对户籍的前提要求，尊重了农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权的顺延，遵循了占有及其分配的正当性原则。

### “罗尔斯立场”：作为公平的正义

诺齐克认为，正义可以通过回溯到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概念，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在任何国家或公民社会产生之前的状态）中推演而来。其条件看起来简单，却很难满足。而罗尔斯的方法是前向或结果导向的，倾向追求处境最不利者福利最大化，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考。

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是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巨擘。同为哈佛教授，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使罗尔斯名扬天下，其“作为公平的正义观”不但给予功利主义以彻底批判，同时也为自由主义提供新的论证，是迄今为止，当代政治哲学中对公平价值观念所作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罗尔斯强调正义立场在“结果上的正当性”。简单说，其正义观遵循三种原则：自由优先、机会平等以及差异补偿。

在土地承包权问题上最重要的思考是罗尔斯的差异补偿原则（最小者最大化）。即虽然承认机会差异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但应使对于处境最不利的人获得最大化的补偿，这才是社会公义的体现。根据这一立场，第三类土地承包设计上需要保障对于处境最不利的农民（假设为农户b）的利益。例如，提高土地承包大户a对农户b支付的转租土地的租金，以提高处境最不利的农户b的土地租金收入；增加对处境最不利农户b的精准扶贫力度；提高处境最不利农户b参加社会保障的机会和水平；创造和鼓励处境最不利农户b的非农就业机会；

提高农户b承包更多土地的机会，包括保障其下一轮土地承包的优先承包资格等等。

### 功利主义：“作为产出效率的正义”

以边沁（Jeremy Bentham）及密尔（John Stuart Mill）思想为基石的功利主义为经济学所熟悉，简而言之，正当性应符合效率与产出最大化原则。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的分配思考是，土地承包的设计应把土地配置给有能力与极其需要土地的人。

就第三轮承包应该以什么原则来承包而言，功利主义是以实现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或有利于土地自由流转为前置条件。承包权的分配应以谁能创造更高的土地效益为基础。但新的问题是存在两种方案。第一种是根据宪法规定，由集体所有制成员来进行发包以获得土地承包权的第三轮承包资格，即土地应该是按照集体所有制成员的身份来进行配置。第二种是根据新修正案，土地承包权与集体成员的身份无关，只遵循农户的继续与退出意愿。但不管按照何种分配规范，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承包制度的设计方向应围绕降低土地的细碎化、土地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这样方能够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经营规模化，促进农村的劳动分工和产业升级。

### 小结

诺齐克式、罗尔斯式及功利主义三种立场出发的正义原则为第三轮土地承包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考。赵德余教授认为，2019年《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中提到第二轮承包期结束后的土地承包继续顺延30年，给社会及承包户带来的将来带来了稳定性预期，承包权稳定不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选择。

但我们的思考不能就此结束。真正的问题是，在下一个30年后，第四轮的土地承包制度应怎么设计？或者说我们的土地制度政策应按照什么样的方向（立场）发展？是按照基于集体的珠三角地区流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发展，还是基于个体的主流家庭联产承包合作模式发展？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政治哲学思考。

# 数据调查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 第四期：新冠肺炎疫情对线下微型商户短期冲击的定量估算

主讲人：郭峰，上海财经大学



#### 人物名片

郭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课题研究领域涵盖金融学、政治经济学和文献计量学等范畴，目前主要研究兴趣是探索机器学习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他曾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等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在主流媒体发表经济时评 9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 部，参著数部。

在蚂蚁金服的经营大数据基础上，郭峰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估算未发生疫情冲击情况时线下微型商户的交易情况，并与当前数据反映的实况进行对比，由此推算出疫情对于线下微信商户的短期影响和冲击幅度。

除此之外，郭峰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于线下微型商户抵抗疫情冲击有积极作用，实际情况中疫情严重程度、城乡差距、群体不同等因素会导致线下微型商户受疫情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讲座期间，会议间里的师生踊跃提问，以问促思，与主讲人积极进行沟通交流，收获颇丰。

本次讲座主题紧跟时事热点，聚焦民生民情，引导师生从线下微型商户这个群体认识和思考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为与会师生认清中国经济走势，思考后续助力保障民生、推动经济复苏相关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发和参考。

#### >> 回顾

讲座伊始，郭峰简要介绍本次课题研究的目的是和基本背景，解释了线下微型商户的概念和包含范围，并基于课题比较抽样调查数据和经营大数据的可取和不足之处，阐释了数据来源、组成和研究设计。

而后结合相关材料，郭峰说明本次研究是通过对比春节前后营业额增幅、年返程率等因素来看疫情冲击对线下微型商户的影响。



## 第五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主讲人：李炜，中国社会科学院



### 人物名片

李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中心副主任，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首席专家。学术研究领域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变迁研究、社会阶层研究。自2006年以来，李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执行主持人。

### >> 回顾

李炜首先通过阐述调查的学术意义和 CSS 项目的课题目标作引入，然后结合项目抽样框地图等资料讲解样本单位划分、抽样方法设计、问卷主题选取等调查设计要点。

在调查运作管理模块中，李炜详细说明 CSS 项目调查流程，着重通过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演示该系统是如何在样本和访员管理、访问审核和反馈、调查数据可视化分析等调查环节实现数据质量控制。

讲座的后半部分，李炜介绍了 CSS 数据的研究成果，通过《农民工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态度》、《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查》等论文阐释了调查数据的论证作

用，点明了调查数据在真实反映社情民意、助力政府部门科学决策、推进学术观点创新方面的重要价值。

讲座的最后，李炜在谈到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发展方向时，表示未来希望与高校机构“通力合作，以高质量的调查数据，共创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公共资源”。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内容充实丰富，主讲人条理清晰，语言风趣幽默，具体事例的讲解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启发性，让听讲的师生了解到调查项目的开展流程、计算机技术在社会调查领域的持续开发、调查数据的学术价值等内容，收获颇丰。

调查中心团队在讲座结束后，踊跃提问，与李炜研究员就调查抽样设计等问题进行积极交流，并期待未来双方继续保持交流与沟通，分享调查经验和心得。



## 第六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主讲人：王亚峰，北京大学



### 人物名片

王亚峰，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与研究部主任，主持并参与多份基于 CHARLS 数据的政策研究报告编写工作。

### >> 回顾

王亚峰首先阐述了项目发起的背景和调查对象的定义，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老龄化问题研究需要结构化、多维度以及跨学科的数据支

撑”。紧接着，王亚峰详细解说了 CHARLS 项目十二年来的发展历程，并从历次调查应答状况、用户分布和数据使用情况等方面简要介绍 CHARLS 数据库。

而后，讲座内容由浅入深。王亚峰系统地介绍了 CHARLS 项目的抽样方法，并详细说明如何通过电子绘图建立末端抽样框。在样本权重部分，则介绍了权数的计算方式及使用方式。

讲座的后半部分，王亚峰仔细描述了历年数据的结构和特点，重点利用图表直观、细致、全面地为师生解读 CHARLS 数据的分析结果与发现。CHARLS 数据结构涵盖个人、家庭、社区三个层面，通过多个指标对中国老龄化情况进行度量，能够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本期讲座内容由纲及目，在主讲人的带领下，师生对调查设计、问卷内容、老龄化研究等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气氛融洽，收获满满。



## 第七期：Social Survey Research Technology,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主讲人：Gina-Qian Cheu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人物名片

Gina-Qian Cheung, 现任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首席技术官, 主要负责调查执行中的技术运行维护工作。她拥有 30 多年 IT 经验, 参与多个调查项目及调查系统的开发、运用和分析, 拥有非常扎实的调查方法理论基础以及丰富的调查流程电子化实践经验。

### >> 回顾

Gina-Qian Cheung 快速总结过去三十年社会调查所采用的调查模式, 而后遵循时间顺序, 结合自己的调查项目经历, 阐述了 1990 年代以前、1990 年代、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这四个时期中, 调查技术的发展与变迁面临着怎样的执行和技术上挑战。

随着调查技术的发展, 调查模式从最初邮寄调查、电话调查、面对面纸笔调查发展为计算机辅助的邮件调查、CAPI 系统和 CATI 系统, 调查手段从单一模式发展为混合模式。

Gina-Qian Cheung 指出, 混合模式是调查手段的发展趋势, 它适用于各种复杂设计的场景, 混合模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连续式”, 即在一个调查内, 访问先用一个模式, 再切换到另一模式; 二是“同时式”, 即受访者可以选择采用其中任一模式完成调查访问, 也就是说同一个调查, 不同的受访者采用了不同的访问模式。

其优势是可以有效地降低覆盖误差、无应答误差等, 但同时也可能存在因不同模式所产生的测量误差。因此, 如何在调查中合理地设计和使用混合模式, 对于调查数据质量的影响尤为重要。

讲座的后半部分, Gina-Qian Cheung 回归社会调查数据收集中所采用的传统技术, 重点从样本管理、数据管理、调查管理三个角度讲述社会调查设计、项目执行和系统如何设计, 并通过具体的项目作为实例, 阐述混合模式在实际场景中如何运用。

另外, Gina-Qian Cheung 还谈到新技术开始应用到社会调查的方方面面, 如社交媒体传播、大数据采集、智能手机监测应答过程情绪波动等, 这些既带来了调查技术的新变化, 也带来了新挑战。

本期讲座系统而简要地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社会调查模式和技术的变迁, 内容充实丰富, 让师生听众清晰而深入地了解了社会调查技术发展历程和所面临的挑战, 从而对于社会调查和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

### Quick Summary of Survey Modes

- 1990 年代以前
  - 调查执行的纸本问卷调查 Paper Pencil Survey -- interviewer Administrated
- 1990 年代
  -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 (CATI)
  - 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 (CAPI)
- 2000 年代
  - 计算机辅助调查 (CATI and CAPI)
  - 计算机网络调查 (CAWI -- Self administrated)
  - 邮寄问卷调查 (Mail Survey)
  - More...
- 2010 年代
  - 计算机辅助调查 (CATI and CAPI)
  - 计算机网络调查 (CAWI -- Self administrated)
  - 移动互联网调查 (App & Web on smart phone -- Self administrated)
  - 邮寄问卷调查 (Mail Survey)
  - 混合模式调查 (Mixed Mode)
  - More

## 第八期：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做“深”

主讲人：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



### 人物名片

吴晓刚,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和公共政策学部讲席教授, 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CASER) 创始主任, 英文 SSCI 期刊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主编, 国际华人社会学学会 (ICSA) 会长。其研究领域包括社会不平等、分层与流动、社会人口学、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调查与定量研究方法、大数据与社会研究。

### >> 回顾

讲座开放报名后的一周里, 共有 500 多名国内外高校师生报名参加讲座, 关注度超过预期。讲座中, 吴晓刚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出发, 提出了自己对于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批判反思。他认为中国早期社会学是通过现象观察和定性分析来研究社会的, 有一定的局限性, 研究角度更多是关注文化和制度, 停留在学理层次, 且都是进行个案研究, “没有可比性, 难以形成知识积累”。

实际上, 社会科学研究更强调异质性, 需要通过大规模城市调查和定量分析来实现。诚然, 综合性数据库的公开推进了定量研究的发展, 但是全国性调查所得数据因为中国地区差异大而针对性不强。

城市作为人口密集的空间, 因其聚集性、深入性, 更适合观察社会变迁, 且处于地方化的特定情境下, 可以研究更加本土化的问题, 通过多个社区比较分析, 从个案研究转向量化数据, “找到和全国性研究相区别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 吴晓刚认为, 开展城市社区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 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讲座的后半部分, 吴晓刚通过在香港、上海开展的城市调查项目案例和选题分析, 阐述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注重问题的“前瞻性”, 设计的“精致性”和方法的“引领性”, 选题不应只是追逐学术热点, 应明确研究目的, 进行细致的空间划分, 注重密集性关注等。

讲座的最后, 吴晓刚建议, 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深圳、上海、香港这三个典型城市进行横向对比, 将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如移民、家庭等放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 深耕城市微观数据, 理解社会变迁。

### 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很多批评

- 如何做“深”, 如何“接地气”?
  - 问题的“前瞻性”
  - 设计的“精致性”
  - 方法的“引领性”
- 近九十年前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 vs. “社区研究”
- 是否还能以“社区研究”为载体, 推进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本土化?

# 人物专访

IESR人物

## IESR 人物

### 助理教授苏应俊：在现实和理论之间 搭建一座桥梁



#### 人物名片

苏应俊，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于2017年获得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等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近日，我院助理教授苏应俊的合作论文“Ownership and Productivity in Vertically-Integrated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teel Industry”（合作者：Loren Brandt, Feitao Jiang, Yao Luo）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接受发表。

#### 打开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黑匣子

在这篇论文里，苏应俊通过比较不同所有制结构的纵向一体化钢铁企业内部多个生产环节的生产效率差异，探讨了企业所有制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与以往学者的研究不同，苏应俊形容她的研究“打开了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黑匣子”。

在传统的经济学生产函数模型中，生产函数的一端是企业的投入，包括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函数的另一端是企业的产出，即产品的产量或产值，而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则被视为“黑匣子”。

已有的学术文献对企业生产率的分析通常也是从总体上考察企业的投入产出比。然而，企业的生产活动往往涉及多个环节的纵向整合。以钢铁企业为例，钢铁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铁矿石烧结、生铁制造和炼钢等主要环节。上游环节的产出品作为下游环节的主要投入品，环环相扣，联成生产价值链。在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类型的企业技术和生产力均有所差异。仅从企业总体层面对生产率进行估计可能掩盖了企业内部生产层面的重要差异，导致估计偏差。



苏应俊近日于广州

苏应俊的研究则同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结构的钢铁企业在总体层面和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生产率差异。她利用详细到钢铁企业生产的设备级数据，透视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黑匣子”，剖析了纵向一体化的钢铁企业生产价值链中每个主要阶段的投入和产出情况，估计出每个生产阶段的生产率，并将此整合到企业层面，得到企业总体的生产率。

研究发现，在总体上按所有制结构划分的钢铁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但在价值链内部，私营企业在价值链下游的生铁制造和炼钢两个环节的表现均优于国有企业，但在价值链上游的烧结环节却表现滞后。

“在烧结环节，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差不多只有国有企业的一半。”苏应俊解释：“造成烧结环节生产率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第一，私营企业在获取较高质量的原材料上处于劣势。由于原材料进口配给更偏向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所用的铁矿石中国产铁矿石比例较国有企业更高。一般来说国产铁矿石的品味、质量都比进口铁矿石低。低质量铁矿石会对生产过程造成负面影响，需要额外的加工过程才能生产达到标准的烧结矿。第二，私营企业在烧结环节会使用更多的人工，自动化水平相对国企更低，相应地单位劳动生产率也会更低。”

虽然在烧结环节私营企业由于原材料和设备自动化

的劣势导致生产效率落后于国有企业，但到了制造生铁和炼钢的下游环节，由于铁矿石已经经过了加工，这一生产阶段投入的原材料在质量上的差异不大。所以这时候，私营企业组织生产的能力就凸显出来了。

### 深入研究不同企业组织生产的行为特点

“我们这个数据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可以看到企业在每个生产环节上组织生产的方式。比如，当企业准备构建100万吨钢铁产能时，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在每个生产环节都倾向于使用更小型的设备。同样的100万吨钢铁产能，私营企业使用数量更多的小炉子，而国有企业使用数量较少的大炉子。”苏应俊继续介绍道。

钢铁生产具有规模效应，从长期来看，使用大型设备在节省成本上更有优势。在论文模型的估计中，生产函数的识别也验证了钢铁生产的每个环节存在规模效应。但是为什么在组织生产的时候，私营企业会选择更小型的设备呢？苏应俊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她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思考了可能的原因。

从供给侧来看，私营企业使用小型设备与私营企业的整体实力相匹配。虽然在技术层面使用大型设备具有规模效应，但使用大型设备需要企业一系列资源的配套支持。如果建造自动化的大设备，相应地建造周期更

长，在建造过程中需要充足的资金，同时也需要经验丰富、高技能的优秀工程师来操作这些大型设备。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面临着获取高质量的原材料、吸引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和融资等方面的劣势。在这些外在经营条件的限制下，使用小型设备是私营企业的更优决策。

从需求侧来看，私营企业使用小设备更有灵活性，有利于抵抗需求波动的冲击。当钢铁市场不稳定时，比如遇到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冲击时，钢铁价格下跌，因此企业可能需要在短期内关停一些设备降低产能。大型设备停产的成本较高，关停大型设备后，再次重启时，至少要经过两周甚至更长时间的检修。而小型设备在这方面，就灵活多了，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随时关停重启以调整企业产能。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企业的一些取舍。但以上分析目前还仅仅是我的假设。我们现有数据只有3年，看不到企业的长期决策行为。后续我们将用更长期的数据、更详尽的动态产业结构模型，进一步深入研究企业组织生产的内在机制和行为特点，并把研究结论与国家政策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苏应俊说：“我国钢铁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政策大方向是整合产业，进行更多的兼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鼓励使用大型设备，提高规模效应。而我们的研究，则看到了小企业、小型设备的优势，这可能提供一个优化钢铁行业资源配置的新思路。”

### 在数据和理论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一直以来，有关产业组织、企业所有制、企业行为等方面的思考就像碎片一样盘桓在苏应俊的脑中。“父母在国企工作，经常带着我一起上班，我童年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国企的大院里度过的。”从“大锅饭”的规律生活，到竞争上岗，再到竞标等现代市场企业元素的出现，国企改革步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苏应俊，激起了她研究和思考产业组织和企业行为的兴趣。

在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该校并没有产业组织相关的课程。一个偶然的机会，多伦多大学的Loren Brandt教授接触到了苏应俊和她的课题，并邀请她到多伦多大学做交换，学习IO（产业组织）相关的课程。冰天雪地里的六个小时的车程，从匹兹堡到多伦多，苏应俊说自己这个阶段的学习就好像“打游戏时买装备”。

有了关于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系统方法，她脑中的思考碎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也正是这个时候，她遇到并结识了另两位合作者，多伦多大学的罗耀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的江飞涛博士，三个人几乎一拍即合，苏应俊抓住了这个契机，终于把自己的思考碎片穿成了连续的线索。

随着研究的展开，苏应俊遇到了最大的挑战。她所使用的钢铁企业数据最初的数据非常混乱，同时也涉及到很多钢铁制造工业方面的术语。刚接触这个数据时，对如何处理它，苏应俊几乎一头雾水。于是她做了一个详尽的变量目录，细致地学习这个数据每个变量的内涵。“从2015年5月一直到秋季，大概四五个月的时间我都泡在多伦多大学的试验室里整理数据。所以我们的研究前期准备时间特别漫长，这个过程真的挺痛苦的。”

苏应俊认为结合数据的特点和自己的研究兴趣就好像在数据和理论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随着对数据了解的深入和对研究问题的不断反刍、交流，苏应俊看到自己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具体，最初的碎片思考逐渐变成清晰的图景。

苏应俊说：“其实现在的经济学学术研究，不存在缺乏数据的问题，问题是你如何使用数据，你能想到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的问题。”对问题的长期思考和关注才是学术研究隐藏在冰山一角之下的积累和训练过程。



苏应俊毕业旅行时于美国黄石公园

## 产业经济学模型应当符合现实经济规律

产业组织方向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可能产业经济学的中文名限制了人们对它的想象力，以为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有个实际工厂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苏应俊解释说：“但几乎所有涉及到厂商竞争、博弈、拍卖等行为的话题都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不仅包括制造业、餐饮、医疗、教育、房地产等传统行业，还包括游戏业、电影业，线上的电商平台，如美团、淘宝等新兴服务业。”

当前产业组织领域最主要的研究问题之一是企业与产业动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是由 Richard Ericson 和 Ariel Pakes 在 1995 年提出的企业动态结构模型研究框架。这一技术框架的建立和后续发展，促进了产业经济学领域产业动态实证研究的兴起，推动了学者们对各类产业组织的深入研究。

“我认为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门槛比较高。研究者不仅要掌握结构模型方法，还要深耕自己所研究的行业，积累扎实的行业背景知识，比如该行业厂商的技术特征、竞争优势等，以这个行业的特征为根基科学地建立结构模型、估计模型参数。”苏应俊强调道，“模型不是随便建立的，也不是一个模型就能解决所有行业的问题，模型应当符合现实经济运作规律。”

为了使自己构建的结构模型贴近钢铁企业真实运作的情况，苏应俊自学了冶金相关的知识。在没有条件进入钢铁工厂内部生产车间考察时，苏应俊参观了匹兹堡市一个由废弃的钢厂改建的钢铁博物馆，将炼钢流程熟记于心。

在写论文和构建模型时，她也始终保持着与钢铁企业技术人员、工程师的密切联系。“我论文中的模型估计有一个重要假设是价值链上游的产成品，作为价值链下游的投入原材料。但我当时有一个疑问，价值链上游炼出来的产品，有没有可能不会被全部投入到下游生产，而是部分被当作原材料库存起来？”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苏应俊请教了武钢设计院的工程师。原来苏应俊考虑到的上游产成品被当成库存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非常少见，原因是铁炼出来之后是熔融状态的液体，如果要储存，首先要把它冷却成固体状态，下一次用的时候再把它融了，这来来回回的成本太高。所以一般直接把上一环节的产出的一炉铁水，投入到下一环节炼钢的炉子里，这保证钢铁生产技术上的连续性。

## IESR的学术氛围让我充满着做研究的动力

从 2015 年开始准备写作，到 2020 年被接受发表，五年的锤炼终于有了回报。在这五年里，苏应俊也经历了个人身份的转变，2017 年博士毕业后，她入职了 IESR，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入职 IESR 后，在每年春季学期没有授课任务时，仍要回多伦多大学和合作者继续推进这篇研究。她说她特别感谢 IESR 在这方面的支持，不仅提供出国申请程序等方面的便利，而且慷慨地给予资金支持。

“IESR 良好的学术氛围让我充满着做研究的动力。”苏应俊笑着说：“这里有很多优秀的同事，让我时刻面临着同侪压力，同时我也能很方便地和他们探讨问题。这里高频次地举办高质量的学术会议，除了会议时的思想碰撞外，也能给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宝贵的机会。比如在 2019 年 6 月份的计量经济学协会中国年会上，我有幸遇到了产业经济学领域殿堂级人物 Ariel Pakes 教授，他很感兴趣我的研究，并邀请我去哈佛大学交流。我原来打算今年春季学期去哈佛交流的，没想到被疫情打乱了计划。”

受疫情影响，苏应俊仍在居家办公。目前她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两条线，一条线是和作者继续推进对钢铁企业组织行为的研究，另一条线是写作一篇关于生产函数模型识别计量方法方面的论文。



苏应俊与 Ariel Pakes 教授

## 助理教授韩昱洁：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



人物名片

韩昱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等国际著名期刊。

“其实硕士毕业时，完全没有想到要走科研之路的。”回忆当初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韩昱洁笑着说道。如今，她是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 IESR）政策研究轨助理教授，主攻教育经济方向的政策研究。

### 无心插柳

本科一年级时，韩昱洁还是一个医学生。谈起从医学转到经济学的原因，韩昱洁很率直：“学医太辛苦了！就想换个轻松一点的专业。”不过，医学的训练却也锻炼了她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的毅力。转到经济学专业后，她带着这份劲儿，总能在专业课上获得高分，最终成功保送本校研究生。硕士快毕业时，韩昱洁本来计划着工作。那时，她突然获知去香港读博士有丰富的奖学金，就想着申请试试。“最终，很幸运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录取。”

博士第一年仍安排有很多课程，“上课+考试”的模式没有让韩昱洁感到很大的不同。转折点发生在博士第二学年。那时，冯帅章教授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

者，为经济学博士生讲授发展经济学，韩昱洁选修了这门课程。“那门课要求完成课程论文。”她回忆道。选取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第一次摆到韩昱洁的跟前。

当时，她从冯帅章那里拿到一份农业调查问卷。“那份问卷的问题设置非常详细。我第一次非常认真地研究了一份调查问卷。”热爱生活的她，坦言比较关注“吃”的内容：“我注意到问卷中询问了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的问题，我就寻思，有没有什么因素能影响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当时社会上也爆发了一些食品安全事故，我就觉得，农产品的绿色健康也非常重要的。”

顺着这个思路，韩昱洁尝试去找一些相关文献，发现有些学者研究了农业保险与农药使用行为的关系。“我当时就感到很神奇！自己突发奇想的一个小问题，竟然也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严谨分析。我想，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思考经济学问题，而不仅仅是上课、考试然后获得高分。”最后，对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研究也成为她毕业论文重要的一部分。



韩昱洁博士毕业典礼与校长合影

## 智库与政策研究

“智库与政策研究是 IESR 很有特色的方面。因为有了智库工作，我们也更强调站出来发声，而且是基于数据、有理有据地发声，让经济学真正为社会服务，而不仅仅是学术期刊上的阳春白雪。”博士毕业后，韩昱洁来到 IESR，成为一名政策研究助理教授。“我们的研究有大型微观数据做支撑，同事们也都拥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用做学术研究的干劲来解读政策、提出建议，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政策中心与教育相关的政策研究一般都是我在负责。”韩昱洁介绍道，“我妈妈是教育工作者，这或许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对教育经济学的兴趣。以前经常听妈妈讲，如果小孩的爸爸妈妈外出务工，那么这个小孩的学习成绩往往不是很好。但这些个案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有的话，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幸运的是，IESR 正在开展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以下简称“绵竹项目”），搜集有关留守儿童成长的一手资料。“我得以利用这些宝贵的调查数据，对那些想法进行科学分析。”

作为绵竹项目的成员，韩昱洁觉得绵竹项目最大的特色是它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记录。“当时，项目组决定用‘大五人格量表’（即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外倾性、负情绪性）来衡量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然而，这也是一个难点。人格概念很抽象，如何使受访者准确

判断是一个问题。为此，韩昱洁和同事们花了很多心思，比如将外倾性分解成若干具体情境，如询问受访者是否爱交朋友、是否胆子很大等等。



韩昱洁深入绵竹项目一线参与访问

谈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区别，韩昱洁认为，政策研究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子集。“一般而言，政策研究更强调与民生息息相关、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课题，比如目前智库正在做的有劳动、就业、流动人口子女、住房等方面的议题。相比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不太涉及理论，更重实证；多描述现象，少识别因果。”

但是，政策研究关注的内容往往是学术研究灵感的来源。“描述现象往往是学术研究好的开始。即使是简单的数据描述，有时也能揭示一些平时无法察觉到的现象！”如在绵竹项目中，针对同一个学生，访员会询问老师、父母的评价，同时也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我

查看了不同主体对同一个学生是否有不同的评价。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老师评价女生的情绪比较稳定，但是女生的自我评价倾向于认为自己情绪不稳定。这是否意味着，女生不善于表现自己，并导致老师对她们的关怀不够？这有待我们进一步去验证。”

目前，由韩昱洁参与撰写的绵竹项目调查报告已经提交给绵竹地方政府。“我也希望能好好利用这份来之不易的数据，严谨识别出更多因果效应，最终对政策制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 探索流动儿童教育劣势的成因

除了关注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教育状态，韩昱洁也关心城市流动儿童的长期发展。韩昱洁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与冯帅章、陈媛媛合作），就关注了就读公立或民工子弟小学对流动儿童长期教育成就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使用了在上海 11 所公办小学和 9 所民工子弟小学进行的调查。”这项调查始于 2010 年，该年调查了抽样学校所有四年级的学生。2017 年已经是调查的第四次追访。“经过较长时间的追踪，我们得以记录这些流动儿童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的教育轨迹，非常难得。”

然而，研究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形成初步结果后，我们就在学院的研讨会上与同事们分享。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就读于公办小学的流动儿童，就读于民工子弟小学的流动儿童升学高中的概率会更低。但是同事们想让我进一步厘清，为什么民工子弟小学会造成升学结果的不同？是教育质量，社会制度，还是其他因素？我需要进一步打开民工子弟小学这个‘黑匣子’……”

为了分析潜在的机制，韩昱洁进一步把高中阶段教育细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最终发现就读民工子弟小学仅对就读职业高中的概率有影响。“我们发现，读民工子弟小学的流动儿童更容易回到老家；而呆在上海的流动儿童，因为有上海市的政策支持，更容易进入职业高中就读。”这个发现令她印象深刻，“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还是有很大不同。如果把他们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忽视很多细节，也就无法对机制进行准确分析了。”

研究结果也让她感慨，“这对上民工子弟小学的孩子来说可能非常不公平。即使他们具有与在公立小学上学的孩子一样的能力，他们可选的发展路径却更窄。这需要引起我们社会的重视。”

## 在研究的路上

“还记得刚开始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时，犯了很多愚蠢的小错误。最糟糕的情况是完全做错了，结果一周的工作就白费了。常常跟导师汇报后，要去天台哭一次……不过，后来经历的次数多了，自己的心脏也渐渐变得强大。”

谈及学术路上的导师，韩昱洁至今记得在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时，冯帅章老师跟她说过的一番话。“当时冯老师跟我说，‘要习惯孤独地思考、孤独地做研究。’这几年下来，我也感触很深。研究固然要与同行进行讨论，但那要建立在对自己深刻思考后的基础上。不然，自己问题没想明白，跟大家讨论得很激烈，也很难得出实质性内容。”



韩昱洁在我院主办的第三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上分享自己的研究发现

如今，韩昱洁很享受 IESR 提供的工作环境。“IESR 的制度很好，给了老师们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在 IESR 能够与学术大牛的接触，也是一个很大的加分点。“学院会组织国际会议，平时也邀请很多学者来参加研讨会，都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学术大牛，不断提升自己！”参加绵竹项目后，跟项目学术顾问、芝加哥大学 Heckman 教授的接触也让韩昱洁受益匪浅。“我有时要跟 Heckman 教授报告项目进展。让我感触很深的是，他往往总是能关注到非常细致的问题，从小处着手，并没有泛泛而谈。”更让韩昱洁深受感动的，是 Heckman 教授对学术的热情。“他往往一下飞机就投入工作，而且连续好几天都热情不减。你能感受到这股干劲不仅仅来自于完成工作的责任心，更来自于他发自内心的好奇。他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干劲，令我非常钦佩！”

# 学生天地

学子风采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 学子风采

### “对于经济研究，我抱以满腔的热情”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offer 获得者鄢瑜



鄢瑜在暨南大学第八届5A学术之星计划评审答辩现场

#### 人物名片

鄢瑜，2017年转专业进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专业，为该专业首届毕业生。2020年2月，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博士项目录取资格。大学四年来，她曾获得“王老吉”奖学金、芝加哥-暨南联合计划最佳论文比赛一等奖，荣获“暨南大学学术之星”、“暨南大学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曾参与多个科研项目，入选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攀登计划”专项资金）重点项目负责人，在第十六届“挑战杯”竞赛中荣获全国二等奖。

2016年11月，刚进入大学不久的鄢瑜了解到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新开设的本科专业——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并被创新班全英文教授授课、近似北美大学的培养方式所深深吸引。虽然要牺牲周末的休息时间，并在不同校区之间乘车往返接受IESR的预培养课程，但她依然乐在其中。当时，院长冯帅章教授在预培养课程上真诚、幽默的教学理念分享让鄢瑜印象深刻，“创新班本来就是一种尝试，因此任何创新都是有风险的，绝非一条坦途。如果按部就班地走一条坦途，奋斗就失去了意义。”

如今，勇于选择转专业，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更多可能的鄢瑜在创新班收获了什么？她对创新班的培养模式体验如何？又为什么选择学术这条道路继续研读？听鄢瑜讲述她与创新班及学术的故事。

### “对于经济研究，我抱以满腔的热情”

对于四年大学生涯，鄢瑜坦言，获得“挑战杯”国赛二等奖以及拿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博士项目录取资格是让她最有成就感的事。

鄢瑜与两位同班同学组成的“挑战杯”竞赛团队以《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为课题展开了相关的研究。这一课题缘起于她读过的一本书——《未来简史》。在书中，作者认为在未来机器人有很大可能性会大量替代人类，由此被替代的人类就成为了无用阶级。而精英阶级则会与机器人一同制定世界运行的规则。虽然对这本书的结论将信将疑，但出于对机器人替代效应的担心与关注，鄢瑜决定着手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后来阅读文献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她发现由于缺乏微观数据的支撑，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难以更加直接地去衡量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也激励着她对该研究课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在该项研究中，她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企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其员工数量的影响，并探讨了不同行业、企业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度的异质效应。在寻找影响机制时，她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展开实地调查以及结合回归结果和调查结果来寻找答案。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的背景下，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整体上增加了企业的就业需求。然而在危险性较大的行业，机器人对劳动者具有积极的替代作用。就产业而言，机器人对制造业的就业没有明显影响，但对服务业的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这长达两年的研究过程中，鄢瑜始终抱着满腔热情，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她的科研能力和心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为把研究项目做得更加完善，她积极参加学院举办的各项学术活动。例如，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Robert Moffitt 教授及芝加哥大学 Steven Durlauf 教授来访学院期间，她把握每次与专家学者交流探讨的机会，主动向这些顶级学术大师展示她的研究项目，并结合他们给予的反馈意见对研究项目进行进一步的改进。鄢瑜表示：“学院的学术氛围十分浓厚，有

很多国内外学术大牛都前来进行过交流访问。我和同学们经常笑称在学院‘又见到了教科书中出现的人’。与教授们的交流中，我得到了很有建设性的反馈，更大的收获是这些交流帮助我形成自己的一些研究理念和正确的研究观。”



鄢瑜与团队伙伴龙绪坤在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决赛现场

她和队友的辛勤付出终取得回报，该项目先后荣获芝加哥-暨南联合计划最佳论文比赛一等奖、第十六届“挑战杯”竞赛全国二等奖的佳绩。也正是这次充满挑战又具成就感的科研经历，让鄢瑜不仅打下了良好的科研基础，也尝到了做科研的“甜头”，给了她更加强烈的动力投身经济学研究，从而坚定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



Steven Durlauf教授为鄢瑜颁发芝加哥-暨南联合计划最佳论文比赛一等奖获奖证书

### 研学并重 多向发展

尽管做科研非常忙碌，鄢瑜也没有疏忽对专业课的学习，她认为做学术研究离不开扎实的专业基础，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在做科研时得心应手。除了在课上认真听讲以及课后自主学习外，她还利用课余时间与同学交流讨论问题，并利用 IESR 课程中大量 office hour 的机会积极向老师提出疑问，交流探讨。

除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本科学业外，她还选修了相关的研究生、博士生课程。鄢瑜解释道，在做“挑战杯”科研项目期间，通过专家学者的反馈以及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探索，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工具应用方面的不足。为了弥补自己在技术上的“缺陷”，提高发展理论模型的能力以及计量经济学工具的运用能力，她在大三、大四期间分别选修了博士级数学课程以及硕士级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进顺利完成课业任务。她坦言道，“课程比我想象的还要难很多，但静下心来去学，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很有意思。”

同时，她也十分注重自身科研经验的学习和积累。除了阅读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期刊杂志、公众号以及参加科研竞赛外，还有过多次跟随学院老师做助研的经历。她表示，不同的科研项目可以积累不一样的想法、积攒不一样的经验，是一个十分有趣且有意义的过程。再者，相比于硕士项目，博士项目更看重的是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因此，积累科研经历对于申请博士项目的同学而言是一件很关键的事。

除此之外，她的兴趣爱好也十分广泛。她热爱运动，喜欢看电影和脱口秀，偶尔也会创作一点段子娱乐自我。另外，她也是一位传统文化爱好者，除了把琵琶当作兴趣爱好，偶尔也会读一首诗、背一首词。“我很喜欢苏轼这位诗人！虽然苏轼是豪放派词人，但阅读他的婉约诗词，更让我产生内心情感上的共鸣。”

### 一次大胆的选择 给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

回到最初的起点，鄢瑜与经济学结下的缘分始于2016年11月，IESR 经济学（本科创新班）开始预培养课程。这是鄢瑜大学四年里的重要转折点。两个学期的全英文课程体验，近似北美大学的教学方式让她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领域，对它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向往。2017年，在父母的支持及自己的不懈努力下，她通过了 IESR 的考核，并最终大胆选择转专业，开启了她的经济学之旅。

面对一个全新未知的领域，她没有退缩，而是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努力把这件事做到最好。创新班的课程教学采用的是和国外一流高校经济学项目相似的教学方案和全英文授课，她表示，一开始，她学得很“吃力”，但在后来通过不断地摸索便找到了学习它的“门道”。“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对语言能力的积累有很大的帮助。全英教学的模式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让我在听、说、读、写等各方面的语言能力都有了显著进步，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提升让我在后来申博过程中的语言考试里占据很大的优势。”

除了在教学上的创新外，IESR 浓厚的学术氛围也给鄢瑜在学术研究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因为 IESR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在硕士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在一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招生交流会上，鄢瑜了解到何德勋教授对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效应的研究，对该领域有着浓厚兴趣的她便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了更深的向往。

她认为，这短短的四年，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做了多少个研究，而是各种美好的体验，有珍贵的师生情谊和友情，有对科研方式及科研理念的思考，还有对自己思维方式的不断重塑。“我的导师张思思老师在我大学期间的各个阶段总是事无巨细地给我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和鼓励，在做科研上她更是给予了我很大的信心，激励我不断地前行。除此之外，朱宏佳老师、张毅老师等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给我提供了很多申博的意见和指导。我觉得能够遇到这些老师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 “希望能在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有一定的贡献”

由于本科专业是经济学，而鄢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的是金融领域，虽然拿到了心仪学校的 offer，但她并没有松懈下来，充分利用入学前的这段空闲时间对金融方面的知识进行相对系统地补充，同时加深对新加坡国立大学老师们研究方向的了解，为选择导师做充分的准备。

“我希望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以改善人们生活为终极职业目标，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好好做科研。也希望自己能够像老师们帮助我那样去帮助那些对学术感兴趣的人！”殷切愿望的背后，不仅饱含鄢瑜对学术的炙热情感，亦是她对学术精神传承的坚持。

## 不负韶华，做最务实的践行者

### ——访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offer 获得者韩亚婕



韩亚婕接受暨南大学第七届“学习之星”颁奖

#### 人物名片

韩亚婕，2017年转专业进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为该专业首届毕业生。现已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录取资格。本科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荣获“学习之星”、“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参与多项科研项目及校内外竞赛，获得“挑战杯”广东省决赛三等奖、广东省“攀登计划”立项、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广东省三等奖、毕马威企业文化案例分析大赛暨南大学赛区第二名、港澳台侨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

初入校园的她，带着理想而来。光阴四载，她脚踏实地，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如今，厚积而薄发，她将继续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着更远的远方出发！

#### 不负韶华，做最务实的践行者

“踏实认真”“刻苦上进”“成绩优异，处事负责有担当”是大家给韩亚婕所贴的“标签”。大学时光里，韩亚婕始终抱着“在哪就该干什么事”的信念，勤奋务实、不负韶华，向着自己的梦想扬帆启航。

初入大学，韩亚婕发现所就读的专业并非她的爱好所在，一次偶然的让她了解到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在创新班预培养课程中她体验到了经济学的乐趣，并有了转专业的想法。她坦言，在做出选择前她其实也曾犹豫过，但与学院副院长谷一桢教授进行了一番沟通和交流后，“谷老师诚恳实在的分析就像是一颗‘定心丸’，扫去了我内心的担忧。”

面对均是转专业而来的优秀同辈以及难度较大的课程，韩亚婕表示，这种环境无形中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但考虑到自身想要继续深造的打算，韩亚婕迅速调整状态，化压力为动力，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图书馆，积极与老师和助教沟通，认真学好每一门课程。这一学习习惯一坚持就是四年。她还打趣道，在学习经济学相关课程时，她甚至还有过一段很“疯狂”的学习经历。大二时的她，为了能够参透每门课程的所有知识点，除了熟读学院的教学教材以外，还研读了多个版本的参考书。在她的辛勤努力下，大学四年来，她每学期的绩点均达到了4.2以上，保持着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并且在这期间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学习之星”等奖项与称号。

为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她还选修了多门研究生水平的课程，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其中便包括耶鲁大学博士、学院助理教授马祥老师那门“出了名”难学的高级经济数学。她表示，这些课程不仅让她学习了严谨的数学推导过程，也从中掌握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为未来做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韩亚婕来说，日复一日的早起晚归，精益求精的打磨，以及一往无前的坚守，都在这四年的时光里成了一种习惯。



韩亚婕在学校第七届“5A卓越引领计划”优秀学子奖励计划答辩会现场

#### 专注科研，步履不停

虽然有继续深造的打算，但起初韩亚婕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并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和定位，是澳洲国立大学博士、学院助理教授薛森老师在课堂上分享自己做学术的初衷触动了她。薛森老师说：“希望能为社会做点贡献。”她坦言，薛森老师的话，让当时迷茫的她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萌生了扎根经济研究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想法。具体谈及韩亚婕的科研经历，还得提到她的学术路上的领路人——她的导师朱宏佳。她表示，朱老师对她的影响颇深，正是在他的一步步的引导下，她感受到了做学术的乐趣和意义。

大二时，韩亚婕关注到近年来在城市雾霾等环境污染下，国内相继出台了一些短期空气污染抑制政策和措施，并在当期取得了如“APEC蓝”般显著的成果。然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些政策后续影响的研究仍相对缺乏，而国外对具体环保政策的研究又不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相关政策的评价。因此，针对中国短期空气污染抑制政策对空气污染的后续影响展开深入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对环境经济学有着浓厚兴趣的韩亚婕本着为社会做点贡献的初心，对短期空气污染抑制政策的效果评估与机制探索课题展开了相关的学术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她通过结合中国污染监测站点的时频空气污染数据和美国海洋局的天气状况数据，用双重差分法具体研究了APEC会议污染控制政策前后的空气污染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管控期间空气质量提升了17.6%，但在管控实施前和管控结束后，污染状况在短期内比平时分别恶化了23.2%和25.4%。文章验证了短期环境管制政策时期的动态影响，肯定了政策管控在短期内对空气质量显著的改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政策后期污染集聚性爆发的不良影响。在此基础上，她也给政策制定者在政策施行时间和具体措施方面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该项研究在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省决赛中取得三等奖的成绩，并获得广东省“攀登计划”项目立项。“完成科研论文的那一刻，我感觉做学术也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这是韩亚婕在完成人生当中第一个学术研究项目后的最大体验。

在完成“挑战杯”项目研究的过程中，她遇到过不少的难题，但在导师的帮助下问题都能一一解决。韩亚婕表示，令她印象深刻的是由于很多课程都还未接触过，缺乏一定的知识储备，因此一开始在“挑战杯”论文写作、数据分析、绘图等方面她都完成得比较“吃力”。对于

刚入门的她，朱老师总是耐心引导，带领她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技术上给予最大的帮助与支持。韩亚婕坦言，朱老师不仅是学业上传道解惑的好老师，更是一位可亲的好朋友。除了在学习科研上善于请教师外，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挫折时，韩亚婕也会第一时间向导师寻求帮助。“在与朱老师相处的大学时光里，我不仅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更从他的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学术和教学的认真态度。”正是在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韩亚婕一步一步走上了属于她的经济学研究道路。

目前，韩亚婕正在研究一个关于公司在政府监督下是否存在作弊行为的项目。她表示，在这个项目中，她将在一个准自然实验的环境中应用一个关于工业企业详细排放信息的巨大数据集，以审视不法企业对法规的反应。“我想学习更多关于不同领域的知识，而不仅仅局限于环境经济学”，韩亚婕表示，虽然大学期间所参与的研究大部分是关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但她对教育不平等领域同样也感兴趣。

### 全面发展，做更好的自己

韩亚婕是个“坐不住”的学生，除了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以及参与多个科研项目外，她还积极参加学院举办的学术讲座、暑期课程训练营等不同类型的课外活动，让自己的大学生活变得充实、精彩。

她表示，在这些课外活动中，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作为学生代表参加 IESR 举办的“与诺奖大师 James Heckman 面对面交流”活动。作为六个幸运儿之一，韩亚婕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ames Heckman 教授交流讨论了机器学习与传统计量经济学的关系，学习和了解诺奖大师的治学之道。她表示，在那场让人激动且极具启发意义的交谈中，Heckman 教授向她讲述的三个盲目解释因果关系的例子令她认识到了机器学习的局限，同时也了解到计量经济学在处理非参数问题上不可替代的作用。“整场交流下来，他的循循教导给予了我很多学术研究上的灵感！”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 Sumit Agarwal 教授来访学院期间，韩亚婕也抓住机会积极与 Agarwal 教授进行互动。在与教授的交流中，她被教授在学术研究中极致的严谨态度所触动，激励着她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及

以更严谨的态度投入到后期的学术研究中。“与这些经济学领域的大咖交流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也让我在不断地学习交流中塑造了正确的学术研究观。”

同时，她也注重个人综合实力的提升。她在顺利转入 IESR 时就积极联系了老师，表达了想竞选班长的想法。担任 2016 级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班长期间，她尽心尽责，兼顾好学习的同时认真、高效地完成班级工作，带领班级获得了先进班集体的荣誉称号。她的负责与担当也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并获得了“优秀班长”的荣誉称号。

前期在学业和科研上的沉淀，也终于换来了回报。2019 年，正值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第一届暑期夏令营，得知消息后的韩亚婕便立即报名参加夏令营项目。在此期间她也紧张准备相关博士申请材料，包括个人陈述、简历、语言考试等。参营期间，韩亚婕各方面优异的表现，为她后期申请香港中文大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关于申请经历，她打趣道，由于报名的时间比较晚，准备得很仓促，差点因为没有及时拿到语言成绩，而成为“失学儿童”。

在访谈的最后，她表示，转专业又快要开始了，对于仍在梦想的分岔路口徘徊的同学而言，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诚然，转专业的选择并不容易做出，但在大胆跨出第一步后，便会发现它为选择做出准备的自己所带来的改变。而对于已经顺利转专业的同学而言，一开始每位同学的学习进度不尽相同，调整心态，带着长远的目光脚踏实地地往前走，厚积而薄发，定会发现当初的选择不仅改变了专业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求学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好的自己。

## 多去尝试才能找到心之所爱

### ——访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offer 获得者黄稚雯



黄稚雯在哥伦比亚大学

#### 人物名片

黄稚雯，2017 年转专业进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为该专业首届毕业生。现已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五所世界名校硕士录取通知书。本科在校期间，曾获得暨南大学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曾参与校内外多项学术竞赛，获得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暨南大学第八届黎贝卡挑战杯一等奖。

从大一参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的预课程培养，并大胆选择转专业，到参加各类学术竞赛，再到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交流项目，以及陆续地做了新闻采写、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实习，黄稚雯把这四年过得丰富而充实，在不断地尝试中沉淀自我，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燃点”。

#### 勤勉好学 孜孜不倦

黄稚雯，这个外表安静、嗓音清雅的姑娘谈起过往就像风一样平和，然而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坚韧劲儿，做事高效的她将大学时光嵌入一套规划之中，对每个阶段进行拆分，踏踏实实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当时是在学校的官微上看到 IESR 的招生信息，‘参照北美一流大学培养模式’这个点让我眼前一亮。当然，光看这一句话是不够的，真正打动我的，是 IESR 老师的身体力行”，黄稚雯坦言道。由于原录取专业并不是黄稚雯的兴趣所在，因此很早就有转专业想法的她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了 IESR 的预培养课程学习。“每门课程的深度已经达到了我心中的北美名校本科生课程的水平，且教学方式和北美大学教学模式相差无几。这就是我向往的大学课堂！”这是黄稚雯在体验了为期一年的预培养课程后的最大的感受。

顺利转入 IESR 后，黄稚雯便在适应期内遇到了瓶颈。黄稚雯坦言，面对具有一定深度且繁重的专业课程，她感觉到比较吃力。即使如此，但黄稚雯从未有放弃的念头。为了克服这个“拦路虎”，她“奏响”学习“三部曲”——课前预习、课上听讲、课后复习。除此之外，黄稚雯还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在授课老师以及助教每周的 office hour 中常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对于我在学习中遇到的一些疑惑或者不解的地方，授课老师和助教都会非常耐心地指导。平时，他们也会利用 office hour 为我们讲解作业的错题，或者补充一些与课程相关的练习。这些对我掌握每门课程的知识要点都有很大的帮助！”她前期在学习上的大量投入，换来了学业上的肯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暨南大学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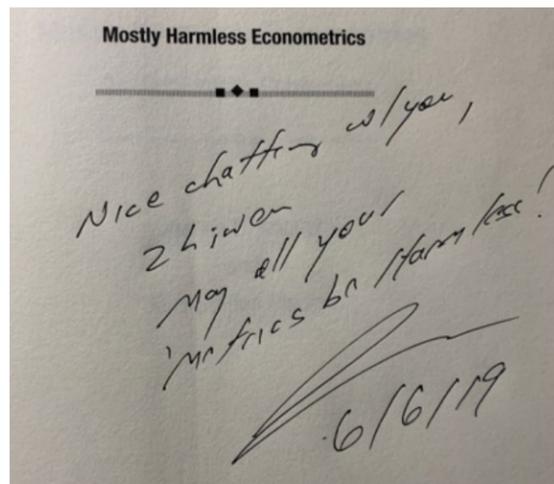
黄稚雯还是一位对知识追求始终不满足的学生。刚上大三的黄稚雯，萌生了当交换生去国外交流学习想法，并在导师谢斌老师与学院谷一桢老师的帮助与指导下，于 2019 年春天前往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交流生项目。“得益于 IESR 的国际化培养模式，初到哥伦比亚大学交流学习时，我在课程适应上并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很快就适应了他们的教学模式。”在回顾当交流生的经历时，她表示，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这段经历，那就是“充实”。她不仅接触到一些新领域的课程，还积极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研究助理，参与中国教育与创业的相关研究。“通过课程的学习以及项目的研究，我有机会从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经济问题。”

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黄稚雯总是卯足了劲，不断向前，为自己的“知识蓄水池”源源不断地注入活水。

### “多去尝试才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在同学和老师眼中，黄稚雯是一位“爱折腾”的学生。大学四年期间，总是能在不同的场合中看到她的身影。对于她大胆尝试各种新事物的行为，黄稚雯坦言，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源自她的导师谢斌老师。“谢斌老师总是鼓励我们去尝试不同的事物，让我们从中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黄稚雯表示，在导师的谆谆诱导下，通过参与不同类型的课外活动以及在不同领域实习，她渐渐开始对自身的职业规划有了比较清晰的定位。

从大二的暑假开始，抱着可以近距离接触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的“私心”，黄稚雯在 IESR 开启了她的助理记者体验之旅。在这期间，黄稚雯曾采访过麻省理工大学 Joshua Angrist 教授等多位来自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大牌教授，“他们不仅在自身的领域颇有建树，还非常的博学多识，对事物永远保持着一颗求知心、好奇心。”黄稚雯表示，她很享受与这些优秀的专家学者交流的过程，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对她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启发。



Joshua Angrist教授给黄稚雯的赠语

“尝试自己感兴趣的不同类型的工作不仅积累更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学生记者的经历让黄稚雯获得了暨南大学共青团系统优秀宣传工作者这一荣誉称号，更让她对实习这件事“上了瘾”，她开始不断深挖自己的兴趣，并在不同行业实习。2019 年的夏天，黄稚雯获得在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实习的机会。虽然对公募基金行业颇感兴趣，但对于缺乏行业经验的黄稚雯来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学起。在上司的帮助和引领下，黄稚雯渐渐摸索到其中



黄稚雯对村民进行访问

的“门道”，并在完成数据整理、分析行业报告等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自己对数据分析的兴趣所在，并坚定了未来从事政策分析师或是项目数据分析师的想法。

在实习方面有着丰富经历的黄稚雯，总是谦逊地把这功劳归功于她的导师以及“运气好”。她表示，在她不断摸索成长的道路上，谢斌老师对于她的选择，总是给予最大的支持。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难，谢斌老师也总是耐心地与黄稚雯分析，向她分享自己的经验，提供实习指导等。“作为过来人的老师们，他们的经验对于我们这些学生而言真的太宝贵了！”

### “用所学知识回报社会！”

早在确定职业方向之前，黄稚雯就已经为自己未来的工作树立了初心。

“做学术研究时，我们难免会在数据处理、回归分析等环节中遇到各种难题，甚至还有可能遇到结果不理想的时候，但我认为这样一种充满挑战的体验正是学院希望我们能够经历并从中得到磨练、有所收获的过程。”自大二起，黄稚雯先后参与了关于社区层面的经济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机制、中国教育与创业之间的关系等多项研究。

在参与的多项科研项目中，黄稚雯表示，参加学院调查中心组织开展的千村调查的预调查是她大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科研体验。黄稚雯回忆道，在跟随调查中心的老师前往广州市花都区的一个村做预调查的过程中，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她被调查村庄简陋得生活条件以及不理想的教育情况而深感震惊与担忧。“之前我对贫困农村的教育情况并不了解，通过那次实地调查，我感到震惊之余，更希望在未来能够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正是那次实地调查的经历，在黄稚雯心中种下了“用所学知识回报社会”的种子。

如今，再谈及未来的职业发展时，黄稚雯仍满目坚定地說道：“我希望毕业后能够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能够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政策分析师，并通过自身的学识回报社会！”

在访谈的最后，黄稚雯表示，注重个性化培养的 IESR 为每一位学子提供更多的成长路径，让大家能够尽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诚然，每一位同学的成长路径都不尽相同。无论是坚定不移走学术道路，还是立志踏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对于学生的选择，老师们总是给予最大的支持，提供非常全面的观点和建议。这是 IESR 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 IESR 让我坚定不移地走上学术研究道路

### ——访北大光华博士 offer 获得者王慷楷



王慷楷进行硕士开题汇报

#### 人物名片

王慷楷，本科毕业于湘潭大学，于2017年9月推荐免试进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攻读劳动经济学硕士学位，目前已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项目录取。本科期间发表的合作论文《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产业政策与资源配置效率》被《经济评论》期刊评选为“2017年度优秀论文”；硕士阶段获国家奖学金、暨南大学推免生奖学金、暨南大学学业奖学金等奖项。2015年至今多次参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北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暨南大学等单位组织的实地调研活动。

“谦逊努力”“品学兼优”“善于思考”，这是大家提起 IESR2017 级硕士生王慷楷经常用到的词。回顾学业生涯，他参与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荣誉和奖项，而这都源自他的勤奋好学、辛勤付出。接下来，让我们走近王慷楷，聆听他的分享，感悟他的成长故事。

#### “IESR让我坚定不移地走上学术研究道路”

作为首届 IESR 全国优秀大学生经济学夏令营营员的王慷楷，在回顾当时的经历时，感触颇深。虽然只有短短 5 天时间，但他深刻地感受到了 IESR 独特的学术魅力。本科阶段的他早已有了继续深造的想法，考虑到自身未来的发展规划，王慷楷在选择学校时考虑得比较

周全，“因为我想继续做研究，尤其是做好的研究，而 IESR 浓厚的学术氛围以及一流的师资队伍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这正是最吸引我的点。”

王慷楷感慨到，夏令营所体验到的只是 IESR 的冰山一角。真正进入 IESR 后，高频率、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和大量的科研机会才让他真正了解并全方位体验到 IESR 的学术环境。硕士阶段，王慷楷重视理论知识学习及科研能力培养，不仅完成硕士阶段的主要课程，还常去旁听其他感兴趣的课程。并且他多次担任 IESR 组织的各类大中型学术会议的志愿者，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大咖”有更好的参会体验。“在与这些顶尖的经济学家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真正看到这个领域的前沿在哪里。”另外，王慷楷表示，在担任 2019 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主讲嘉宾学生助理期间，他从耶鲁大学 Samuel Kortum 教授身上得到了不少关于学术研究精神层面的启发。“Kortum 教授的研究水平非常高，在与他的交谈及相处中我不仅能清楚地体会到他对细节要求的严苛、极高的学术研究品味，同时我也能深刻地感受到他对学术坚守的纯粹真心。”

此外，向来对自己高要求的王慷楷还严格执行自身制定的“每年至少参加一次调研活动”的目标。早在本科期间，王慷楷便对资源错配问题产生较大的研究兴趣，但关于劳动力配置效率方面的研究还得从 2016 年王慷楷参与由 IESR 调查中心组织的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 (RUMIC) 说起。“每一份调查问卷就是一个故事”，在与流动人口的一次次交流中，王慷楷不仅对流动人口现状有了更全面的感知和认识，同时也激发了他对户口制度对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等劳动力配置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想法，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首先王慷楷利用 2008-2011 年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面板数据，探讨了户口变化对工资和消费等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控制个人（家庭）固定效应后，户口变化对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消费方面，特别是住房、教育、医疗等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直接相关的一些消费。这是因为拥有当地户口的家庭在消费这类商品和服务时可以享受优惠补贴，相反流动人口则需为其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外地人口和本地人口为公共商品和服务所支付的价格差异可以视为对户口摩擦的一种良好的度量方式。然而商品名义价格并不能从现有数据中直接获取，因此王慷楷利用持久收入假说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结构模型并通过控制函数、工具变量等方法对其进行估计。下一步他将尝试从空间一般均衡的角度探究户口摩擦对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在过去三年中，通过学院数据共享平台，我得到了很多调查中心提供的数据支持，这让我能够顺利地进行学术研究。”王慷楷坦言，正是在 IESR 浓厚的学术氛围熏陶下，他对学术研究的喜爱逐渐加深，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上这条漫漫学术之路。

#### “在学生培养方面老师太有办法了”

在整个聊天过程中，笔者感受最深的就是王慷楷对于导师马祥老师的尊重和感激之情。谈及三年的学习生活，王慷楷不禁感慨道，马祥老师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他表示，马祥老师不仅对学术有着极高的热情和追求，还善于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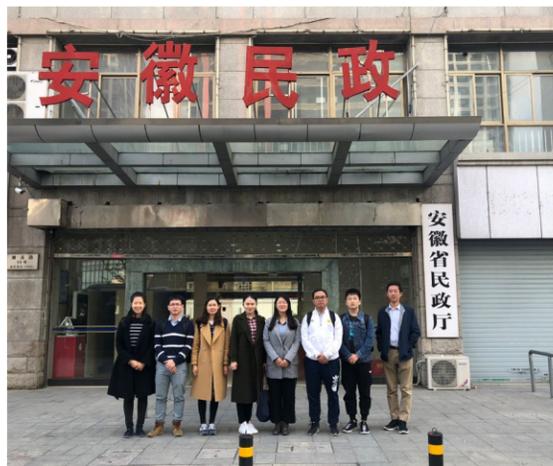
回忆起在夏令营时与马老师的初次见面，在与马老师交流论文的过程中，王慷楷就被他的个人魅力以及敏捷的思维所感染。在三年的相处时光中，王慷楷认为，马老师是一位十分睿智的老师。睿智之处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更体现在学生培养方面。王慷楷表示，为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在每次的文献讨论中，马老师总会鼓励学生学会批判性地借鉴和参考文献。另外，马老师还常常鼓励他在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多提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同时要善于对他人提出的关键性问题展开思考，并回过头来对自身的知识体系进行查漏补缺与逐步完善。王慷楷打趣道，马老师还是自己的好书友，“马老师总是会针对我感兴趣的学术领域给我推荐相关书籍和论文，有时候还会毫不吝啬地将自己家中收藏的经典书籍借予我阅读。在与马祥老师相处的过程中，在潜移默化中我的学术研究能力、思维方式以及知识体系构建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



王慷楷在夏令营联欢晚会上进行葫芦丝演奏

在王慷楷看来，面对学术研究时，马祥老师则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严厉的师者。即使是初次接触结构模型等学术内容，马祥老师仍然以高标准严格要求王慷楷。王慷楷打趣道，对于学术研究，马祥老师“眼里容不得沙子”，他会毫不留情地对错误进行“批评”指正。“得益于这样一种带有双引号的批评和对学术的高要求，无论是进行学术研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时刻保持着严谨的处事态度。”

“我想要感谢太多太多老师了！”在访谈中，王慷楷还深切地向笔者传达他对 IESR 每一位老师的感激之情。王慷楷表示，无论是学术上遇到难题还是生活中较为迷茫时，他的副导师薛森老师和严子中老师也总是无私地向他提供技术支持并给予极大的鼓励。



王慷楷（右二）跟随 IESR 老师赴安徽进行民政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

### 面对难题 学会“问一问”与“放一放”

正如他的导师一样，在学术研究上王慷楷总是有耗不尽的激情与动力，“走火入魔”般通宵达旦地做学术却仍精神充沛是常有的事。虽然在读研一之前就有读博的念头，但在漫漫学术路上，王慷楷也曾有过一段情绪较为低落的时期，产生自我怀疑。王慷楷在与马祥老师倾述自己的问题后，作为过来人的马祥老师耐心且有条理地与他分析问题、解开疑虑，开导他并帮助他重拾信心。“身边的老师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博士，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因此当我们遇到困难时，都会向学院的老师们‘取经’，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性进行借鉴。”

除此之外，王慷楷还有他独特的减压方式。他兴趣广泛，身边的同学朋友常常能够看到他生活中小小的“闲情逸致”：吹葫芦丝、运动、看书等。在访谈期间，王慷楷还向笔者分享他用 8 个月的时间成功减重 50 余斤的经历。他表示，运动健身的过程其实也是缓解学术压力的过程。他认为，这段减肥经历也让他领悟到，很多事情在短期内看不到效果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没给我们带来帮助，只要坚持去做，总会有滴水穿石的一天。



王慷楷减重前后对比图

在访谈的最后，王慷楷表示，“痛并快乐着”是他三年研究生时光里最深刻的体会与感受。他认为，压力来自于优秀的同辈之间，但这种压力也会化成动力，让自己一直保持谦逊努力上进的态度，在不断反思和激励中完善自身的不足。另外，王慷楷表示 IESR 的硕士项目培养方式是他最认可的点，“学院采用小班教学的国际化培养模式，授课老师都是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的博士，他们年轻富有激情，专业功底扎实。我们能够在课程当中了解到不同领域是如何发展的，目前各领域前沿在哪里。这对于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大有裨益。”王慷楷亦向笔者传达了能够学有所成，未来回到 IESR 工作回报母校的美好愿景。

## “IESR 的学习生活塑造了现在的我” ——访 IESR 硕士毕业生梁俊杰



梁俊杰进行硕士开题汇报

### 人物名片

梁俊杰，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2020 届硕士毕业生，研究方向是劳动经济学，现已获得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市场研究岗位 offer。研究生期间，曾获暨南大学推免生奖学金、暨南大学二等学业奖学金，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同时，他拥有十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历，曾担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课程助教、南方电网财务公司辩论培训讲师、华语辩论世界杯广州赛区组委会主席，并于南方人才市场测评中心管理咨询部实习。

梁俊杰不仅是同学眼中的“学习小能手”，更是一个重视社会实践、很有想法的学生。在 IESR 的三年研究生学习时光里，他通过不断尝试，挖掘与自身条件相匹配的发展方向，并充分利用资源提升自身价值。这些努力和付出，令他最后成功拿到名企的“入门券”。

### “学术训练提高了我与研究 分析类岗位的匹配度”

本科毕业时，梁俊杰本着在学术领域继续深造的想法，奔着“超高师生比”、“丰富的学术资源”、“国际接轨的培养模式”等培养特色而选择了 IESR 的硕士项目。“学院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优越的学术研究环境，让我们提前体验了一把读博士的生活，对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人生还有更多可能性。”在体验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喜欢尝试各种新事物、接受新挑战的梁俊杰发现自己对于未来有了不一样的追求，“行动派”的他便开始重新规划职业发展方向。

虽然明确了就业的想法，但梁俊杰对于岗位的选择仍没有明确的定位。在导师薛森老师的指导以及同学们的帮助下，梁俊杰积极参与多个领域的岗位实习，并从自己的知识体系、特长等方面出发，挖掘与自身条件匹配度高的岗位。研究生期间，梁俊杰认真学习专业课程，熟练掌握 Stata 等数据分析软件，投身学术研究，参与学术会议。“IESR 对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不仅让我打牢了经济学基础，培养了我的数据分析技能，更重要的是让我对身边事物保持探索和钻研的精神，具备一定的洞察能力、问题分析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演讲能力等。在一定程度上，它提高了我与研究分析类岗位的匹配度，让我在面试时具备更大的优势。”其次，他激动地补充道，IESR 所举办的学术讲座不仅质量高，涵盖面也十分广阔。不少业界人士作客 IESR 分析经济数据或者分享一些商业应用，为学子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业界有关信息、拓宽视野的平台。在参与学院举办的“IESR+”系列主题讲座中，梁俊杰了解到用户运动轨迹的数据，而这个数据的应用为他在回答关于大数据的具体应用场景的面试问题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能够顺利拿到名企的 offer，自然也离不开他认真钻研与极致付出的处事态度。在选择应聘市场研究这个岗位时，梁俊杰除了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外，还向不同专业的同学“取经”，阅读相关专业知识弥补自身在市场营销学、心理学、社交学等专业知识上的空白，为面试做最充足的准备。

### “导师薛森是一位严格又亲切的师者”

在访谈中，梁俊杰还与笔者分享了他与导师薛森的故事。梁俊杰打趣道，选择薛森老师是注定的缘分。梁俊杰回忆道，当时在选择导师时，不仅仅是对薛森老师研究的劳动经济学领域感兴趣，其中最打动他的一点是薛老师个人主页上一副关于中国工人的画作。“当时我就感觉薛老师一定是一个有情怀的学者！”

在梁俊杰看来，薛老师是一位个严格又亲切的师者。在梁俊杰明确了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后，薛老师便要求他有计划地朝着目标努力，培养他职业方向所需的各项技能，“薛老师很尊重学生的想法。他不会强制学生一定要往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而是根据我们的特点进行个性化培养，为我们提供很多实质性的建议和指导。”薛老师对待工作很严肃认真，但平日里也会和学生分享他自己求学生涯的故事，“通过了解他的学生生涯，我不仅从中了解到不同年代的人在学习、生活方式方面的

异同，也看到了薛老师不一样的一面。在薛老师潜移默化中的影响下，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梁俊杰跟随导师薛森走访石牌坊村

### “现在的我又多了一个新的爱好——玩游戏”

除了在学习和社会实践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历外，梁俊杰还是一个辩论爱好者，在校内外辩论赛的台前幕后经常会出现他的身影。“参加辩论赛是我作为学生之外的另一种身份，是我求学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构建了我的思维方式，让我能够从不同的维度去思考事情，能够迅速地不同的领域中汲取养分来构筑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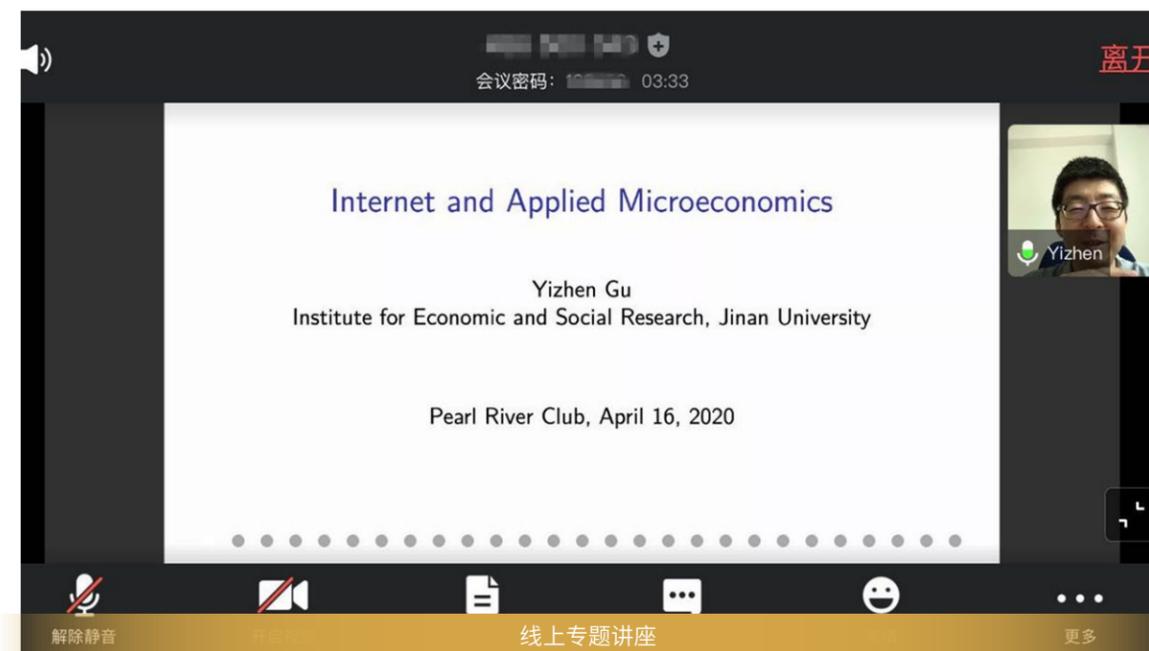
梁俊杰打趣道，由于即将在游戏公司工作，现在的他又多了一项新的兴趣爱好——那就是玩游戏。他解释道，玩游戏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娱乐身心，而是试图从用户的角度从中获得更多真实的游戏体验，更好地了解和分析这个行业的市场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而能够从更专业、更贴合实际的角度与用户进行交流沟通。

回想这三年的学习生活，梁俊杰以“货真价实”来形容他对 IESR 硕士项目的体会。“课程围绕实证研究的脉络设置，再加上‘高配’的学术研究环境，这就是想要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深耕的同学们的绝佳选择。同时，对于决定在硕士毕业后就业的同学而言，专业的学术训练实际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赋予你与职业相匹配的能力，让你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更具优势。”

##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 【第9期】IESR 谷一桢老师带你了解互联网与应用经济学



4月16日下午，IESR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第九期活动通过线上平台如期举行。IESR 副教授谷一桢老师担任本期活动主讲人，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互联网与应用经济学”的专题讲座。本期活动由珠江经济学俱乐部负责人、助理教授崔潇濛主持。

主讲人谷一桢于 2015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前不久，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及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接受发表。在活动宣传前期，线上咨询、报名人数络绎不绝，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一睹这位经济学男神学者的风采。

在讲座过程中，谷一桢老师以“互联网与应用经济学”为主题，通过分享题为“Connecting the Countryside via E-Commerce: Evidence from China”和“Subways and Road Congestion”两项最新研究成果为大家解读“互联网如何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和“互联网如何为我们提供传统问题的新数据和工具？”等问题。期间，他还分享了他在探索过程中的相关研究经历，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其创作过程。

讲座期间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持续近两个小时，近 130 人参与了本次线上活动。在最后的交流环节中，同学们与主讲人互动频繁，纷纷通过语音或对话框向主讲人提问，与主讲人探讨有关讲座主题的更多知识。



## 【第 10 期】IESR 谢斌老师线上解 读通向现代经济的漫长道路



6月11日下午，IESR 助理教授谢斌通过线上平台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通向现代经济的漫长道路”的讲座。这是我院珠江经济学俱乐部开展的第十期活动，本期活动由珠江经济学俱乐部负责人、助理教授崔潇濛主持。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分享中，谢斌老师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的长期轨迹图以及解读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马尔萨斯陷阱理论、统一增长理论等理论，引出“为什么英格兰（西北欧）首先进入现代增长体制”、“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以及“为什么当今世界发展还是如此不平衡”等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对相关经济学前沿文献进行解读，带领同学们系统地了解通向现代经济的漫长道路。